

明治维新与豪农

专题史

古桥晖儿
的生平

[日] 高木俊辅

著

王揆

译

負典編譯

UN-CANON



明治维新与豪农

古桥晖儿的生平

〔日〕高木俊辅 著

王揆 译

本书译自：高木俊辅《明治维新与豪农：古桥晖儿的生平》（「明治維新と豪農——古橋暉兒の生涯」，歴史文化ライブラリー 326，吉川弘文館，2011 年）。

本书由王揆翻译，負典編譯 (translate@un-canon.com) 整理；书中脚注均系译者所加，注末署“——译注”。

正文用规范白话；原书低格排印或成段引述的古文书、日记、书简等史料，中译作浅近文言并以仿宋体缩排，以别于正文。

目 录

明治维新与豪农——序章 / vii

豪农宅邸 / vii

豪农与草莽志士 / viii

维新后的草莽 / ix

看待豪农的眼光 / x

本书的视角 / xi

豪农古桥家与稻桥村

古桥家的历史 / 2

古桥家概况 / 2

三河稻桥村 / 4

古桥家的持高与家口 / 8

古桥义次移居稻桥村 / 10

酿酒与典当 / 11

转向商业经营 / 11

化政年间的经营危机 / 12

卖木材引出的骚动 / 13

骚动的背景 / 14

重整家业与村政 / 16

晖儿登场与源次郎 / 16

家政改革 / 17

改革的成效 / 18

经营重整 / 23

急夫食·安石代·破免愿 / 24

与信州中马的争讼 / 26

周边荒村的重整 / 27

走向幕末政局

叹愿与诉愿的日子 / 32

饥荒的回忆 / 32

佩里来航与对政局的危机感 / 33

上纳金的要求 / 34

安石代的叹愿 / 36

为免除助乡而赴江户 / 40

“法外之举” / 40

江户的晖儿 / 41

为免除四处奔走 / 42

助乡免除与凯旋归村 / 44

草莽国学者的诞生 / 46

入平田门 / 46

晖儿的国学教养 / 50

水户学的影响 / 51

农兵计划与长州征伐的献金 / 54

兵的组织化 / 54

围绕农兵的代官所与村方 / 56

豪农的献金 / 57

献金要求的一番问答 / 58

献金与苗字御免 / 59

信仰生活的积极化 / 62

村里的信仰状况 / 62

作为村落凝聚纽带的信仰 / 63

庆应二、三年的行动与情报搜集 / 66

祈求康复与伊势参拜 / 66

情报的搜集与降札 / 68

对“御一新”政治的期待与参与

与平田没后门同志一同出仕 / 72

错综的消息与混乱 / 72

德川的败北与官军的动向 / 75

高松队与赤报队登场 / 76

新政的布告与应对	／ 77
新政之下的地方	／ 79
赤坂与吉田的足迹	／ 79
向官军上缴款项	／ 80
村方对新政的应对	／ 82
面对新政的困惑	／ 83
振兴物产的政策	／ 85
出仕三河县	／ 85
土肥大作的物产繁殖策	／ 87
晖儿的“富国攘夷”策	／ 87
伊那县足助局所见的地方动向	／ 89
活在村里	
地方殖产的引入	／ 94
从足助局回稻桥村	／ 94
站在“大攘夷”的立场上	／ 95
制茶业	／ 95
养蚕业	／ 97
农谈会	／ 98
烟草	／ 100
产马	／ 101
地方政治与乡土教育	／ 102
晖儿与户主义真	／ 102
学校设立运动	／ 104
乡校明月清风校的设立	／ 105
公立小学校的开校	／ 106
明治十年代后半的变动	／ 108
急转直下的古桥家经营	／ 108
明治十七年的财产状况	／ 110
松方财政下的金融状况	／ 111
向山林经营倾斜	／ 112
晖儿的晚年——终章	／ 115
晖儿的著作	／ 115

北设乐郡殖产意见书	／	116
《报国捷径》	／	117
《富国能种播》	／	117
《子孙遗训补遗》与《经济之百年》	／	120
后记	／	123
参考文献	／	125
古桥家年表	／	127
版本说明	／	131

明治维新与豪农——序章

豪农宅邸

从江户时代后期到明治时期，许多村役人^①（庄屋、名主等）的家既是拥有土地的地主，又兼营各种买卖，带着批发商一类商人的职能。这种住在村里、身兼村役人与地主的农民，就叫豪农。如今提起豪农，人们多半会想到这样的人家：田产广大，宅第宏阔，有时还把历代收藏的珍稀美术品公开展出。

新潟县的地主制曾有很大发展，千町步^②地主便是其代表；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宅第作为“豪农宅邸”成了观光的招牌。例如新潟市的北方文化博物馆（旧伊藤家）、笹川邸（旧笹川住宅），新发田市的市岛邸，岩船郡关川村的渡边邸、东桂苑（旧渡边家分家）、佐藤家住宅，村上市的乡思馆，鱼沼市的日黑邸、佐藤家住宅，南蒲原郡田上町的椿寿庄（旧田卷家）等。而且把“豪农宅邸”当作观

① 村役人：江户时代村一级的管理者总称。其首领西日本多称“庄屋”，东日本多称“名主”，其下有组头、百姓代等。本书一律照原书用字，不另译作中国式官名。——译注

② 町步：日本旧田地面积单位，1町=10反=3000步，约合0.99公顷。“千町步地主”指拥有千町步以上田地的大地主，是近代日本地主制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尺。——译注

光资源的不只新潟县：富山市有旧十村役的内山邸，宫城县柴田郡村田町有真壁家住宅。

“豪农宅邸”吸引人的，是大地主那份气派的宅院格局——玄关、正房、廊子、大黑柱一类的立柱、土藏、书院，还有庭园与壕沟，这些都为观光出了一份力。豪农平日雅好茶道，留下的茶室，以及他们收藏的艺术品，也一并对外开放。这些穿过东北战争等历史波澜留存下来的豪农宅第与其中的陈设，历经 140 多年，既让人回想当年，也唤起人们对当时生活空间与生活实况的兴趣，至今仍吸引着许多人。

不止“豪农宅邸”，日本各地还有不少地方，由曾经身处地方中心的豪农后裔及其亲族保存下老屋，再添上收藏品，办起美术馆、历史馆、资料馆。

豪农与草莽志士

幕末到维新时期的豪农，已经不止于原先那套关系——接下统治者幕府或藩的命令，传达给村民；代表村方把村里的意向上达统治者，替村里叹愿——他们的自主性正一天天强起来。豪农里出现了这样一批人：他们不满足于现状，怨气越积越多，或是预感到新时代就要到来；到了幕末，他们索性走出村方，做了志士，四处奔走于政治活动。这样的人被称作“草莽志士”。从幕末到维新时期，“草莽志士”及其支持者遍见于全国，其中似乎以东国为多。

“草莽志士”里既有豪农出身的，也有武士阶级出身的所谓脱藩浪士；不过豪农阶层的政治代言人，说到底还是出自村镇的豪农商。

先看几个例子：出羽国东田川郡清川村的酿酒户、乡士出身的清河八郎，很早就以尊王攘夷派志士的组织者身份活动；大和的村岛内藏进，拜在安政大狱中被处死的小浜藩脱藩士梅田云滨门

下；水户领久慈郡袋田种蒟蒻的农户樱冈家，接济过在樱田门外之变中谋刺大老井伊直弼的水户浪士关铁之介一伙；下野的横田藤四郎、儿岛强介等人，与坂下门外之变的主谋大桥讷庵有牵连；还有与足利三代木像梟首事件的志士有过往来的京都西阵与丹后国宫津的织物业者；天诛组大和起兵的核心人物之一、土佐大庄屋出身的吉村寅太郎；同样响应大和起兵的河内水郡善之祐、淡路古栋领左卫门等人；响应平野国臣、参加生野银山起兵的但马小山六右卫门、进藤俊三郎（后来的原六郎）、中岛太郎左卫门等人；以及下关的豪商、支持高杉晋作组建奇兵队并资助其活动的白石正一郎。他们既是豪农，同时也是挺身投入政治活动的“草莽志士”。土佐町人乡士出身的坂本龙马，同样是“草莽志士”中的一个。

我此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主、村役人阶层出身而卷入政治运动的草莽。我以为，在明治维新时期，草莽们的志士活动一面构成了推动反幕形势的底层力量，一面也成了把政局推向倒幕的动力。这些“草莽志士”多半在倒幕、新政府成立以至明治国家建成的过程里丢了性命，或是遭到压制。那些在政治潮头冒尖的志士，在残酷的政争世界里成了失败者的群像；不过我想提请注意的是，在他们身后，还有一批豪农并没有跳出来搞政治活动，却站在同情并支援变革的位置上。此外，豪农当中也有人把地方上的事情放在前头，不愿卷入倒幕的动向。这样的豪农为数不少，这就是维新的实情。

维新后的草莽

熬过明治维新的草莽，即便曾投身政治活动，多数也回到了故乡，在地方上度过明治这个新时代。这些豪农走向新时代的路，因地方与历史条件而异，大概各不相同。本书想做的，是从历史上给这样一类豪农定位：他们留在村落社会这一方地方，并以地方领袖

的身份迎来了时代的转折。以往的村落史研究、地主研究、地方史研究里，关于豪农的著作与论文并不少；本书要写的，是一位豪农从幕末走到明治的历程——他明白，自己要立得安稳，整个地方的安定就不可或缺，因而尽量少对身为自家小作人、短工、奉公人的下层民众施压，有时甚至拿出资金援助乃至赈济，设法把村里复兴与兴产的心气调动起来。本书想借他的历程，来想一想豪农在明治维新中的意义与作用。

看待豪农的眼光

话说回来，学界处置豪农的方式，曾像战后社会经济史研究那样，把他们看作近代化的担当者而给予积极评价；但从“地主制论”一直到1970年代的“世直し^①情势”论，豪农与豪农商阶层始终被当作应予克服的对象，被推到与小作阶层或“半无产者”阶层对立的位置上，其阶级性受到严厉指摘。此后，1980年代以来，他们又多被当作“名望家”^②看待，评价豪农这类人物对地方贡献的倾向日渐增强。两种见解乍看针锋相对，可是除了对立，恐怕还需要另一种看法。在今天，把豪农在地方上的历程分作若干侧面，扣住当时“那种情势”一一追究下去，试着给出更贴近史实的定位，看来才是眼下的课题。

① 世直し：字面意为“把世道扶正”，指幕末至明治初年民众要求改变世道的诉求与骚动。日本史学界所说的“世直し情势论”，即以这类民众运动为轴心解释维新变革的一派主张。——译注

② 名望家：日本近代地方史研究用语，指在地方上有产业、有声望、能出面办公共事务的头面人物。——译注

一直把根基扎在地方上的豪农，倘若只是同小前^①、贫农阶层（“半无产者”阶层）对峙，恐怕没法在地方上安稳地存续下去。再者，他们为立足而积攒的本钱，首先是在本村和周边村里挣来的；而这本村与周边村，也正是豪农施惠所及的地方。豪农阶层的动向多样，侧面也多样，只从一个切口去看，得出的就只能是片面的处置，恐怕定位不周。看待豪农阶层，应当尽量扣住他们所置身的村落乃至地方的历史情势来定位。

本书的视角

基于以上的问题意识，本书打算尽量顺着时间的推移，具体而细致地追寻一位豪农的足迹。这位豪农，就是三河国设乐郡稻桥村（今丰田市稻武町）的豪农古桥家（当主名号源六郎）。

古桥源六郎素来被看作日本笃农（老农）^②兼山林地主的一个典型。他为农村复兴付出的努力与做出的实绩得到肯定：六代晖儿被农商务省列为天下三老农（笃农）之一，收入《高等小学读本》；七代义真的功绩，则被介绍在文部省编《寻常小学修身书》卷五（儿童用）的“公益”一项里。

另外，历代古桥源六郎出生并在此活动的稻桥村，如今因大范围合并划入了爱知县丰田市。它本是三河国深山里的一个山村，从地理上看，南面有足助（丰田市）、冈崎（冈崎市）、赤坂（音羽町）、吉田（丰桥市），东面有根羽、饭田（长野县下伊那郡），北面有岩

① 小前：江户时代村内不担任村役人的一般农户，与村役人层相对，亦作“小前百姓”。——译注

② 老农（笃农）：明治政府劝农政策中对经验丰富、成绩卓越的农业实践家的称呼。农商务省曾以“天下三老农”表彰若干人，各家所举名单不尽相同。——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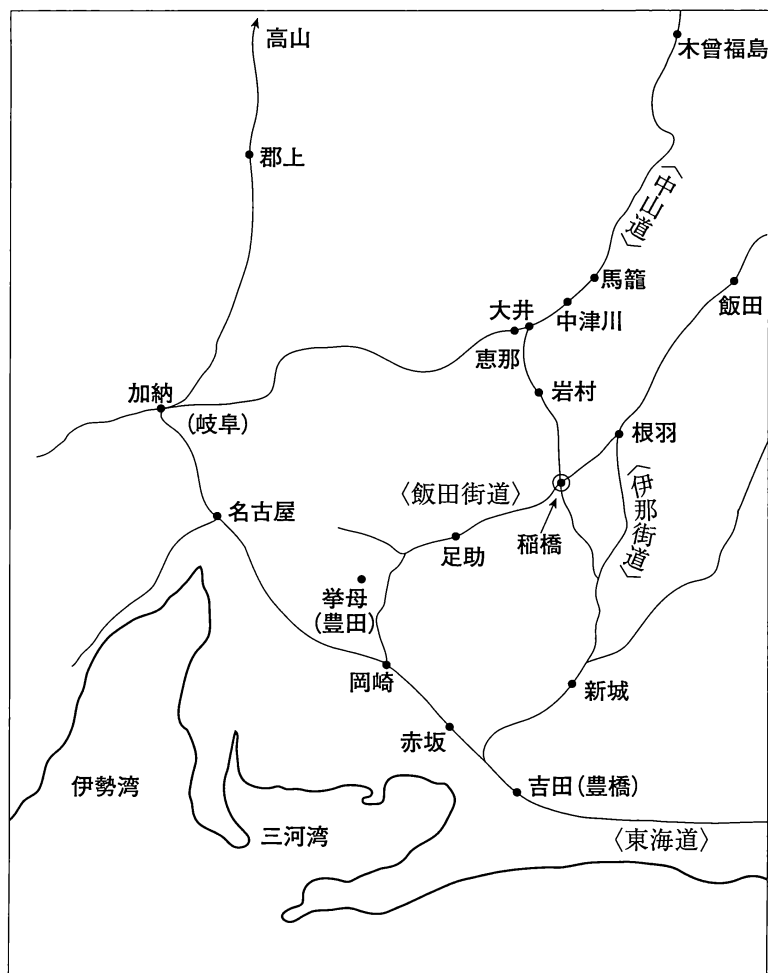
图1 古桥晖儿像



村、大井、惠那（惠那市）、中津川（中津川市），西南面有举母（丰田市），是一个素与名古屋往来的地区，而山村的模样至今仍旧浓厚。

这一带还与岛崎藤村的长篇小说《黎明之前》的世界相叠，同《黎明之前》里的人物也多有交叉。古桥家与藤村的父亲、信州马笼村的岛崎正树，信州伊那谷平田门国学者的代表北原稻雄，同在伊那谷的女勤王家松尾多势子，以及美浓国中津川的国学者们——间半兵卫（秀矩）、马岛靖庵、市冈殷政、肥田九郎兵卫等人——都有往来；而稻桥村，又正是明治元年（1868）三月“伪官军”事件中

图2 豪农古桥家关系图



的同志神道三郎（后来的佐藤清臣）选定的终老之地。本书要做的，是在古桥家作为豪农的漫长历程中，以六代晖儿为中心，把他具体的足迹梳理出来。

图3 饭田街道沿线的古桥家旧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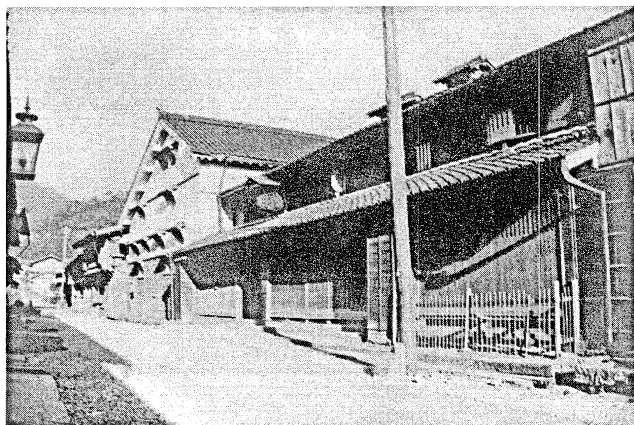


图3 飯田街道沿いの古橋家旧前景

图4 国道153号线改建后的古桥家前景



图5 《高等小学读本》卷之三



豪农古桥家与稻桥村

古桥家的历史

古桥家概况

这里只就古桥家作个极简略的介绍。

古桥家是享保初年（1716）自美浓迁来三河这块地方的，所以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土豪一系。他家经营酿酒与典当、放贷，作为所谓质地地主^①迅速发家；在村里擴开了经济实力与支持者，到宝历年间做了名主。不过三河这一带地势高寒、旱作比重大、农业生产率低，因此他家作为村役人的路走得并不平顺：天明以后经营也不顺，还遇上村方骚动^②，被逼到几乎破产。

就在这时六代源六郎（暉儿）登场了。他先断然推行家政改革，把家业重整起来；同时对村里施行赈恤，又积极向领主一层叹愿（急夫食、安石代、破免叹愿、中马江户诉讼等等），一步步把村里的信用挣了回来。在这个过程中，“村落不安定则自家不安定”成了他家的家训。到幕末，一面受邀去为周边荒村办复兴仕法，一面推动产

① 质地地主：以放贷为业，收取债务人抵押的田地（质地），债务无法偿还时田地即归己有，从而积成大片地产的地主。江户中后期山村最常见的地主形态。——译注

② 村方骚动：村民（多为小前层）对名主、组头等村役人的舞弊或专断提出异议、要求撤换或算账的纠纷，江户中后期各地频发。——译注

土信仰的积极化，又入了平田笃胤没后门，经由国学者的门路取得政治与社会情势的消息，因而并没有被世上“御一新”的潮头甩下。

明治维新之际，他与平田国学的同门互通声气，出仕于新政府直辖地新设的三河县，进而是伊那县足助局，从而接上了维新政治的末梢。在这里，他首先致力于摸清新政之下各地的地方情势。伊那县辖内一闹起骚动，他便以县吏的身份冲在最前线四处奔走。骚动平息之后，因地方行政制度改动、伊那县足助局撤销，他回了乡里。后文还要讲到：晖儿在任职期间学到并确信了一件事——村里要在明治新时代活下去，殖产是必不可少的；回到乡里稻桥村，他就要把这一条付诸实行。

回到稻桥村的晖儿，先想在自己村里引进养蚕、制茶、烟草等特产生产，可这些一时并没有扎下根。明治十年代中期遇上大歉收与荒村化，他在村里的救荒活动得到好评，殖产之路却仍旧险峻，于是渐渐倒向倚仗山林恩惠的建村之道。作为明治前半期古桥家代表的晖儿，临终前写下并示人的那条救村之路，正是以共有山林百年植林计划为根基的。

以上以晖儿为中心，把明治维新前后他作为豪农的行程说了个大概；不过山间豪农古桥家所直面、所苦恼、所行动的问题远不止这些。他所汲取的消息究竟是些什么，他走过哪些地方，同平田门国学者等许多人物有过怎样的往还，古桥家又是怎样迎接这场变革——诸如此类，下面就以明治维新时期为中心，具体地看一看一个豪农多方面的足迹。不过在此之前，还想把与古桥家的行程密切相关的稻桥村再稍作概观。

三河稻桥村

三河国设乐郡稻桥村是幕府代官领（辖下）的山村，直接归赤坂代官所管，而上属东海道中泉代官所。平均海拔五百米，村周边的山高达八百五十米，秋冬两季是苦寒之地。

安永九年（1780）村高一百二十九石九斗，反别十三町二反，其中水田七町四反且多中下田，是以旱作为主的村子（《稻桥村差出明细帐》，古桥会所藏文书。以下无特别说明者，均据同一文书）。

稻桥村的《宗门人别御改帐》^①载有石高，故安永以后村人的持高可知，村内的阶层构成也就能看出来。下面以安永五年为起点、按十几年（间隔十一至十五年）一档列出稻桥村的阶层构成，借以概观这座生出豪农、又作为豪农活动场所的村落是怎样展开的。又，以下统计不含村内两座寺院（参见表1）。

自安永到明治初年，就户数看，稻桥村在四十一至四十七户之间浮动。就全村而言，天明至宽政年间所受的饥荒打击很大，进了十八世纪户数仍未恢复；尤其到文化年间的低落一直延续到其后，以文政十三年（1830）的四十一户为最低点；到天保年间户数才转增，开港以后增长的势头愈发鲜明。

村里的人口，安永五年为二百人，经天明饥荒跌到一百七十人以下，文化年间一度回升，天保年间又转为减少。安政年间人口增加，到明治初年为一百九十

① 宗门人别御改帐：幕府为查禁天主教而令各村逐户登记宗派、家口的簿册，后兼具户籍与赋税台帐之用，是复原村落人口与阶层最基本的史料。
——译注

表1 稻桥村持高阶层表

安永五年 (1776)

持高等级 (石)	户数 (户)	持高合计 (石) ①	人数 (人)	马数 (匹)
20~	1	21.247	11	2
6~10	1	7.236	9	2
4~6	5	23.394	26	4
2~4	12	34.773	47	4
1~2	13	18.382	55	3
0~1	9	2.129	38	0
无高	6	0	14	0
计	47	107.161	200	15

天明八年 (1788)

持高等级 (石)	户数 (户)	持高合计 (石)	人数 (人)	马数 (匹)
20~	1	34.842	11	2
6~10	3	16.589	20	4
4~6	2	8.691	10	1
2~4	5	12.565	20	2
1~2	14	19.432	53	0
0~1	17	6.340	50	0
无高	3	0	9	1
计	45	98.459	173	10

享和三年 (1803)

持高等级 (石)	户数 (户)	持高合计 (石)	人数 (人)	马数 (匹)
20~	1	32.007	9	6(3)
6~10	1	6.013	3	1
4~6	4	19.066	20	4
2~4	7	18.087	26	3
1~2	14	20.306	50	0
0~1	16	5.750	64	0
无高	0	0	0	0
计	43	101.229	172	14(3)

① 原书表1的持高合计一栏以逗号分隔石与合(如三四、八四二,即三十四石八斗四升二合),今一律改用小数点。一石=一〇〇〇合。——译注

文化十三年 (1816)

持高等级 (石)	户数 (戸)	持高合计 (石)	人数 (人)	马数 (匹)
20~	1	37.440	17	6(3)
6~10	1	8.090	6	2
4~6	3	13.317	14	2
2~4	8	19.996	37	4
1~2	14	19.191	70	2
0~1	14	3.498	49	1
无高	3	0	12	0
计	44	101.532	205	17

文政十三年 (1830)

持高等级 (石)	户数 (戸)	持高合计 (石)	人数 (人)	马数 (匹)
20~	1	40.703	7	13(5)
6~10	1	8.090	3	4
4~6	2	8.636	7	2
2~4	8	19.589	43	8
1~2	11	14.711	56	1
0~1	15	6.037	57	0
无高	3	0	14	1
计	41	97.766	187	29

天保十四年 (1843)

持高等级 (石)	户数 (戸)	持高合计 (石)	人数 (人)	马数 (匹)
20~	1	42.717	7	5
6~10	1	7.448	4	2
4~6	2	8.857	9	7
2~4	3	7.556	13	4
1~2	19	26.804	63	9
0~1	14	3.324	47	5
无高	3	0	9	0
计	43	96.810	152	32

安政四年 (1857)

持高等级 (石)	户数 (戸)	持高合计 (石)	人数 (人)	马数 (匹)
20~	1	40.593	4	5
6~10	1	7.447	6	2
4~6	2	8.856	11	5

(续表)

持高等级 (石)	户数 (户)	持高合计 (石)	人数 (人)	马数 (匹)
2~4	4	9.584	21	4
1~2	17	24.679	63	7
0~1	17	4.464	65	4
无高	1	0	2	0
计	43	95.623	172	27

明治三年 (1870)

持高等级 (石)	户数 (户)	持高合计 (石)	人数 (人)	马数 (匹)
20~	1	36.848	6	5
6~10	0	0	0	0
4~6	3	13.620	12	3
2~4	6	14.703	28	4
1~2	14	21.145	70	7
0~1	20	9.078	72	12
无高	1	0	4	0
计	45	95.394	192	31

史料：历年《稻桥村宗门人别御改帐下书》

注：不含寺院（2户）及僧人数。马数中（ ）内为牛数

人以上。下面把村里担着生产的那一层称作中层农，用二至十石这一档来充当，作为观察的重心。先看安永五年：最高者二十一石有余，中层农十八户、八十二人，零至二石层二十二户、九十三人，无高六户、十四人。这一年村内的马十五匹，有马的十二户，都限于石高一石以上的人家。

经过天明三年、四年、六年饥荒的天明八年（1788），中层农减到十户、五十人，村里在家的劳力少到了危险的地步。零至二石层增到三十二户、一百零三人；不过人虽不在、因还有回村的可能而户籍留着，所以这里头也包括因歉收而外出打工等离村中的十二户、三十五人。享和三年的中层农是十二户、四十九人，恢复得有限；零至二石层三十户、一百二十四人，沉淀在了下层；大概是活不下去，

无高变成了零。文化十三年，中层农十二户、五十七人，人数略有增加，但外出做佣工、做零活的仍有八户、十三人（七人与一户六人）。与前一年文化十二年相比，这期间回村的有六户、十二人，可以说村里也渐渐有了容人回来的条件。

文政十三年，中层农的户数停滞，但零至二石层是二十六户、一百二十三人，无高三户、十四人；马数猛增到二十九匹，二石以下的人家也出现了养马的。古桥家村内持高超过四十石，拥有马八匹、牛五头，与马匹生产及流通（牛）关系很深。这一局面经天保歉收大为倒退：天保十四年，中层农锐减到六户、二十六人，零至二石层增到三十三户，可一户平均只有九斗，零碎得很；而这一层所养的马猛增到十四匹。

安政四年，中层农虽只七户，人数却增到三十八人。零至二石层仍是三十四户，人数却是一百二十八人、增了十八人，看来下层也渐渐有了维持生计的条件。明治三年（1870），中层农九户、四十人，增加的是五石以下那一档。下层人数增到一百四十二人，尤其这一层养的马增到十九匹，可以推想商品生产已相当地渗进了这个村子。

古桥家的持高与家口

概观过稻桥村内的阶层之后，这里再看一看古桥家持高与家口的变迁。与表1一样依据历年《稻桥村宗门人别御改帐》，故持高只限稻桥村内的部分。

古桥家自天明年间进入三十石这一档。到天明八年（1788）为止，家口里还包括下

表 2 古桥家持高与家口表

年	村内持高（石）	家口（人）	男（人）	女（人）
1776（安永五）	21.247	11(3)	6(2)	5(1)
1780（安永九）	21.247	11(3)	6(2)	5(1)
1784（天明四）	34.842	12(3)	7(2)	5(1)
1788（天明八）	34.842	11(3)	6(2)	5(1)
1803（享和三）	32.007	9	5	4
1807（文化四）	35.421	10	5	5
1812（文化九）	29.109	12	6	6
1816（文化十三）	37.440	17	11	6
1820（文政三）	39.703	19	11	8
1823（文政六）	39.703	14	10	4
1828（文政十一）	40.703	8	6	2
1832（天保三）	40.703	7	4	3
1837（天保八）	40.703	7	5	2
1840（天保十一）	39.008	8	5	3
1843（天保十四）	42.717	7	5	2
1848（弘化五）	42.717	6	4	2
1852（嘉永五）	42.717	6	4	2
1857（安政四）	40.593	4	3	1
1862（文久二）	40.593	4	3	1
1867（庆应三）	45.902	5	4	1
1870（明治三）	36.848	5	3	2

出典：历年《稻桥村宗门人别御改帐下书》

（ ）内为男仆、女仆数

男与女仆。此后古桥家的家口构成里这些佣人不见了，只剩血亲；不过因有旁系家人在，家口还是比较多。后文要讲到，家口多的时候，因为要分派人手去做运输，牛马的数目也多。文政后半以后家口不再超过十人，迎来明治维新时大致是五口之家。

古桥家在村内的持高，看去差不多是一路顺当地增加的。几年之间减掉五石以上的只有文化九年一次；文政年间超过四十石，比起石高开始有据可查的安永年间翻了一番。明治三年(1870)减掉近

十石，是因为分出一房、分了家产。石高的增减并不就等于家政的顺与不顺，所以下面要一面顾及各种条件，一面来看古桥家的历史。

要讲六代源六郎晖儿与明治维新，看来有必要把晖儿之前的四代义陈、五代义教，乃至再往上追溯的古桥家作为豪农的行程特点，看得更细一些。这样一来，古桥家与晖儿本人所面对的局面有多严重，才能明白。

古桥义次移居稻桥村

如前所述，古桥家是从美浓国来到三河的；再往上，本是飞驒国大野郡的工匠出身。他家为谋活路迁到美浓国惠那郡中津川，尽力于当地的开垦，做了工匠的头领而崭露头角。在中津川，他家于宽文年间（1661—1673）修成了供开垦与灌溉之用的井水。古桥家在开凿、土木、营造上作为工匠的本事由此得到证明；中津川至今还留着颂扬此举的“古桥翁显彰碑”和中津川用水本身。

到元禄年间，古桥义次应美浓国惠那郡茄子川村复兴荒废之请，亲自迁到茄子川，同村人一道整顿，把村子救活了。正德四年（1714），他在往远江秋叶神社参拜的途中顺路到了三河国设乐郡的稻桥村。在这里投宿时，他听说稻桥村有一户人家停了酿酒、要把酒株出让。回村后一番斟酌，先以两年为限借下酿酒株，义次自己则寄居稻桥村，学起酿酒的手艺与做买卖的门道来。

享保二年（1717），义次把茄子川的家督让给弟弟，买下酒造株做起酿酒，又添上典当业，就此迁往稻桥村。义次被称作三河古桥的始祖。他在这里自称源六郎，这“源六郎”便成了三河古桥家世代的通称（以上据古桥茂人《古桥家的历史》）。

酿酒与典当

迁到稻桥村之后的古桥家，一开始就酿酒，又加上典当（放贷）。三河山间的农村里货币经济总算渗了进来，农民的日子里花钱消费的项目多了起来吧。古桥家看准这一点，做起酒和味噌的零售；可一般农民的货币收入还谈不上稳定，不如说几乎没有，于是农民欠债越积越多，只好把先前借钱时抵押的土地（质地）撒手。结果，越是放贷，古桥家手里积起来的就越不是钱而是土地。

在这一阶段，古桥家的土地所持高确实一路上涨；然而这些地是在贷款与利息都没还上的情形下攒起来的，所以持高虽大，经营却越发走不动。势必要放出超过土地生产力（价值）的高额贷款，于是呆账越来越多，村内与周边村农民层的穷困也越发加深。

古桥家以放贷为中心的经营，对手是被歉收与预支债务打垮的农民；天明歉收时许多村人没落、离村，经营明显破产了。农民层的穷困，正是在天明歉收之下达到了顶点。古桥家村内持高在天明八年（1788）是三十四点八石，加上村外与周边村据说超过八十石；可持高大并不等于经营就稳，反倒是跌到谷底的放贷经营，已经到了非另寻活路不可的时候（以上参考了乾宏巳《豪农经营的史的展开》，雄山阁出版，1984年。又，以下讲古桥家的经营，也主要依据乾氏《同上书》）。

转向商业经营

古桥家在天明歉收正紧的时候开了铁店，想积极地插足商业经营。铁店办于天明六年（1786），经营的是锅、釜、钩、锄、镰等农具，以及药材之类日用杂货。进货来自冈崎与牛久保，从金属器物产地直接进货，零售给本村与近邻各村。

起初还算妥当，可这些货与其说是消耗品，不如说能长期使用；一旦大体都置办齐了，换新的就少了。再加上歉收、欠收接连不断，农民的购买力下降，货便渐渐卖不动了。

此外，文化五年（1808）他家又插手制瓦；次年六年收油籽榨油，开起卖油和油粕的油店；同年还把木材削成白木加工成曲轮出售，做起白木曲轮的买卖，与烟草、棉花一道，在商品作物与加工品的收购贩卖上下了工夫。酿造这一头，除了迁来此村后一直做的酿酒之外，宽政六年（1794）

起又开始酿味噌。这一门妥当，文化初年最盛，酿造量在一百石上下。可是从文化末年起，受米、大豆、盐这些原料价格波动与销路情形的左右，转为收缩。只是这一带没有酒、味噌生产上的竞争者，加之进货与销售遍及加茂郡、美浓国惠那郡等广大地面，所以稻桥村近邻的荒废对它的影响相对较小。

到这一步，古桥家该说是已经成了兼具放贷经营、地主经营、商业经营等多个侧面的豪农。这能算作经营上的发展么？总之，古桥家是把手伸进了当地从渐次展开的商品生产直到消费的农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要从中榨出利来。宽政以后日益显著的向商业经营倾斜的势头，压迫着一般农民、尤其是下层的生计，也就招来了他们的反弹。

化政年间的经营危机

文化年间的古桥家，典当与手形这类在乡放贷很多。此前譬如放给旗本一色数马的融通手形成了呆账、钱收不回来，可见对领主放贷风险很大，于是把放贷的主要对象转到了村里的农民身上。结果佃地经营、地主经营渐渐扩大，可佃租却似乎并没有能稳定地收上来。

文化五年（1808）以后米作不振，使放给农民的放贷＝金融部门里“只贷·挂”^①急剧增加。就是说，帐面上虽有未收的贷款余额，实际却生出大量收不回来的呆账。这一时期古桥家一直做到文政三年（1820），开垦出良田六郎木新田。有了它，无论遇上什么局面，都能保住维持自家一家人生计的自耕地。

另一头，佃租的催收在别村是催得很紧的，于是文化年间闹出了佃户骚动。文化五年有虫害与风灾。此后古桥家先作了折扣，仍要求佃租缴清，御所贝津村的佃户首先反弹。文化七年的除夕，御所贝津村的佃户们拒缴年末未清的米钱。古桥家为此告到管辖的代官所，结果双方同意以减免佃租内济^②了事。

不料古桥义陈又另把宝历年间的旧贷款翻出来，要人偿还。这一下御所贝津村不止佃户，连村子本身也硬了起来。义陈赴江户告到勘定奉行处，结果是：①村方旧贷款一笔勾销，②眼下佃租打七折——就这样内济了事，判下来的裁定是顺着佃户一方的说法的。

卖木材引出的骚动

到文政年间（1818—1830），身为名主的古桥义陈竟被小前告了。事情起于义陈在文政元年八月把“村持惣百姓山”的木材六百株卖掉。文政元年（1818）十二月，稻桥村的小前们以未经小前同意即卖木、独吞卖木钱而不肯分给众人为由，动了呈诉的念头。组合各村的役人从中调停，议定把木材钱的一半分给村人，双方遂应了内济。

① 只贷·挂：帐上仍挂着的、有借无还的贷款与赊账，即呆账。——译注

② 内济：不由官府判决，而在中人调停之下由当事双方私下和解了结，江户时代民事纠纷最常见的收场方式。——译注

可是第二年文政二年正月，小前惣代喜藏与和平又以义陈仍不分钱、并且砍了井山御林山的树为由，到代官所行驱込诉讼。

对此义陈反驳说：从村山伐出的木材钱已经用来抵付先前垫出的村里氏神拜殿的修缮费；这并非独断，而是照惯例同组头商议之后办的，云云。不过这场诉讼牵进了御林山这一官林——幕府直辖林，怕诉讼拖久，加之来回江户等项花费，为求早了，他还是应了赤坂代官所与组合村役人调停的内济。

这里可以感到：一度已经接受内济，小前惣代却仍去行驱込诉讼，可见村里对名主与组头“坏了村政惯例”的不信任有多强。而且争的直接并不是水或柴草这类入会山的问题，而是卖木钱如何分配的问题——商品经济的成分之重，于此读得出来。

这场村方骚动的结果：与义陈一同被告的组头在这文政二年卸任；义陈自己也在次年三年把家督让给儿子义教，名主一职则由诉讼方和平的本家伝三郎担任。在小前——村人不信任的浓重空气之下，接了家督的五代源六郎义教，一度不得不把生活的根据地迁到美浓国惠那郡中津川村去。

骚动的背景

再把这场骚动的背景看细一点。小前惣代和平的本家伝三郎是稻桥村的旧家，持高从文化元年的六石降到文化十五年（即文政元年，1818）的一点二石；另一位小前惣代喜藏家世代做百姓代，持高从文化元年的三点二石降到文化十五年的〇点八石——分明都是正在没落的农民。另一头，名主与组头这边：义陈从文化元年的三十二石长到文化十五年的三十七点四石，组头弥次右卫门从文化元年的五点二石长到八点九石。围绕村役人的对立形式之下，其实也是文化十年实行石代纳以后明朗化了的一重对立：正在没落的旧

家一方，同积极插足商品生产与流通、乡居商人化了的新兴村役人一方之间的对立。

乡居商人式的活动，非但没有给这一带的荒村化踩下刹车，反而压迫村内下层的生计、助长其不安，因此不但正在没落的旧势力，连下层民众也强烈反弹。村方骚动使古桥家在村里更失信用，这又反过来把它的经营逼紧：放贷与赊销的呆账越积越多，几乎被逼到破产。这期间，古桥家也曾努力把经营分散开来。

文政五年（1822），义教给内弟清四郎四十四两一分作开油店等分号的本钱，文政八年至十一年间又以“借款还本付息”名目支出一百七十三两一分；可清四郎却逃到江户去了。又，文政五年至九年间给内弟周四郎作分号本钱共支出六十两三分，周四郎却死了，凑出来的钱白搭。

化政年间为止的古桥家，一面做着村役人，一面强化放贷金融与收购、加工、贩卖这些商人式的机能，从各个方面向小前农民身上取利，图谋豪农经营的发展。可正是这件事让小前＝小农没落、让荒废加速，也动摇了自家经营的根基。加之在村方骚动中落败、受村人猜疑，债务越滚越大，非作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不可了。而这副担子，就落在了十九岁接替五代义教承嗣家督的唯四郎肩上。唯四郎承古桥源六郎第六代，取名晖儿。

重整家业与村政

晖儿登场与源次郎

天保二年（1831）二月，五代义教把家政一应事务交给年满十九岁的儿子唯四郎，自己引退。义教本有文化七年（1810）生的长子德四郎，但德四郎已于文政十一年（1828）十月去世，于是文化十年生的次子唯四郎继承源六郎第六代。

德四郎去世的前一年文政十年，做了古桥家家主约五十年、直到因村方骚动而卸任为止做了约三十五年名主的四代义陈去世了。承嗣家督的唯四郎取名晖儿；可从一开始，他肩上就压着一副重担：非把濒临破产的家计重整过来不可。内弟们开分号的计划接连受挫，尤其开油店的那位逃去了江户，欠债转到本家头上；文政十年十二月的一场火烧掉了仓库与马厩，重建又添出九十二两的开销——正是“兄弟共借款还本之资皆系外借，加之焚毁重建等所费甚多，实已极为窘迫”（《历代勘定觉》）的光景。

为应付到期、火烧眉毛的约四百两支付，文政十一年二月办起名为“大黑讲”的赖母子讲^①。古桥家以每份五两、六十二人（六十

① 赖母子讲：成员按期凑份子成一笔款，由“亲”（讲主）先用，其后众“子”轮流或抽签取用的民间互助融资组织，又称无尽讲。散讲即中途崩盘。——译注

七份)计三百三十五两作头一期的款子到手,先渡过这一关;可这又成了新的债,自次年文政十二年到天保九年的十年间,每年得担起约四十两的偿还义务。此外古桥家还入了好几个赖母子讲,光是份钱,眼下每年就得支出一百两以上。

当时的古桥家家主义教,是接下文政三年因村方骚动而卸任名主的义陈的家督的,可他自己做名主要到文政七年。如上所述,正当家计困窘之际,文政十年丧父义陈、次年十一年丧长子德四郎,接连打击,人也灰了心。救他出这困境的,是古桥家的别家美浓屋源次郎——他同时是稻桥村的组头。当时源次郎因有商才而被赤坂代官所看中,做着代官所的书役,在代官所的财政上很有能耐;他应义教之请,立刻从本家的还债入手,拟出一份经营重建方案递了上来。

家政改革

文政十一年十一月拿出来的古桥家重建仕法,柱子有三条:①用人尽量裁减;②商业与酿造都要量入为出,不得举债;③还债的钱,用催收那些近乎呆账的放款来充。这些立刻付诸实行。可效果一时并没有显出来,文政十三年^①的盘存^①上,欠债反而增加,已到了要垮的地步。

就在这样的局面里迎来了天保二年。义教决定大胆求变,索性隐居,连名主之职卸掉也不在乎,把重建的事托付给晖儿。

依源次郎的谋划,晖儿自天保二年(1831)七月二十四日起,办了为期一周的家什与铁店存货拍卖。父亲义教起初拘于体面,说变卖家什会伤了家名而迟疑;源次郎劝服了他。源次郎的道理是:如

① 盘存(店卸し):年终清点库存与债权债务、结出总资产的做法。所记之册即《店卸帐》,是复原江户商家经营实况最要紧的史料。——译注

今哪怕做一次大幅赤字的决算，也要紧的是以六代晖儿的名义重新起步；这样五代义教便不受损伤，说是“并无所谓办事不周”

云云。拍卖的结果，来买古桥家变卖之物的多达一百九十三人，卖得的总额合计一百一十四两。买主几乎都是稻桥组合村的人，其中稻桥村来了五十二人——等于本村家家都买了点什么。按人头算不过〇点六两，零零碎碎，数目并不算大；可这场拍卖带来了各样的效果。

古桥家换了家主，还非得把家什与存货变卖不可——给人留下“已经窘迫到这个地步”的印象，效果很大：周边村庄与村人给了他家削减债息、本金分年偿还等种种方便。这一回古桥家一分田地也没有动，就此迈上了还债与重建的路。

要看古桥家着手家政改革的成效，先来查一查天保四年的盘存（《历代勘定觉》）。

改革的成效

资产方面，文政十三年（天保元年，1830）的二千八百四十九两，降到一千二百六十两，不到一半；用于放贷的现金是零。这“典当”一项本该有救济村民生计等融通的功能，可本钱已经见了底。村

表3 古桥家盘存表

年代	典当	手形	贷赊 销	酒味 淋	味 噌酱 油 (溜)	米大 豆	铁店	油店	白木 曲轮	杂项 (存 货)	现金	计
文化 8 (1811)	440	367	997	7	164			422		85	-534	1948
文化 9 (1812)	471	372	970	19	151			397		78	-537	1920

重整家业与村政

(续表)

年代	典当	手形	贷·赊 销	酒·味 淋	味 噌 油 (溜)	米·大 豆	铁店	油店	白木 曲轮	杂项 (存 货)	现金	计
文化 10 (1813)	360	368	1014	72	163			379		107	-550	1911
文化 11 (1814)	274	372	1073	51	131			388		79	-596	1771
文化 12 (1815)	162	353	1053	46	123			414		152	-518	1784
文化 13 (1816)	116	488	1093	41	84			405		161	-568	1819
文化 14 (1817)	89	490	1097	24	83			418		160	-596	1766
文政 元 (1818)	68	484	1025	61	112			436		198	-603	1780
文政 2 (1819)	47	489	995	38	114			434		193	-651	1657
文政 3 (1820)	43	475	976	6	99			451		153	-574	1628
文政 4 (1821)	33	443	1104	2	72			419		185	-710	1548
文政 5 (1822)	22	429	1057	26	44			396		187	-735	1425
文政 6 (1823)	18	421	1168	34	45			404		206	-754	1540

重整家业与村政

(续表)

年代	典当	手形	贷·赊 销	酒·味 淋	味 噌 酱 油 (溜)	米·大 豆	铁店	油店	白木 曲轮	杂项 (存 货)	现金	计
文政 7 (1824)	14	425	1202	63				417		213	-727	1646
文政 8 (1825)	13	438	1238	5	42			481		193	-786	1624
文政 9 (1826)	9	448	1345	8	64			524		203	-824	1776
文政 10 (1827)	5	422	1315	23	59			551		172	-908	1637
文政 11 (1828)	4	416	1263	6	33			597		203	-633	1889
文政 12 (1829)	2	396	1321	26	45			591		182	-736	2575
文政 13 (1830)	2	457	1339	0	20	17	360	241	89	315	9	2849
天保 4 (1833)	0	512	659	0	35	0	4	0	0	30	21	1260
弘化 3 (1846)	41	133	452	39	174	27	0	0	0	41	70	977
弘化 4 (1847)	62	76	420	84	178	25	0	0	0	51	65	961
嘉永 5 (1852)	176	213	704	76	392	75	0	0	0	20	138	1794

(续表)

年代	典当	手形	贷·赊 销	酒·味 淋	味 噌 油 (溜)	米·大 豆	铁店	油店	白木 曲轮	杂项 (存 货)	现金	计
安政 元 (1854)	160	690	911	9	286	65	0	0	0	12	112	2245
安政 4 (1857)	114	1332	720	91	241	26	0	0	0	29	43	2596
安政 6 (1859)	135	1546	887	273	303	53	0	0	0	27	38	3262
万延 元 (1860)	143	1696	938	145	380	136	0	0	0	16	70	3524
文久 2 (1862)	138	2126	1222	133	410	370	0	0	0	50	113	4562
文久 3 (1863)	121	2734	1214	180	563	492	0	0	0	33	190	5527
元治 元 (1864)	73	3703	1253	196	547	249	0	0	0	61	158	6240
庆应 元 (1865)	75	4215	1223	196	685	414	0	0	0	79	163	7050

注 文政 13 年以前据《历代勘定觉》，为各年七月的盘存；天保 4 年以后据历年《卸控》。

里人的债他家也代还过，因此挂着“只贷·挂”的手形依旧很多；而“贷·挂”这一项，把过去的分年摊还、慢慢收回已是竭尽全力，加之酿造不振，新的进货本钱没有，数字便减了下去。不过酒与味噌的酿造，除了闹加茂一揆的天保七年（1836）之外，没有停过工。铁

店以及油店、白木曲轮等收购贩卖的商业部门，榨油、制瓦等加工部门则全部废止，因此“杂项”一栏在存货清仓拍卖之后骤减。自耕地收的米用作家人与佣人的口粮；这一改革压下了佣人的数目，两下里就平衡了。实物缴纳的佃租只多了一点，但米价上涨，扣除年贡后的赢余增加了。

极简单地说，这场家政改革以压缩支出为第一要义，因此力行俭省，把家计一年的各项开销压到天保以前的三分之一左右。天保三年的佃租，折钱一百二十七两（其中稻桥村六十三两），扣去年贡与各项役钱七十两，赢余约五十八两；再加上放款分年收回的约十两，共六十八两充作一年的各项开销。此外讲份钱的支出很大：大黑讲每年四十两，别的讲“亲”那一份四十六两五，“子”那一份十四两五，共一百零一两；再加上债息共二十四两、债务分年偿还二十二两，总计一百四十八两的支出。相对地，收入这一头，因商业与加工部门已经废止，只剩下酒、味噌的酿造。天保四年酿酒八十四石、大豆二十石，制造贩卖所得的利润约五十两。对着要支出的一百四十八两，算下来约有一百两要变成债。

为着尽早、至少是眼下解决这一缺口，晖儿先在催收成了呆账的放款上使劲。天保二年到次年，他向加茂郡川口村的领主安藤对马守的代官所提起诉讼；到天保四年六月内济了事，削掉利息共一百零三两，本金加上赊销款六十三两，议定分十七年收回。

即便如此，就收支看债务仍在增加。他便靠着从凤来寺岩本院几乎每年借五十两上下来周转。债务还是一直涨，到天保六、七年到顶，此后慢慢减少；到天保九年付清大黑讲的份钱，总算脱了困。

经营重整

脱开大黑讲份钱负担那一刻起古桥家的经营状况，且举两年后的天保十一年（1840）与再五年后的弘化二年（1845）来看。天保十一年收入，大体只有作为地主的佃租与酿造这两块：佃租的赢余六十八两，加上自耕的部分超过一百一十两。这一年酿酒与味噌的赢余是八十两，比天保四年多出一倍有余，涨得很快。五年后的弘化二年，虽把自耕部分排除在外，佃租折钱九十二两有余，多了二十四两。味噌的数字缺着，不过从进的大豆一百八十俵、下料六桶推算，赢余当在五十两以上；此外还该有放款的收回等等。收入却只记作一百四十两，想来是为了把支出压紧吧。

支出这一头，天保十一年总计二百零八两，债还没还清；但赖母子的份钱与债息的支付，比天保三年减了一半。到弘化二年，还债略有增加，可同赖母子份钱合起来的数目确实在减。与自耕相关的家人雇工口粮另立一本帐；弘化二年若把支出算作一百四十两，收入当在一百九十两以上，至少有五十两以上的盈余。

就这样，从天保后期起赢余渐增，文政年间的巨债到弘化四年终于还清了。《每年诸入用月割帐》弘化四年条下写着：“……以田地之收供一年用度，以买卖偿赖母子之返金与份钱利息。正月本极歉薄，至当年三月，借款皆已还清……”就是说，用佃租供一年各项开销，用酒、味噌的赢余还债，三月以前便能还清。

弘化四年，他又重新立了年度预算。首先，佃租（作德米）一百一十九两，酿造业的赢余一百一十六两；收入比天保十一年，酒多了三十三两、味噌多了五十两，涨幅很大。这里把自耕部分排除在外，收入仍超过三百两；扣掉年贡各役钱与赖母子份钱，还预计有一百八十四两有余的赢余。他定下的方针是：拿一年利息的一半

过日子，另一半转作不时之需的积蓄；对半分开的九十二两一分有余按十二个月摊，一个月的生活费便俭省到七两二分。

此外还有不时到手的赖母子中签款，家计上甚至有了余裕，可以说家政改革是成功了。嘉永以后，在幕末政局紧张、余波传到山村来之前，古桥家的经营根基已经立稳了。

急夫食·安石代·破免愿

从家政改革到还清欠债的过程中，从获得稳定家计的过程中，晖儿都做了些什么？下面就把天保年间他那种以村为中心的行动，举具体的事例，稍细地追一追。

天保二年（1831）着手家政改革，前面已经说过。此后紧接着的一段，大概是全副心思都扑在古桥本家自家的财政重建上，晖儿对村里、对社会几乎不见有什么动作。天保四年七月，属代官领的武节乡六村与相邻的津具村町方、村方八村联名递上年贡石代金纳愿，这次叹愿的惣代是古桥别家、稻桥村组头源次郎担的。同年秋天稻桥村也遭了饥荒，向本家提议并实行对接连冒出来的穷困户发放夫食^①与救济米的，也是源次郎。那正是变卖家什之后不久，本家——晖儿在村里的信用还没恢复，只好由源次郎出面张罗。

到天保五年，晖儿才以古桥源六郎第六代的身份，头一回为村里做了件事：在稻桥村共有山林种杉苗。议定植后的抚育等由各户负责，成材后由全村商议出售，并禁止买卖与典押。这是为村的存续而设，作为全村的取极；卖木所得的利益按户均分，用来还债、赎回典物。树要长成得费时日，所以他是说服村人才动手植林的。这

① 夫食：农民维持口食的粮，尤指歉年由官府或村中贷给、施给的救命粮。
“急夫食”即紧急发放的那一份。——译注

里可以看到晖儿的姿态：身为名主，通过提议并推动全村共同去做的事情，来把信用挣回来。

天保七年九月，源六郎作惣代向赤坂代官所递上急夫食愿。这一年八月风雨成灾，本已递过破免与检见愿^①；一听说邻近的加茂郡闹起一揆与打毁，他先告诫村人不得响应，随即急奔赤坂代官所，递上救济村里的急夫食之愿。途中在乡町足助还撞上了一揆的人群，亲眼看见打毁。他缠着不放地叹愿，终于让代官所答应发给夫食钱。

不料这笔急夫食的发放，因代官所的差错与漏查而拖延下来。于是十一月他一直跑到中泉（赤坂是派出的代官所），措辞很硬地再叹愿：照这样下去，“小前之人日日之夫食即将不继，届时生出何等误解，殊难逆料”，终于把急夫食的借领款弄到了手。在一揆眼看要蔓延过来的形势下，小前若响应，村里就要动摇，家政改革的成果便要付诸东流——他怕的大概是这个。为村里机敏行动的结果，从代官所役人手里掏出了钱，用这钱买了现米分给组合各村。

同七年十月，前述八村的村役人联署递上安石代^②愿。文中说，加茂一揆的人马向他们各村“若不加入，即当打毁，此话已数度传来”，人心不稳，须尽早对策——这是对代官所近乎恫吓的叹愿；他们因此比别村更早拿到了安石代。

天保八年，一月他加入六村村役人联署的御救安石代愿；八月风雨造成歉收，九月递破免与检见愿时，上津具村役人只领着检见役人去看收成差的田，事情败露。为此他作六村的惣代出面赔罪叹

① 破免·检见：歉年时请求废止定额年贡（破免）、改由官吏实地查勘收成定额（检见）。二者常一并呈请。——译注

② 安石代：把年贡由缴米改为折钱缴纳时，请求把折价的米价定低一些，以减轻负担。——译注

愿。晖儿是替别村役人闯的祸出的面——由此可见他在村内外的信用已经恢复。

天保八年十二月、天保九年一月与二月接连递上御救安石代愿、夫食拜借愿以及当年夫食代缓还之愿，不过无法确认晖儿是否作了叹愿惣代。叹愿的结果似乎被驳回了，当年份的夫食代还是缴了回去。又，天保十年一月，八村村役人联署递上夫食代分三十年偿还之愿；二月同样由八村村役人联署递上年贡缴清延期之愿。

天保七年到十年这几年，晖儿在破免愿、安石代愿、夫食愿——桩桩都关乎歉年村落存续——上头都是叹愿的中心，干得很出色。其中运用的叹愿之术，连领主也不得不认。不过不能不说：晖儿到天保中叶为止的活动，始终是向领主求救济，对村落自身重生的动作还很少。

与信州中马的争讼

天保九年（1838），晖儿做了稻桥村的名主。这前后他并没有在各项叹愿里当惣代；可在对信州中马的诉讼上，他又一次以惣代的身份出面了。

自文政三年（1820）的争讼以来，信州中马的既得权一直被认可着；三州中马当中，武节乡尤其不许承运名古屋、冈崎来的货，处境不利。文政十二年，武节乡野入村与小田木村被控妨碍信州中马通行，以此为契机，他们推组头源次郎为惣代，想排除信州中马的流通垄断而告到江户；结果内济了事，输了官司，武节乡的马稼^①仍旧没能恢复。

① 马稼：农民以自家马匹替人驮运取酬的营生。信州中马与三州中马为承运权长年争讼，即本节所述。——译注

天保十一年，田口乡六村与津具村之间为三州街道的马稼起了争讼，作为参考人的名主晖儿于次年天保十二年赴江户支持田口乡。与此同时，同年二月，他为多年盼着的名古屋、冈崎货的马稼，代表武节乡对信州中马提起诉讼。田口乡的官司在天保十二年六月内济，田口乡也获准享有与津具村同等的马稼。另一头，对信州中马的诉讼，到次年十三年十二月下了裁定，内济成立。这份内济里，武节乡承认信州中马的优势，同时取得了与加茂郡明川村同等的“残货承运”权。这场中马诉讼里值得注意的是：一向受信州中马妨碍的名古屋、冈崎、足助等地的货主与问屋，都支持武节乡的马稼。

马稼的恢复，给稻桥村与古桥家带来了什么影响呢？天保年间荒村化不断加深，稻桥村的马稼已经走不下去，二石以上五石未满的一层开始卖马，到天保八年全村的马减到只剩十五匹。而天保十二年马稼一恢复，天保十四年马稼便猛增到三十二匹。古桥家仍是五匹，二石未满的一层却有了十四匹——可见贫农层里已经早早出现了以马稼为业、专门介入商品流通的人。天保末年，稻桥村与周边村的商品生产铺开，这一带的产物即货物在增加。

古桥家在这一时期尤其广泛地介入流通，可并没有把经营的重心挪过去，自家的马仍是五匹。然而他之所以在江户待了一年半打官司，是为着给村里摆脱荒废找一个出口。作为武节乡十一村的惣代，他挤进了信州中马一方的流通垄断网，虽不算全面，总归把马稼的权利夺了回来；由此，晖儿在本村以及这一带的信誉也就恢复了。

周边荒村的重整

弘化年间（1844—1848）以后，经营重建并上了轨道，晖儿的活动便不止于稻桥村，向周边各村铺开。这一面固然有应领主即代官

方面之请的成分，一面也说明：对古桥家豪农经营的稳定来说，超出组合村规模去伸手已经成了必要。

先是弘化四年（1847）八月，晖儿受赤坂代官所之命，管辖地最近各村的取缔之职落到了他头上。这是被委以祭礼、戏文、狂言等风俗的取缔与农业怠惰的取缔，从而取得了广泛干预各村生活的地位。

嘉永四年（1851），代官所委托他为设乐郡桑平新田这个“极难支之村”办重建仕法。他拟的解决办法是：役所拨下的借领款由前任名主偿还；欠凤来寺的债用卖百姓山（共有木材）的钱还；年贡与村中公费的欠缴部分，由各人各自卖掉自家的马来偿；井堰修筑的钱由代官所出；这村眼下的伙食钱由古桥家施舍十两，另外十两有余以无息分五年借给。其实行由晖儿奔走，大体照这条线重建成功了。这里的用意是：把代官那种只下命令了事的做法改一改，自己也出钱，好让村人生出重建的心气，给全村指出一条靠自力更生的路。

安政元年（1854），武节乡的黑田村、野入村来说要散讲。赖母子对资金周转困难的农民有融通的功能，各村入讲的人很多；一旦散讲引起连锁反应，破产者就会接踵而至。于是晖儿对两村缴不出赖母子份钱的农民，共出八十八两有余，无息、本金俟宽裕时再还，把这场散讲挡了下来。当时古桥家自己也入了好几个讲来筹钱，散讲会造成很大损失，还可能牵连酿造与放款的回收——他是这样判断的。

万延元年（1860），赤坂代官所又命他处理加茂郡闲罗瀬村名主罢免的呈诉，并办村方重建仕法。欠债累累的名主招来村人不信任而起村方骚动，赖母子讲散讲，伪造字据等等纠缠在一起，村里分裂、诉讼不断，闲罗瀬村被称作“本国第一难支之村”。晖儿到赤坂

代官所办公，作出裁定并施行仕法：不但换掉名主、让人退还讲款，还具体开出还债的处置、副业的保障等重建办法，把村人往自力更生的心气上引。这正是古桥家仕法的特色。

另一头，经历过饥荒与家计破产的晖儿，一向做着备荒储蓄的准备，在村内村外都讲囤米与备荒。把植林当作储备手段的想法，天保五年（1834）就见得到。天保七年，议定村内每户各育杉苗四十株，自天保九年起往百姓山（共有林）植林，只是还不彻底。天保十二年，改为全村共同育杉苗，把卖苗的钱按门户均分。当年文政年间（1818—1830）那场村方骚动，起因正是共有林风倒木的发卖。为挽回因那场骚动而失去的村中信用，他把共有林定为大家的，为着共同利用而带头提议植林。养成的树终归是要卖的；不过晖儿在这一阶段的想法，始终强烈地着眼于备凶年、备火灾的共同性，并不是那种要靠植林牟利的、以营利为本位的念头。

走向幕末政局

叹愿与诉愿的日子

饥荒的回忆

刚要进入天保年间的时候，古桥家正处在家业经营最艰难的关口。文化年间挨过小作骚动的顶撞，文政年间的村方骚动更把它逼到了退出村役人之位的地步。此后虽已复任名主，村中信用跌落却是明摆着的。贫困化步步加深，贫农与极贫农压倒性增多，阶层分化如此，文政末年的古桥家显然已近乎破产。

在这样的家计与村况之下，晖儿于天保二年（1831）以十九岁之龄代父主持家政，同时以父亲的名义充任名主。他先以当主的身份把家政重建纳上正轨，同时对贫困加剧、村落共同体行将解体的危机迅速作出应对，甚至不惜自掏腰包去重整村政；古桥家由此挽回了在村中的信用，也握住了领导地位——这些前文都已说过。

晖儿本人后来所回忆的“天保体验”，看去像是在回忆饥荒，其实核心大概是饥荒造成的家计崩坏，以及克服这一崩坏的那段苦日子。此后这段体验在晖儿的人生里被一再反刍，而始终贯穿其中的，是“村落不安定，自家也无从安定”这一典型的村方地主想法；这种以村落共同体为中心的取向，同他作为村落领导者的自信与责任意识互为表里。豪农晖儿的行事方向在天保年间就已成形，那么在此后开港、对外危机日益深重的条件下，它又会展开成什么样子呢？下面就通过晖儿几件有代表性的行动来看。

另外，以下的分析材料以晖儿留下的“杂记”“日记”一类为主。为了具体把握古桥家的动向，本书着眼于日记史料；至于古桥家的日记，通篇按年逐日的形式要到庆应二年（1866）才有，此前的部分则利用所谓杂记一类。

佩里来航与对政局的危机感

在佩里来航所象征的那股外压直接压上来之前，晖儿已经是这样一个人：代官所是幕府设在当地的派出机构，三河这边是赤坂代官所，他代表村落一年要去上几趟，同代官以下的官员都有来往。世局一步步走向开国，他原先只盯着家计与村方危机的关切，也就跟着牵动出对国政的危机感。对晖儿来说，代官所拿对外危机作由头催缴上纳金，等于逼他改掉那种狭义的村落本位关切，一步步把眼睛转向国政层面的课题。

晖儿留下的“异国船一件”文书里，头一件是嘉永三年（1850）五月稻桥村组合八村村役人呈报的在村铁炮清册。这些在村铁炮村里存了很久，径直把它们看作村方的武备是有问题的，但呈报的用意大概是：紧急时它们也能转成武力。只是附记里写着“**箭术等无人习练**”，这才是实情。异国船到来的冲击之下，豪农们也从此不断把村方的武备放在心上了。

一般地说，这与村方阶级对立的激化相呼应，为豪农阶层备武的意味日渐加重；不过如后文所述，稻桥组合村是山村，村方重整村落的办法又下得早，所以并没有因为佩里来了就立刻摆出鲜明的对外姿态。话虽如此，佩里来航这件事的影响还是波及了这片山间的农民，成了引动他们关心政局的划时代事件。

上纳金的要求

这一时期有稻桥村的《村用留》^①可据。这是晖儿身为村役人的记录，嘉永三年（1850）起的记事里，写着村落共同体所办的植树、山林修整、井堰修理、开山道、割草、贷放储粮、向凤来寺借款、村中祭礼、寄合、赖母子停会等事；而嘉永六年条下，八月十九日一条写道“因异国船事，奉命以金代纳者改运米上缴，遂叹愿”。这大概是九月十五日启程赴赤坂的晖儿，针对代官所催献金一事，叹愿不要摊派会拖垮村方的上金。他九月二十五日又去了一趟赤坂，十月四日回村。同役所几番折冲之后，十二月一日拿到了“异国船渡来上金御差纸”。

赤坂役所催缴上纳金的事，另有次年嘉永七年二月的《申渡》为凭。文中说：“近年异国船屡屡渡来，视其情形将起何等变革实难逆料；为在内海修筑御台场，其余种种也所费浩繁”——正当这样的時候，此前不曾向村里催征上纳金，须念作“仁惠”而“深怀感激”，视为“御国恩冥加^②”，为报此恩当缴上金。又说：远州与三河两处，一因“并无身家相称之人”，二因“近年歉收相继、村方困穷”，上金之命一再延后；而今异国船已到浦贺，“无支撑管辖的栓木”，故“若有人深加体察、愿怀感激之心缴纳上金者，可具报前来”。措辞是稍稍客气些，骨子里仍是役所拿对外危机作背景，向辖下各村伸手要钱。

① 村用留：村役人逐条抄录官府来文与村中公事的簿册，相当于村一级的公务日志。——译注

② 冥加：本指领民为答谢领主恩泽而缴纳的杂税。幕末对外危机时，代官所以“御国恩冥加”为名向辖下村落劝征献金，即所谓御国恩冥加金。——译注

对此，同年二月各组合村分别寄合，连同小前的连印请书，把上金办成了。这段前后的情形，从《村用留》里摘出来是：

一月十三日：“听闻异国船渡来。”

一月十九日：“发出组合回文，因武节一件与异国船渡来，起了争执等事。”

二月八日：“组合寄合，奉传异国船上金一事，本村评议。”

二月九日：“已向上述小前传达。”

二月十七日：“异国船上金由御代官传达，调印已毕。”

等等。顺带说一句，一月十九日所见的武节一件，是这年一月起于邻村武节町村的、要求更换村役人的村方纠纷。看样子，它是以“对外危机日紧，不是闹纠纷的时候”这样一句话被压下去的。

表 4 御国恩冥加金上纳表

①人名（上缴 30 两以上者）

	郡村	姓名	金额（两）
1	渥美郡二川宿	善藏	400
2	八名郡乘本村	八左卫门	300
3	宝饭郡东上村	弹左卫门	150
4	八名郡大野村	斧吉	45
5	宝饭郡太田新田	佐兵卫	35
5	幡豆郡小栗新田	半七	35
7	设乐郡稻桥村	源六郎	30
7	宝饭郡赤坂宿	五平治	30
7	渥美郡大岩町	八左卫门	30

（嘉永七年二月《赤坂在郡中惣代致赤坂役所请状》）

②按郡上金按村为单位办理，赤坂代官所的索金广泛下到辖内各村；村方交上去的请书，如表 4 “御国恩冥加金上纳表”所

郡名	金额（两·分·朱）
北设乐	202.0.2
南设乐	9.0.0

(续表)

郡名	金额 (两·分·朱)
八名	605.2.0
东加茂	12.0.0
西加茂	13.0.0
额田	83.2.0
宝饭	344.3.0
渥美	520.0.0
碧海	105.0.0
幡豆	35.0.0
合计	1929.3.2

示，接近二百两。表4里点名列出的，是村役人、地主、医师等人，也就是豪农这一层“身家相称之人”。他们是被指名要钱的，有力的豪农于是缴出大数目：二川宿善藏四百两，乘本村八左卫门三百两，东上村弹左卫门一百五十两。古桥晖儿是三十两，五月一日赤坂役所手代开的收据至今还在。他另外禀报说，日后一旦有需要，随时可以再拿出五俵米。或许正因如此，稻桥组合村摊到二十五两，其中稻桥村只摊一两一分三朱；村内则由二十二人各出一分到一朱，事情就此了结。

对于这样的上金，代官所在安政二年（1855）九月赐下了“御褒美银”。数目小得很，但佩里来航以来的对外危机感，在统治者主导下走完了“索金→响应缴纳→赐下褒奖”这样一个循环。到这一步为止，无论古桥晖儿还是这一带的豪农，对外部消息都还是被动的：接到代官所等统治一方递来的信息，再照着应对——这就是当时的实情。

安石代的叹愿

幕末开港以后的古桥晖儿，在以减轻村方年贡负担为目的的叹

愿上很见积极，比如请求御救与安石代^①。安石代的诉求，早在宽政年间与文化年间就已作为诉愿斗争展开过。宽政二年（1790），稻桥组合的野入、川手、中当、稻桥、押山、黑田、武节七村惣代向江户勘定奉行递上愿文；只是那时年贡折钱缴纳（即石代纳）尚未施行，遭奉行所驳回，没有下文。

接下来的文化年间，是在天候失常、稻蝗成灾、收上来的尽是瘪米之后，被逼到墙角才动起来的——起于文化五年（1808）十二月。这一回，安石代连同分十年左右按年摊纳的请求同样没有被采纳；但代官所的态度反倒让农民更抱成了团，进了次年，安石代之争便正式展开。文化六年二月，各村分别向赤坂代官所要求：按三州五处（吉田、冈崎、西尾、新城、田原）的平均上米价再打八折折钱缴纳。自这一步起，出面的惣代是古桥源六郎（此时是晖儿的先代义教）。结果这一要求又被代官所驳回，于是终于把官司打到了江户。

江户的官司又添上了上津具村的町方与山方。同年六年二月，他们向勘定奉行递了箱诉^②；

再到次年正月，源六郎与上津具村町方名主政右卫门向勘定奉行柳生主膳正行驱込诉。这一回愿书仍被打回直辖的赤坂役所，没有得到受理。文化八年九月，他们又趁勘定奉行柳生行经中仙道时行驾笼诉；到次年，稻桥村组头弥次右卫门（代源六郎）与上津具

① 石代纳、安石代：石代纳指把本应缴纳实物米的年贡折成货币缴纳，折算所依据的米价即“石代”。“安石代”便是请求把石代定得低些，从而减轻实际负担，是幕末村落最常见的减负诉求。——译注

② 箱诉、驱込诉、驾笼诉：都是越过直辖官厅的直诉方式——箱诉是把状子投进目安箱，驱込诉是径直闯进上级官厅递状，驾笼诉是拦住高官的轿舆递状。三者都逾越常规诉讼程序，风险很高。——译注

村町方组头喜兵卫（代政右卫门）更在江户向老中牧野备前守行驾笼诉，一步步升级上去。稻桥组合各村此前缴年贡一向被强令运米上缴，可山间地出的米品质差，只好另买米来替换，这一转手必然亏折，数目还不小；求石代纳的心思由此越积越重，终至于直诉。直诉虽做了，结果并没有回报，石代纳没能实现；不过同年九年十二月，为在江户买米上缴所亏的钱，准许借领六十七两。这对此后的叹愿倒是个好消息。

背后有惣百姓连印撑着的这场广泛诉愿，终于换来文化十年十二月的准许：自当年应缴份额起，按远低于三分之一价的价折钱缴纳。人在江户的源六郎义教带着正式通知书回了村。自文化十年准了石代纳，年贡缴纳上农民一方的课题就变成如何把石代的价压得更低，所谓石代纳叹愿也就一路持续下来。

到了因歉收而缴纳年贡为难的文久二年（1862），已任稻桥村名主的源六郎晖儿，再一次代表八村农民奔走于诉愿。

文久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晖儿参拜过氏神，在全村相送之下离开稻桥村，经加茂郡九久平抵赤坂宿，在这里向中西大人（大概是代官所的元缔^①）商量叹愿的事。有人对他说，就算再往上走到今川要作的骏府代官所，也未必见得着人；他还是执意东行。在大井川遇上“川支”（涨水断渡）滞留了两天上下，八月二十日到了骏府。他献上酒料金二百疋，多方设法，叹愿总算被收下，大意也得了准：上纳金的一半二百两分五年无息摊纳，余下一半里再分一半由晖儿代缴，另一半则“蒙代官大人御救”。事毕，晖儿向代官服部献上二两、向饭田献上三两等等，随即动身回程。路过赤坂时向元缔把一

① 元缔：代官所内总管钱谷出纳与文书的属吏之长，是村方同代官打交道时实际打交道的人。——译注

件始末说了一遍，闰八月一日回到村里。就这样，在开港之后田地歉收、米价腾贵、村方眼看要起波澜的当口，晖儿出面做了惣百姓的代表，连私财也搭了进去，奔走诉愿，终于逼得代官所一方让了步。前一年文久元年，他曾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想在村里组织农兵，却挨了村民的恶言，组织不起来（见晖儿自己的记录《积小录》）。有了这次教训，他不再先去宣讲政局危机，而是优先举起全村共通的课题——安石代，站到惣百姓的最前面。

去骏府的两个月前，即文久二年六月，晖儿还去中泉代官所叹愿过一回。那次中泉代官告诫他：本官自会尽力救济村方，故不可让小前们因为远州一带已经施行的安石代是“骚立”的结果、因而“误解”生事。而晖儿向代官所陈说的是：为了村里不出困穷之人，也为了求得没有骚动的太平日子，正该施行安石代，好让村民打心里感戴“御仁政”。

再有，晖儿求安石代的举动，庆应元年（1865）、二年也还看得到。身为村方地主，他盼的是村落太平；为了村里不出困穷之人而请“御救”，为安石代而奔走。

为免除助乡而赴江户

“法外之举”

文久三年（1863）八月二十九日，古桥晖儿以稻桥组合村惣代^①的身份，为叹愿免除助乡^②动身前往江户（本节据古桥会所藏文书《文久三年助乡一件书类》中晖儿的出府日记部分）。

这是为顶回中山道中津川、落合、大井三宿摊派的当分助乡而采取的行动。晖儿早已听说，接壤的美浓国惠那郡岩村、上村、漆原村、下村、小田子村已于文久三年六月呈上了免除大井宿助乡的叹愿。晖儿的叹愿主旨，是由稻桥组合十村联署呈上的。这一回的助乡，本是奉行所以“御印状”下令

派下来的，可是

① 安政二年（1855）七月那场“未曾有之水灾”的打击至今未能复原；

② 上述各村虽已改行定额石代金纳，却“因近年米价高抬，上缴的金额比往年多出两倍三倍，年成又是如此，必至难支”；

① 惣代：村或组合村推举出来、对外代表全体百姓办事的人，多由村役人层充任。——译注

② 助乡：江户时代宿驿人马不敷时，向周边村庄摊派人夫与马匹的徭役。被指定承担的村称助乡村，负担极重；临时加派的称“当分助乡”，请求免除是村方最常见的诉求之一。——译注

③ 这一回的人马摊派实属“法外之举”。

——凭这些请求免除。

这份《助乡差村免除愿》同样是惣百姓的诉求。晖儿动身时，“组合村役人诸位、亲属、小前”一路送到了野入村。他进信州、自饭田北上伊那谷，取甲州街道，九月七日在江户神田二丁目久保田屋源四郎处住下。

江户的晖儿

到江户的第二天起，他与久保田屋商量，先前递给三州赤坂役所的书面因有缺漏被退了回来，便决定重写；同时又商量从“御勘定大人三位、下役三位的查办”一直打点到道中奉行^①盖印这一路该怎么使力，先托久保田屋去一色山城那边“打点”（疏通）。

九月十日，晖儿到一色宅邸的木村长平家求见，递上叹愿书一通。木村一面说“贵公方出府之事，早已知悉”，一面又告知“免除一事，实难轻易办成”。他又去访了前田宅邸内的广濑达太郎，次日十一日带上金二百疋^②到黑川元缔的代理藤林家，还访了半藏门的諏访氏、三田内藤家留守居竹木斋等人。此外又见了据称是奉行所元缔的武藤林一、樱井久之助、岩田某、六番町代官今川要作、九段表的饭岛氏、御徒町的坂田氏等人，不时献上一分或二朱、一百疋的酒钱，还有真绵之类。另一头，九月十三日又请在江户替他跑腿的下代三治喝酒，佐以剥壳贝肉与溜酒二合，给下代荣治、与兵卫各一分，给下女二朱——出府日记里记着，他在各位役人与叹愿

① 道中奉行：幕府掌管五街道及其宿驿、助乡事务的职官，助乡的加派与免除最终由它裁断。——译注

② 疋：馈赠時計钱单位，一疋约合十文。文中的一分、二朱是金货单位（四分为一两，四朱为一分）。——译注

的中间人身上很花了些钱。而这些，日后大概都成了江户诉讼的花销，落到村方头上。

到江户以后的晖儿，几乎天天往上面这些人处跑，请托斡旋、听人指点改写书面，九月十三日书面总算递到了元缔手里。往这些人处，他并不只为助乡叹愿一件事去。比如十六日在前田家广濑达太郎那里，把叹愿的事一并托付之后，顺便打听了眼下围绕攘夷的政局：

① 告诉他长州的殿样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坏在家臣身上，所以幕府派了目付去；

② 说到和州一揆（天诛组之变），议论说“内部未先自加约束便贸然袭夷，实属办事不周”；

③ 萨藩递来的报告里，让他知道了萨英战争中十二座台场尽被打破的实情。

对此晖儿答以“农事出精之上恪守俭约，凡奉命差遣并无窒碍”云云，表示愿意协助建起攘夷的体制。

晖儿的出府日记里，这类关乎政局的记载不少，这里只提一件：他借着为助乡免除叹愿而出府的机会，拜入了国学者门下。叹愿办停当之后的九月十六日，晖儿去访平田铁胤；十九日又托甲州巨摩郡出身的田中贞治代为引荐。至于平田没后门人，另作一处交代，这里接着讲助乡叹愿在江户打官司的后事。

为免除四处奔走

且说助乡免除叹愿此后如何。这场叹愿，是晖儿与押山村组头新六二人做设乐郡十村（稻桥、押山、川手、武节、黑田、夏烧、小田木、御所贝津、桑原、大野濑）的惣代出面办的。九月二十日的日记写着“见了马笼利助、落合庄藏，中津川、大井尚未到”，可知

被摊上当分助乡的各村也都来叹愿了。这一天还记着“听说有三处准了全免，另有八王子当地十八个村一同呈请、获准附署……也有减五成的村子”，日光道中的助乡差村里也是如此。

到江户约一个月后的九月下旬，他还在继续打点：给樱井送鲙节二分、箱钱三匁，给今川、武藤各一分，又给武藤酒钱二朱，给山田一百疋，给坂田酒钱一百疋，等等。尤其把力气集中在今川要作身上，连他的用人也送了点心盒。今川借给他一部“于事有助之书”《良斋闲话》，还指点他把愿书再加几笔。这时晖儿的盘算是：“愚见以为，今川大人的心意实在难得；只是这几日免除一事若不略加奔走，怕是不会准予听取。”另一头，他又抓住耳闻的大和天诛组之变做文章，请求从速免除，免得闹出大和那样的一揆——理由找得正合时宜。

十月二十二日，晖儿被传唤，元缔要他添写“困难始末，先前愿书不妥；高免而里数又远之处尤其为难”一节，他便重新誊写了一遍。元缔在这里透的口风是：把不妥之处改过再递奉行所，除私领外，免除大概是准得下来的——他由此有了指望。

当天以及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他一再增补，到二十九日终于以惣代源六郎、新六联名，把一篇长长的叹愿文呈到道中御奉行所，先交给代官元缔樱井久之的助手上。这文书到十二月一日才递进道中奉行所；樱井那边还说了句“高免难涩，实属难办”的好话；半个月后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奉行所的裁断下来了。

从呈给奉行所的同月二十五日请书看，这一回的要点是：

- ① 武节町村、稻桥村在助乡勤高之内，“仅限此次免除八成”；
 - ② 其余八村在“当分助乡勤高之内，仅限此次免除三成”；
 - ③ 其中只有御所贝津村因确有窒碍，“当分助乡一项全免”。
- 就是这样。

次日，一色转达元缔的意思：再往上求就是“误解事体”，叫他们赶紧回村。晖儿等人却说“本村八成、别村才三成，这样回不得村”，动手准备再呈的文书。武节町与稻桥何以同其余八村分开处置，缘由不明；不过就这样回去，御所贝津以外那七村显然要不满，而晖儿自己似乎也对再呈的结果有把握。再呈文书的起草，因十九日江户市中出了尊攘“安民派”张贴天诛揭帖、进而闹成打毁的事件而拖了几天，到十一月二十三日重新递到代官那里。代官传话说“再往上就难办了”，晖儿则表明：不到“全免”，就算在江户过年也要撑下去。

助乡免除与凯旋归村

再呈的结果，是十二月十日被传到道中奉行所当面宣示的：

- ① 武节町村、稻桥村免除八成；
- ② 其余八村“御免除”，即“去十一月廿五日为止，当分助乡准予免除之旨御触”。

晖儿等人的江户叹愿，就这样大体如愿地拿到了结果。

晖儿一听完宣示，便去一色、今川、武藤、樱井、饭岛等处逐一道谢，十五日从樱井那里领到箱根的通行手形，与自信州佐久来的横滨行商同路乘船到横滨，在这里同商人分手，游了一趟横滨，对英国商船一类外国船与外国人显出兴趣。

自横滨起，取大磯（十七日）—三岛—骏府（二十日）—日坂—挂川—二川（二十三日）—藤川—足助—一路，十二月二十五日像凯旋将军一般回了村。这一天他写道：“来迎者甚众，归宿一同大悦。翌日役人来会，商议后每村各付四两，约定正月五日结账，用度出乎意料地少，一同大悦。”元治元年正月五日，这一件事了结。

晖儿在日记末尾安然写道：自己把十一个村看作一个村、把一个村看作一家，硬着头皮再呈一次，才从道中奉行所手里逼出了让步，“一同”欢喜，成了“和睦相处之势”“了结得休”。

天保年间以来晖儿一贯的村方本位，在助乡免除叹愿里也贯彻到底，那种要替老百姓说话的姿态读得很分明。人在江户，一旦免除的指望不明朗，他就担心小前一层会有什么动静——他警惕的是村落的“和睦”即一体感，被小前、贫农、小作各层的不满冲垮。同时，晖儿在江户的举动里，也含着并不单一收束于助乡免除这一目的的的成分：一是就尊王攘夷与对外危机而动的中央政局，他自有一套搜集消息的门路；二是拜入平田门这类事，属于村役人自有的文化天地。

草莽国学者的诞生

入平田门

古桥晖儿入平田门一事，前一节已略有触及：经三河吉田的神主羽田野敬雄介绍（在江户实际经手引荐的，是甲州出身的田中贞治），于文久三年（1863）九月十九日入门。顺带说一句，记载平田门入门者的门人录种类不少，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所藏的《门人姓名录》《誓词帐》，无穷会神习文库与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的《气吹舍门人姓名录》等，都是有名的；而在长野县的伊那谷、岐阜县的中津川一带，还能见到许多把《气吹舍门人姓名录》缩编而成的抄本。

笔者在调查古桥会所藏文书时一直在找与入平田门有关的史料。一是晖儿的记事小册《杂记》，从中可以看出他自出发赴江户到入门这一路的开销；二是上一节说过的《助乡一件书类》，其中夹着的日记更细地记下了他在江户的行止。总之，下面就以这两种日记类材料为凭，来看一个草莽^①国学者是怎样诞生的。

直接与入门相关的记事，最早见于九月十六日：他递完助乡叹愿后先回寓所，再重整衣冠出门，到秋田藩佐竹大人的上宅邸求见

① 草莽（そうもう）：本义为草野，指不居官位而在野的人。“草莽国学者”即身在乡里、以村役人或神职为业而治国学的一层人。——译注

“平田先生”，携去酒资一百疋。这一回“于玄关得见先生，略一寒暄，因先生正应接远方来客，遂禀明滞留期间再定日子”，便回去了。

第二天他又往平田处去，听到当时政局的几件事：

① “御老中板仓大人及其他各位”终于定下了攘夷的方针；

② 可是攘夷所需的“武备全然没有”，“兵粮米亦然，御金库也只剩帐面数字，闻之可叹”；

③ “大炮的费用虽已拨付，却被诸役人克扣，难以充作军用”；

④ 长州、萨摩“传闻两家俱已败走”；萨摩的生麦一件则是“公仪出金五十万两，其中十五（万）两由萨州收讫”——诸如此类。

平田本人只是把人的关切往政局上引，入门的具体事务似乎由他身边的门人分担。

晖儿从平田处退出来，平田的使者便追来，请他买笃胤新刻的板本^①。事出突然，他辞谢了；使者一面说“无可奈何”，一面又撂下一句“此乃学问之本”。意思大概是：既已入门，就该从买笃胤的著作开始。

来的使者，据说是甲斐国巨摩郡荆泽村的田中贞治（后名年胤，天保十二年〈1841〉入平田门）与同郡古市场村的矢崎清左卫门（豊长，文久元年一月歿后入门）二人，说是“同志之人”，闲谈种种而去。

第二天十八日，加贺前田宅邸内的广濑达太郎“携唐纸二枚并二百疋来，只作风流闲话”，谈了金井乌洲、赖山阳的名声之类。他又去良仙老人处，从其子手里买了“短册重胤、感治二枚”，并打听行情：“在京都，山阳半切一百疋，真渊短册五百疋，本居三百疋，

① 上木新板：“上木”即把书稿刻上木板付印，“新板”指新刻的板本。——译注

探幽半切二两。”这一回究竟买没买不得而知；不过从这时起，与国学、志士相关的东西，乃至地方书^①，他就开始买了。

入门当天的九月十九日，因笃胤的例祭已经延期，祭殿空着，他献上神酒钱二朱参拜；到傍晚，由甲州的田中贞治“引荐”入门。此前他听说入门金是一百疋到一两、门人披露代是一朱到二朱，于是递上入门金二百疋、披露金二朱入门；入门帐上写作“羽田野常陆介绍 三州古桥源六郎晖儿”。日记里记着：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平田先生的神灵，随后领了酒盏，才回寓所。

入门手续办完之后，晖儿留在江户期间仍常到平田家走动，其间买下了荷田春满、加茂真渊、本居宣长等人的手迹。十月七日从病中的铁胤那里借来《巫学谈》；八日托人办“虾夷歌、医者土产之歌”等；二十日到铁胤处，“奉命将冈部、本居两位大人与契冲的短册呈览”。二十一日又在江户西川岸的须原屋记下：“金六两，真渊、宣长；金四两内让二分，契冲、山阳；金一两一分二朱，月照。共计金十两三分二朱付讫。东磨的许多件暂寄存，其余退还。”此后从须原屋的采买一直没断。

表5 古桥家购书表

年.月	所购著书
文久 3.9	地方大成（天保八年版）
11	玉（灵）真柱（平田笃胤）
11	巫学谈（俗神道大意）（平田笃胤）
11	古今妖魅考（平田笃胤）
11	艮斋闲话（安积艮斋）
文久 4.2	直日灵补注（大国隆正）
2	本学举要（大国隆正）
2	音图神解（大国隆正）

① 地方书（じかたしょ）：讲村政、年贡、检地等实务的手册类书籍，村役人办事必备。——译注

(续表)

年.月	所购著书
2	驭戎问答（大国隆正）
庆应 3. 4	海防汇策（疑即海防汇议）
5	古史传（上木代）（平田笃胤）
8	和板三国志（奉纳羽田野文库）
12	古今集（纪贯之）
庆应 4. 1	圣迹图志·陵墓隅抄
4	贞丈家训（伊势贞丈）
4	行在所日志 1~7
7	和歌白浪集
7	回天诗史（藤田东湖）
7	弘道馆记述义（藤田东湖）

（以下略）

把晖儿入平田门前后所购的书籍与书画列出来汇成一表，就是表5。文久三年这一批，多半是趁入门赴江户时买下的。书是从平田笃胤的著作买起的，其中也有《地方大成》《艮斋闲话》一类村役人必备的书。

文久三年只进了赖三树三郎的字一件；一入庆应，铁石、三树三郎等志士相关的东西就多了起来，还出现了后文要讲的神武天皇与皇陵崇拜方面的书；而对水户学、尤其是德川齐昭、东湖、正志斋的关切之浓，也不容错过。庆应三年（1867）三月由江户须原屋寄到的一封信里写着：“……所订之内林子平、讷庵，一到手即当径寄。……（水户烈公）之物与山阳一路的东西、有日本魂的东西，价钱个个涨了上去，诚为难得之事。”由此可知，晖儿除赖三树三郎、东湖、齐昭外，也订购林子平、大桥讷庵等人的书。

这封信同时如实地映出与勤王志士相关的书画正在腾贵。我不想把它读成晖儿有投资的动机，倒愿意从中读出：他此时已经相当是个怀抱尊王攘夷之情的人了。

前面看的是入门的原委、此后国学与志士相关书画的采买，以及晖儿国学教养的变化；下面再尽量从多个侧面，考察一下晖儿入平田门这件事的意味。

晖儿的国学教养

先说晖儿的国学教养。他头一次读到称得上国学书的东西，是安政六年（1859）的《直毘灵》。据晖儿的传记史料之一《积小录》所记，把他引向国学的契机，是家里长女那桩不孝之事——迎了养子进门，却终于离缘。他重新立志要“正诚其志、积累善事”，而《直毘灵》所强调的“真心”恰在此时与他的心境相触了吧。与《直毘灵》同时又读了《玉铎百首》，“大有所感”的晖儿，其实已经受了尊王攘夷世风的浸染，触到了“神州”这一观念。

从安政六年遇上《直毘灵》，到文久三年（1863），正是所谓尊王攘夷运动高涨的时期。他不只是靠交游圈和买卖门路弄到消息，还想自己编练农兵，为南朝义士足助重范、尹良亲王作表彰。就这样，他抱起了相当强的尊王攘夷论。

再者，那时以信州伊那谷为中心，平田门下正大搞《弘仁历运记考》《古史传》的上木^①（刊印）助成运动。关于这场刊刻平田笃胤著作的运动，市村咸人《伊那尊王思想史》（1929）、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编《明治维新与平田国学》（2004）可以参看。受这场运动的推动，伊那谷与美浓中津川出现了大批入平田门的势头；正是它直接促使晖儿下了入门的决心，并取得三河吉田的旧交羽田野敬雄

① 上木：同上，指刻板刊行。平田门下集资助刻笃胤遗著，是幕末国学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译注

的介绍。看来，为免除助乡而赴江户这件事里，从一开始就把入门也编排进去了。

前面说过晖儿入平田门有尊王攘夷论的背景；不过那背景的性质，同所谓志士的似乎并不一样。单看古桥家留下的文久年间尊王攘夷派史料之多，就足以断定他是志士们的理解者；可他从来不曾有过抛下乡土四处奔走的志士式义举，入平田门也正在八月十八日政变之后、尊攘运动挫折的时候。入门之前，平田已有“攘夷叹愿辞谢不受”的表示，明明白白拒绝激派的活动；晖儿是认可了这一点才入的门。日记里对尊王攘夷派的动静记得很勤，但那与其说是对志士本身有兴趣，不如说是关切民族危机这个问题、关切志士插手谋划的那些地方的村方动向。他接受尊王攘夷论与平田学的方式，同一头扎进政治活动的那条路是不一样的。

水户学的影响

再者，晖儿在成为国学者之前先受过水户学的影响，这一点也须查考一番。《积小录》写道：“安政三辰年，晖儿与官吏意不相合，欲辞职去。然读源烈公所著《告志篇》《明君一班抄》，大为奋励，益欲竭力于国事。”这是说：他与代官所的役人起了冲突，动了辞去名主的念头；读了水户齐昭的《告志篇》与《明君一班抄》，才自觉到身为村政责任人的分量，越发勤于职守。

齐昭一面以当时现存的身份制——“持前”^①——为前提，一面严词戒飭身为统治者的武士阶级的精神堕落，讲统治者应有的责任自觉。日常起居“甘于粗衣粗食”、力行节俭，另一头又尽力于公益、

① 持前：各人生来所受的本分、职分。水户学以之为前提，要求各阶层各尽其分。——译注

图谋改良现状——对这样的齐昭，天保年间以来在村里同样力行节俭、为村政出力的晖儿，自然生出共鸣。

要说齐昭与水户学给晖儿的影响，最大的一点，是让他“身为村役人就该站在村民前头行动”的责任意识有了确信。这与那种以排斥他派为要旨的学问接受方式并不一样；对随后接受的平田学，晖儿想必也感到它与水户学有相通处。平田学中与水户学相通的成分，就是唤起村役人对村政的责任意识，一般称作“御依”^①论。把担当村政这件事的意义，用委任之说一层层往上追、终于追到天皇那里——这样的平田学，同身为村役人一向致力于引导村民的晖儿，心思上正好对得上。担当村政的这一层意义如此安放，平田学便与他呼应起来了。

再说，平田学还有祖先教的一面。笃胤在《每朝神拜词记》《玉禊》里，把民众固有的祖先崇拜与氏神祭祀传统接到神话中的皇祖上去，又把产土神、氏神一直排到国魂神，作出一套系列化的理论。这些原是把活在民众生活里的实际习俗收纳进去的，所以晖儿接受起来并不迟疑。

的确，他的入门是同祖先崇拜——祭祖的意识连在一起的。看古桥家的祖先崇拜，文久三年(1863)是个分水岭：七月办过祭祖，然后才入的门。晖儿本人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文久三年，乃自去天保二年七月廿四日变卖家财以来第三十三年。”那场祭礼，他说是“以变卖时收缴价银的期限张纸为挂轴，又陈列其时相关的诸帐簿与祖先遗物，聚集别家诸人，陈述祖先遗训……查核自前年七月至本年

① 御依（みよさし）：平田学的核心说法之一，谓天下万事皆由天照大神依次委任而下，故村役人所司之职亦是自天皇一层层委托而来，因此责任重大。——译注

六月的出纳，将贺仪金分与众人，供以酒食；毕后由别家诸人献上手制之物，遂创祭祀祖先之仪”（《积小录》）。

文久三年开始祭祖的用意，一半固然是着眼于这年正当天保二年(1831)以来的第三十三年，合乎“年忌”之说；但更要紧的是：家业已经重建，同族得以聚拢，而所入的平田门又把祖先崇拜的整套体系一并涵纳进去——这在晖儿一生的行程上，是一个很大的节点。

农兵计划与长州征伐的献金

兵的组织化

稻桥村的农兵^①组织化，是在晖儿主持下动起来的；至于农兵编制究竟办成什么样子，则并不清楚。《积小录》里写道：“文久元酉年，晖儿主张尊王攘夷，大与同志议事……又欲组立农兵，向居村之人无息无期限借出钱银，向组合村^②则无息分五年摊还借出，令其购置铁炮；每月一日、十五日在村社境内令其打靶，又令家族亲戚练习击剑。然不解时机者种种恶评，遂未能盛大。”

到了文久年间的第三年，如“为免除助乡而赴江户”一节所见，晖儿为叹愿免除助乡而赴江户。在那里承他照拂的赤坂代官樱井久之助告诉他，幕府要着手征集农兵，并征询他的意见。晖儿早在同年六月就买了铁炮（金四两二分），船料管、和管、焰硝之类也置办下了（《年内诸入费月改帐》），所以基本上对幕府的农兵是赞成的；不过他这样说道：

① 农兵：幕末各地领主让村民持枪操练、以备骚乱与外患的乡兵。多由村役人层出面组织，与后来的正规兵制不同。——译注

② 组合村：数村结成一体、共办年贡、治安、水利等事的联合体，是江户后期乡村行政的基本单位之一。稻桥组合村即以稻桥村为中心的一组村落。——译注

眼下辖地里代官换得走马灯似的，年贡又一年年加征，上下之情早已乖离，懂得“御国恩冥加”的人少，倒是“有诽谤御公仪者在”。所以要办农兵制，

① 一上来就练武艺，弄不好会让“恶党共谋恶事”，酿成“大害”；因此要紧的是请“武不如文”的人来做精神上的训导。

② 西洋操练一类得先有本钱，可“三州御辖地尽是贫村，眼下要摊这么大一笔钱，实在承受不住”；当下只宜“奉命令其习剑术，且不得妨碍农业生计”。

——他是这么说的（《农兵被仰出候二付愚意奉申上候样被仰出候故，乍恐奉申上候》）。接着，同是文久三年（1863）年底，对已从赤坂调往中泉的樱井，他又就农兵训练的办法说：

① 听说眼下正在谈判锁港；纵使真要攘夷，也难保不闹凶年，或者出“各村山野草场及其他地界的公事纠纷”，这些不能撒手不管。“力农为本，备荒自不待言，还要留心缴纳御军役金”——这是他的想法。

② 操练一事，宿方、町方每晚练，在方每月六次，山方则合并起来练。师范来时“各村定下时刻轮流受教，练完的村子立刻回去照料农事”。要紧的是不“妨碍农事生计”。

③ 操练器具虽说“可令有身家者出钱置办”，但还是尽量由官家发给为好。至于道场，则应“以村中公费兴建”。

——他是这么说的（《乍恐农兵御取立御仕法愚考奉申上候》）。

如上所见，即便对农兵制，他也是把维持农业生产放在头一位，处处留心不让贫村背上负担。正因为有这份体恤，一旦有事，人才肯“抛却身命”。这里已不像文久元年那样，只靠晖儿一个人的使命感悬在半空。对农兵制的想法，也可以说仍在“把村落稳住”这条线的延长上。

围绕农兵的代官所与村方

文久三年（1863）的农兵计划，看来终因代官更替而不了了之。可是到了第二年元治元年（1864），国内因长州征伐进入内战状态。于是代官所又以“须防禁门之变的长州残党流窜生事”为由，催促把农兵取极落到实处。这一自元治元年开始的农兵取极议定，始终是以组合村（此处指稻桥、野入、押山、川手、武节、黑田六村）为中心的（元治元年八月《取极议定连印帐》）。

其内容是：“各人自持铁炮，十人为一组，三组为一备”；组合内各村“都是小村”，故一村担一组之责，“名主巡视各备、居中指挥，组头则各充一备之头”；又定下“每月朔日、十五日在产神处行百度参拜，此外全村一同操练”的章程；万一有人身亡，则由组合村商议其家的相续之法。可见通篇都以村役人为中心，意在借既有秩序把村子拧成一体。这支农兵是以火器接战为轴心定下的；这年八月晖儿买了两挺铁炮，花去四两二朱（《年内诸入费月改帐》）。

与这份取极同时，六村的村役人联名向赤坂代官所递上了下面这样一篇叹愿文。

文中说：各村起初想过编竹枪队，可百姓见了白刃就发怵；“本村与御城下相隔，若恶党多人拥来”，根本防不住。而且“预备年贡上纳金时，也有被恶党强夺之虞”。因此想“立四五里方圆的大组合”，把眼下因“各给地互相入会”而无法归拢的兵器统一起来。总之是先“立大组合”——即先让组合村在行政上得到认可，然后再编农兵（元治元年八月《乍恐以书付奉愿上候》）。

稻桥村与周边各村的管辖犬牙交错：稻桥、野入、押山、川手、黑田、武节六村是幕领（代官管辖），夏烧村属内藤金一郎领，小田木、御所贝津村属一色丹后守知行所，大野濑、桑原村属諏访勇

一郎知行所。不过旧武节乡十一村想必早已把组合村式的结合坐实了，所以他们是想借组合村这一单位的团结，把多年悬着的乡土防卫体制搭起来；另一方面，把铁炮归到组合村统一置办，也含着减轻农民负担的动机。面对想借长州征伐——内乱之机编练农兵的代官所，村方也拿出了以组合村为规模、大概正是豪农根基所在的那一套应对。毋宁说，从村方来看，或者说从豪农古桥晖儿的逻辑来看，是想趁这个机会，把组合村规模上的一体化、团结之势鼓动起来。

一般说到农兵制，人们想到的是武州农兵、出羽村山农兵，其特征被归结为镇压下层民众起事的武力性质、农民武装化的武断性质。相形之下，稻桥组合村里动起来的农兵制，并没有那种战争前夜似的紧张感，此后也不见动用武力的记录。这一点，须同“村落共同体的团结逻辑还能有效运转的那层土壤尚未崩坏”联系起来考察。

豪农的献金

幕末豪农的献金，可分为：①献给幕藩领主阶级的，②支援志士活动的，③其他文化性的献金。这里要讲的是古桥晖儿向赤坂代官所献金的原委。嘉永七年（1854）因异国船到来而上缴“御国恩冥加金”一事前面已经介绍过，所以这里只谈长州征伐时向代官所献金的经过，以及晖儿因此得到苗字御免^①特权的一段。

长州征伐的布告，压垮了那些平时就为财政窘迫所苦的出兵各藩，还把供进大军住宿的宿场町搅得一团乱。元治元年（1864）九月，赤坂代官所直言不讳地说：“本御阵屋所属东海道二川宿以外三宿的人马转运及马饲料等项都难以支应”，代官所想给各宿拨出借

① 苗字御免：江户时代百姓原则上不得公称姓氏，因献金、功劳等由官府特许其在公文书上署姓，称“苗字御免”，是身份上的重要恩典。——译注

贷金，却没有这笔本钱，于是希望辖下的豪农层出钱。这笔钱按年息五分，“自来年丑年至巳年，分五年摊还”——出金的要求就是这样提出来的。应下来的，如表 6 所示，连晖儿在内共十二人，计一千三百两（元治元年九月《差上申御请书之事》）。

表 6 元治元年九月向赤坂代官所出资者

郡村名	姓名	金额（两）
渥美郡二川宿	田村善藏	200
" 吉田新田	左兵卫	100
宝饭郡东上村	弹右卫门	200
" 赤坂宿	五郎左卫门	100
" 御油宿	将左卫门	100
八名郡乘本村	菅沼八左卫门	50
" 大野村	五兵卫	100
幡豆郡小栗新田	半七	100
碧海郡前浜新田	周助	100
" 葭生场村	新七	100
北设乐郡稻桥村	古桥源六郎	100
" 西路村	八左卫门	50
计		1300

（元治元年九月，《差上申御请书之事》）

献金要求的一番问答

庆应元年（1865）五月，将军德川家茂为再征长州要沿东海道上洛，路经赤坂宿。为此赤坂役所照直下令要各家出钱，晖儿也应了下来。这段原委，且看《积小录》怎么写。

起先是被要求献金一百五十两作长州再征的费用；晖儿这边则说：

接连不断的凶年、虫害、大地震、大水灾使救助米不敷，非买进二百俵米不可。当此之时，若减到一百两、分三年上缴，还可以答应；再加五十两，实在为难。赤坂代官田上某（宽藏）听了，说

一句“闻尔奇特之事”，随即抛出条件：“为官出二百两，即可佩苗字”——献金就给苗字。晖儿却回说：幕府正如履薄冰、岌岌可危之际，苗字算得什么；以备米防住“人民动摇”，那才是“报效于上的大功”。

不过结果他还是接受了三百两分五年上缴。幕府眼看不保、比起领苗字另有该做的事——这话是不是当面说的并不确定，多半是后来追记时添上的判断；事情了结的方式也显得有些突兀。下面就从当时的史料（庆应元年五月《御进发御用并闻书》）出发，追一追经过与晖儿的思路。

献金与苗字御免

庆应元年（1865）的献金问题，起于五月九日赤坂役所的一道触。触里说，因长州征伐，要“收买各村百姓的作德米^①”，故各村须开列出米的石数。稻桥村与其他村的村役人们答说：本村连夫食也只够半年，请“免于收买”——就是说拿不出新交的米。役所见没有效果，便撤了这一条，改为摊派上纳金。同月二十四日发出回状：“各按分限，从速具报上纳金。”这大概是想让豪农们自己写出献金数目，借以看看他们对代官所的忠诚。晖儿当即定下上缴金一百两，只是“一次上缴实难办到”，所以一百两拟分三年缴：本丑年三十两，寅年三十五两，卯年三十五两。又说，这三年里只要不出“本村及组合各村难支”的事，辰年愿再缴二百两。

这一回的愿书里，稻桥组合各村先陈明：①地处“极山之中、严寒而地薄”，“土性瘠薄”；②苦于猪鹿之害；③按村高算家数、人口

① 作德米：地主收租后扣去年贡所剩下的、可自由处置的那部分米。——译注

偏多，又是高免的地方。再举出“去天保七申年饥馑之时，言语书信难以尽述……自本丑年往前数第三年的卯年，即安政二卯年，遭古今未曾有之大水害”，说本村与组合各村救这样的“危急难支”已经竭尽全力，“上金一事”实难充分应命（《乍恐以书付奉愿上候》）。

这里以天保饥荒及其所遗下的村落危机为据，明明白白地表示：始终要站在村方本位的立场上。

带着这封书信，晖儿五月二十八日动身赴赤坂；第二天闰五月十一日，同其他有力农民一道被役所示以数目、勒令上金。数目仍是一百五十两。此后双方还要几番折冲。

对着请求减五十两的晖儿，役所一面把愿书“驳回”，一面劝道：若肯出一百五十两，便可“苗字御免”，也算尽了“先祖之孝”。晖儿则回道：“报请苗字之类，乃二三十年前的事；如今这般时局，怕不是做这个的时候罢。”他要减掉五十两，把这笔钱转去“救济穷民”。这话招来批评：“尔总只想着下头，全不体谅上头。”他反驳说：之所以留意“救济下头”，正是“为着上头着想”。然而在代官所的一再强求之下，终究以“知晓御国恩”的凭证为名，成了“加倍献金三百两”，并以三百两为前提获准分五年上缴。

另一头，赤坂代官所不只找有力农民，也向辖下各村要献金。稻桥村同另外五村合计报了五十两以上。这一回走的是这样一条路子：哪怕数目很小，也向多数农民摊派，再由村役人汇总上缴。另外，这份文书递上去不久，稻桥、野入、川手就遭了大暴雨（井堰与桥被冲走、山路塌毁），故获准减额，六村共缴四十五两有余。

对上述在献金上的出力，同年七月中旬代官所来了通知，要他

备好祿^①，往已调任远州中泉阵屋的田上宽藏处去。同月二十五日便在中泉领到了因进发御用途上金而给的褒奖：“以为褒奖，准其父子两代冠苗字。”

顺带一提：“苗字御免”这天，晖儿在中泉付礼金、贺仪约花去金三两一分三朱，加上回程在赤坂的贺仪，共支出金四两一分。走近自己村子时，同族的人带头出来迎接；家里则记着“禀告屋敷神，随后于佛前接续御书付，读与别家诸人听，并出酒”。就是说，苗字的正式许可，头一件是要向古桥家的屋敷神禀报；同族的人一道贺喜，数日后的八月四日又办了一回“苗字御免披露”。

不过话说回来，晖儿实际献出的，只有庆应元年八月的六十两与庆应二年二月的六十两而已。这年庆应二年长州征伐一停，这桩献金的话头也就成了废纸。

① 祿：上衣（肩衣）与下裳（袴）配成一套的武家礼服，庶民在拜领恩典等正式场合亦须着用。——译注

信仰生活的积极化

村里的信仰状况

古桥晖儿在幕末最上心的，是把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拧紧——这一点前面已从几个侧面看过。这里再从产神^①信仰、祖先信仰以及伊势信仰日趋积极这几个方面，补作一番考察。

从《积小录》里拈出相关条目，可举者如下：

① 晖儿因户田大和守奏请修复山陵^②而欣喜，元治元年（1864）参拜了亩傍山的神武天皇陵，自次年起每逢四月十一日举行祭典；

② 同在元治元年，“以祈年、新尝两式示居村之人”，在村社举行了祭典；

③ 在东加茂与北设乐两郡交界的伊势神峠设遥拜所，九月十七日举行祭典——诸如此类。

翻开自嘉永三年（1850）起有记载的《村用留》，开港前夕这个村的信仰状况便看得出来。《村用留》是晖儿身为村役人留下的记录，嘉永七年以前记得较细，此后就断了，所以只能就嘉永年间来看。首

① 产神（うぶすながみ）：出生地的守护神，与氏神原本有别——氏神是同族共祀之神，产神是一方水土之神——江户时代以后二者渐渐混同，本书中的用法也基本相通。——译注

② 山陵：历代天皇的陵墓。幕末文久年间，宇都宫藩家老户田大和守（忠至）奏请修复荒废已久的诸陵并得旨施行，被朝野视为尊王的实绩。——译注

先看得出，古桥家的氏神信仰已经进了村里的行事。此外还有全村的惣日待^①、这一带盛行的秋叶山诸事、念佛与观音祭等等，都已年中行事化，再加上丰年祭与别的祭礼。另一方面，因村内资金周转不开而停办的赖母子^②、异国船上纳金一事，以及事关全村命脉的水源、与井堰相干的纠葛等等，都要开全村的惣寄合、出全村的惣出——共同体惯行之强，于此可见。

再把庆应年间与信仰有关的事项从古桥家日记里汇总出来，便是表7。可以看出，比起早已年中行事化的惣日待、弁天祭、观音祭，产神信仰积极得多。这产神百度参拜^③，到庆应四年五月以后已变成全村的惣参拜。在稻桥村，古桥家的产神成了全村的守护神；加之伊势信仰在庆应末年迅速积极化，晖儿本人与长子英四郎虽是各走各的，却都出门参拜了伊势神宫。

作为村落凝聚纽带的信仰

这里把庆应以前与信仰有关的记载拾掇一下。“为免除助乡而赴江户”一节里说过，晖儿为叹愿暂免助乡而滞留江户期间，文久三年（1863）九月至十二月，往汤岛天神、神田明神、浅草、水天宫、传通院的参拜一次也没落下。就头一层意思说，那是祈求免除助乡能够如愿；不过从中也读得出，他对神祇一般的信仰正在积极起来。

① 惣日待：全村人聚在一处彻夜守候日出、祈求平安的民间信仰活动。“惣”即全体、全村。——译注

② 赖母子：又称无尽讲，成员按期凑份子成一笔款，轮流或抽签取用的民间互助融资组织；一村资金周转不开时便办不下去。——译注

③ 百度参拜：在神社的社殿与鸟居之间往返一百趟、每趟礼拜一次的祈愿方式，愿重则次数多。——译注

表7 庆应时期的信仰

	庆应二	庆应三	庆应四
	次	次	次
产神百度参拜	13	13	23
宫社祭	1	1	4
伊势神宫遥拜、参拜及祭典	1	9	11
参拜伊势神宫	1*	1*	1**
金比罗 参拜	1		
秋叶山 代参	2	2	2
天神祭	1		
弁天祭	1	1	1
观音祭			1

• 源六郎 ** 英四郎

（庆应二～四《古桥家日记》）

未收进表里的记载还有：出府期间文久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氏神祭礼之日，供御供饼、御神酒，其后往奉行处稟问”；十月七日“国里来信，闻攘夷之命已下达上州、周州、阿波、备前，近日复有伊势行幸之事，遣信四郎（晖儿之弟）代为参宫”云云。由此可以推想：在对外危机之下，他为祈求攘夷而迅速倒向了伊势信仰。据日记，在伊势神峠设神宫遥拜所，是庆应三年（1867）四月下旬的事。

说到产神信仰，元治元年的《取极议定连印帐》里有一条：“每月朔日、十五日往产神处百度参拜”，参拜之后再操演农兵。到庆应二年以后，每月初一、十五参拜产神便固定了下来。起初似乎多是晖儿一人去；但如前面指出的，到庆应四年，已经发展成名副其实的全村百度参拜。

值得注意的是：信仰趋于积极的整个过程，自始至终都背着强化村落凝聚这一课题。把氏神、产神信仰连同伊势信仰一并积极推起来，用作村落结合的原理——这正是骨子里是村方地主的古桥晖儿，应对幕末政局变化所走的路。

就眼下作为分析对象的这段时期而言，把村落信仰生活的积极化直接接到中央成立的天皇制上去评价，我是不赞成的。总之，晖儿在幕末以村落为中心所作的多方面努力，并非只停留在主观层面，而应当认为它下面确实垫着村落这一层基础。

庆应二、三年的行动与情报搜集

祈求康复与伊势参拜

庆应二年（1866），暉儿一面在二月缴清了摊派下来的上纳金^①六十两，一面又在四月办起神武天皇祭、六月出门去伊势神宫——对尊王论这一足以取代幕府的权威，他倾斜得越发厉害了。

这一年暉儿身体不好，到六月竟至卧床。在此之前，二月十七日的日记里，源六郎之子英四郎、英四郎的后见^②浦四郎以及唯次郎等人，计划“因病许愿，往赞州金毗罗参诣”，并请求发给通行京都、大坂的印鉴。二月二十日英四郎与浦四郎动身；四月里记着，英四郎、浦四郎这趟金毗罗参拜共花去二十五两三分二朱。暉儿本人六月十日启程去伊势参宫，同月二十二日回家；六月二十七日记着“源六郎病气平卧”，直到二十九日仍写“平卧”，可见他确实多病。饶是如此，八月二十五日、十月六日、十二月十二日仍有动身前往设有代官所的赤坂的记载；去一趟赤坂平均得六七天，也就是要离家一个星期上下。

① 上纳金：幕府或代官所按村高摊派、令村方分期缴纳的献金；“割赋”即摊派分缴。——译注

② 后见：家督继承人年幼或不能主事时，代为主持家务、对外具名的人，多由近亲或有力村人充任。——译注

另一头，八月晦日发出的一封信从中津川的国学者马岛靖庵那里寄到。接着又有该人九月三日收讫的一封信。信里说他想在九月七日或八日到稻桥村来，同时还写来了几条消息：从苗木藩的消息里得知，中央政局上将军宣下已“迂下”；水户藩方面则是“奸中”^①内讧分裂，市川三左卫门等六十人出奔；又说“尾老源尊公”——即前尾张藩主庆胜——“大立正义，闻其勉励”云云。这些消息，是从有别于赤坂代官所的另一条国学者门路上进来的。马岛果如预告来到稻桥村，此后便寄居村中，办起家塾，教起子弟来。古桥家的长子英四郎（即后来的义真）就从靖庵受业。

进了庆应三年，晖儿的身体仍不见好，二月一日又一次“平卧”；英四郎便到村社八幡社作了百度参拜。说到晖儿的病，六月下旬他一面说“俟全愈即出勤”，病却“转重”，连组合的寄合也没能到场。到庆应四年二月八日，又记着“源六郎时病病中大发”（原文如此），看来病情一直未见起色。这段时间他屡屡出门去伊势参宫，想必也含着祈求康复的意思吧。

三月十三日，晖儿亲自动身去伊势参拜，二十二日回家。这一趟花费是金三两三分三朱。也许是直接跑一趟伊势负担太重，四月二十七日记有“石神峠遥拜所（祈）祷始”——他要从稻桥村的邻村加茂郡连谷村境内的伊势神峠遥拜伊势神宫。在伊势神峠立遥拜所的动议，看来起于元治元年（1864）；真正着手兴建，却要到庆应三年才有。

进了六月，为定遥拜所的地址，周边各村都派人来会商，最后定在出土古钱的那块地上，六月十四日搭起了各处工棚。遥拜所的

① 奸中：水户藩内尊攘派对保守的诸生党一系的蔑称。市川三左卫门是诸生党的首领。——译注

屋宇一落成，以古桥家为首，到这里来参拜、遥拜伊势神宫的就多了起来。

八月一日，参拜了伊势神的遥拜所，全村向产神作了百度参拜；次日八月二日，晖儿便动身去赤坂叹愿安石代了。至此，神信仰的积极化与村政上的动作，已经紧紧地咬合着一同转动。晖儿下一回上伊势神峠、遥拜伊势神宫是在十月二十二日，为的是“因内宫御被降下，故奉送于遥拜所”。十月里降到古桥家的神札，是伊势太神宫与金毗罗宫、地藏；至于这一带的降札^①何以与伊势信仰关系最深，留待后文另说。

情报的搜集与降札

虽说住在山村里，豪农古桥家在元治、庆应年间搜集情报却既起劲又广。这在日记上也看得出来。江户方面是须原屋铁二郎、千叶重太郎、黑川新兵卫，京都方面是伊势屋久兵卫，此外周边一带尤其倚仗草莽（在野）国学者的门路：三河吉田的羽田野敬雄、佐野蓬宇，三河舞木的竹尾东一郎（正胤）、三宅丰前，美浓中津川的市冈殷政（正藏）、菅井正兵卫（正矩）、间半兵卫（秀矩）、马岛靖庵（年成）、肥田九郎兵卫，美浓大井的林茂右卫门、佐藤清臣，近江高畑的小野湖山——或书信往还，或登门造访，世间瞬息变化的消息就这样一条条到手。政局越绷越紧，晖儿即便身子不爽利，赤坂代官所还是要去，去叹愿安石代，设法躲开当分助乡。十一月十四日他动身赴赤坂，同月二十二日回家——庆应三年的古桥家日记，记

① 降札（お札降り）：庆应三年秋起自东海道一带、蔓延至畿内的骚动，传说伊势神宫等处的神札自天而降，人们遂聚饮歌舞相庆，即翌年“岂不快哉”（ええじゃないか）之乱的前奏。——译注

到这一天就断了。日记的末尾，有一段把稻桥村与周边各村降札情形汇总起来的记述。下面就把这一年后半段里较为醒目的降札记事整理一下。

早在八月五日会见吉田的蓬宇时，晖儿就听说“御祓降下，吉田大热闹”，知道了降札正在流行。日记里下一条与降札有关的记事，是九月十一日记远州滨松城下的光景；三河方面则是九月十七日设乐郡的“上边来的御荫（信浓）自根羽送来，借狂言戏装等，喧闹一场”。接下去还有三河国加茂郡足助町的“略有骚动，似所费不赀”、九月十九日的“闻新城御荫用去八箱”、九月二十一日的“足助御荫，西町跳七福神舞，随后年轻人一同入迷”等记载。

稻桥组合村里数野入村最早：夷讲^①那天、即十月二十日，记着“内宫御祓降于久吉家”。第二天二十一日，稻桥村的源六郎以及文治郎、平助家共降下六枚，其中一半是太神宫的札。二十三日又写下庆宴的情形：“嘉助家降金毗罗样二枚，平助家降内宫御祓，村中游日，酒五升二樽，产神开。”降札一直密集到十月二十四日，并波及周边的武节町村、桑原村、中当村、明川村等地。到十二月仍断断续续有降札；稻桥村最后一次，是庆应四年（1868）二月七日太次郎家降下秋叶山的札。稻桥村的降札，计伊势皇太神宫十二、金毗罗七、秋叶山五、津岛牛头天王与凤来寺、善光寺各三、丰川稻荷二十二、高野山与御岳、地藏、水天宫、长命寺观世音各一枚，共四十枚^②。

随降札而来的庆宴上摆出的酒是九升六合。其中一半的酒钱十七匁二分八厘，由源六郎晖儿掏了。又，十月三十日记着“武节甚

① 夷讲：商家于十月二十日祭祀惠比寿神、祈求生意兴隆的节日。——译注

② 原书所列各项相加与“共四十枚”之数不合，今仍其旧。——译注

三郎、为助，桑原浓吉，御荫谿来”云云。可以说，这场骚动并没有把此前的秩序摇撼得太厉害，温吞吞地就平息了。

对“御一新”政治的期待与参与

与平田没后门同志一同出仕

错综的消息与混乱

年一改元，进了庆应四年（1868）。元旦这天，晖儿与英四郎父子照往年的样子，先向产神行了礼，随后在村里办“年礼”，也就是新年团拜。晖儿又打发弟弟信四郎去伊势神峠，遥拜伊势神宫。这一年正月到三月，古桥家的日程是：正月十五日往产神作百度参拜，次日十六日英四郎去遥拜伊势神宫，村里人办惣日待；二月初一作百度参拜，同月初三英四郎往伊势神宫本宫参诣，同月十五日又作百度参拜，三月初一办官社祭——诸如此类。古桥家与稻桥村在神信仰上的积极化，于此可见。

庆应四年以后送到古桥家的消息，映出的是一派乱纷纷的政局变化。

正月初五，美浓大井的长左卫门来，说是“岩村藩赞成，大混杂；丹羽濑、大山蛰居获免；尾州有人前来”云云，又说“岩村传闻：两御丸失火，加贺与萨州宅邸被烧，该藩与幕府有过交手”。初七，原水户藩士田村恂之介从甲府来，讲江户的动荡：幕府为对付浮浪之徒，烧了江户的萨摩宅邸，“天帝移驾横浜之夜起火”。田村逃了出来，藏在甲州黑驹的武藤藤太家；后见甲州石和役所出的告示，断定时势仍旧因循，便决意上京，途中顺路来的。

正月初八收到三州赤坂代官所的回状，说萨邸浪士在市中行凶，野州等处又出了“非同小可之事”，故加以火攻；又说逃散的“可疑之人”若来往此地即行拘捕，敌不过时格杀勿论——这是庆应三年十二月晦日发出的文书。同是初八，还到了正月初二发的一道通知：江户近郊的浪士三四十人逃往骏、远、三三国，若有人投宿，即行拘捕或速报。

正月初九，信浓国伊那郡饭岛一带的人参宫回来路过古桥家，讲了名古屋的传闻：京都伏见的大会战把周边烧成焦土，东海道上往京都去的武士很多，连去金毘罗进香的人都把参诣搁下了。初十，从名古屋来的仁三郎说尾张、土佐两藩都有死伤；庄二郎则说在美浓大井从松本的飞脚那里听来：新选组在京都伏见，四面被长州兵围住，初四要拦下关东兵入京，遂起战事；新选组杀出，于是京都、伏见、淀三处都打了起来。

十二日，半三郎从赤坂役所贺岁回来，顺路进来，把听来的传闻记下：“大坂之兵年初入京，遂起战事；关东兵败退，追击之下遇伏兵，官军亦被打死三千，只三四十人得活；冈崎地方的人充作步役，箭矢如雨而来，只得裹着夜被逃亡。”（原文如此）

另有正月初六小川宇右卫门的一封信，讲正月初三伏见之战的情形、长州萨摩一方的胜利、会津桑名的败走、京都市中的混乱，以及正月初四击退会津兵一事，还有官军编成的情形。又，初六那条记着平田铁胤上京后说了句“大愉快”，还讲了前一年十二月萨邸浪士队的同志抵京的事——看来小川也是平田门下的国学者之一。

正月十三日，加茂郡明川村的清兵卫从名古屋回来，说“闻桑名老幼男女已迁往乡间，又云已经落城”；从冈崎回来的三次郎则说“闻会所仍照旧例办理”，也就是说这一带的管辖照旧。同一天，设乐郡小田木村的代治来，说大垣藩被上方兵（萨长军）扼住关原而

据城自守，岩村藩因此要着力守住国境，并托他们：敌军一旦来袭，务必火速报知。

十四日，往设乐郡津具村收账的三次郎回来说，津具村传闻“横滨有夷人多人被杀”。又说同郡名仓村有位妇人去金毘罗进香，家里人十二日到桑名去接，那里正“大为动摇，家家收拾行装，连榻榻米也搬走了”，只好半夜动身赶回。这一天，邻村武节町村的三次郎从冈崎回来，说冈崎也是家家收拾细软准备出逃的光景。

正月十五日，晖儿正为棉花的托运耽搁发愁。又，信浓国伊那郡根羽村的长治来信说：“前夜江户火消五千人开赴御领；败退回乡的人里，有手掌被炮火所伤者投宿；闻上方大变。”——关于政局的风闻就这样一条接一条送来。到这个地步，晖儿棉花的买卖做不成，烟叶也发不出去，只怕“照此下去，问屋同马夫都要撑不住”，便找相关的人商量。他真正忧心的，正是战乱会给豪农的商号经营、以及靠这营生过活的那些人带来生计上的不安。又，从岩村回来的只次郎说：“岩村动摇：一伙赌徒廿七日过落合，说是要往岩村去，同宿的人报作浪士；后来知道弄错了，才平静下来。”消息就这样错杂纷乱。

十六日，英四郎去伊势神峠参诣。加茂郡小渡村的利八代来，说尾张藩曾被“公边”——即幕府一方——请去做帮手，藩里辞谢了。又据甲州韭崎一带参宫人的话：京师初二夜，自大坂乘夜船而上；会津四番队一路杀开，不料藤堂之兵倒戈夹击，关东兵大败。暗峠开来骑兵二百骑，拆去身后的桥；本以为是自家兵马的藤堂军，却以大炮轰来。问津地通行如何，答说：先前问时是平静的，也说是设了守备；总之各处一问，勤王之家都已安定。问到桑名，则说十三日已开城交割。又说御敕使将要驾临。

德川的败北与官军的动向

到这里终于弄清楚：德川一方败了，在萨长军的胜势面前，连尾张藩都正从佐幕、中立转向萨长、官军这一边。认清这一政局变化之后，十六日晖儿在村里办了惣日待，就着这个场合向小前们讲天下形势，讲事事都要俭省，还“把铁炮等项一并申飭管束”——也就是为乡土防卫先把铁炮的下落一一查清。这些，大概都是在讲万一有事时该有的心理准备。

次日十七日，冈崎的金藏说他在饭田听来：彦根藩出兵关原去帮萨摩、土佐，将军与会津、和歌山一方败了。这不是事实；不过上方一带萨长军占上风的情形，就这样虚实相杂却一点点确实起来地传了过来。到正月十八日，三河吉田羽田野敬雄的信到了。信写于正月十六日夜，内容是正月初三鸟羽伏见一战的经过与萨长军的胜利；初四仁和寺宫拜征讨大将军之命，进驻京都东寺，尾张、土佐、因（幡）藩、萨摩、肥后、肥前诸藩兵担任警备；到初六为止，藤堂（津）、井伊（彦根）、稻叶（淀）也加入了官军；再有幕府军大败奔逃的样子——比此前任何一条消息都准确。信里还说：

因此德川庆喜已成朝敌，追讨的御告文分交诸家的京都留守居；本城（吉田）也由京都留守居带回，实在闹得沸沸扬扬。

信中还讲到，羽田野同新住宿的饭田武兵卫等人一道上京，从中斡旋，促三河吉田藩转向勤王誓约。又说京都的朝廷一方如今势如破竹，“中泉、赤坂（代官所）不日也当撤去，此节还望知悉”——这是以国学同门的身份给的忠告。

高松队与赤报队登场

正月二十四日，草莽队之一的高松实村队有两人到稻桥村来住下。官军东征的动静，终于直接压到了这片三河山间。次日二十五日的日记写道：“夜间绫小路一番队来了两人，其中一人是平田门下；同夜一番队另有人宿于大井。因是折返，宿在本地的说法不一。”与日记相关的册子《王政复古·完》里，录着正月二十三日肥田九郎兵卫的信与二十四日间半兵卫的信。肥田在信中写作“说得师高松殿，追讨师绫小路殿”，又通报岩村、苗木两藩的动向。

间半兵卫秀矩则把他在关原宿抄下的东西转录过来，记东征官军先锋队绫小路队的人数：

一、御上二人 绫小路殿、大原三位殿之少君

一、御侧八人，

一、军议五人，为首者佐贺良惣藏样、吾妻伊佐雄（样）、
荒井俊藏样、春田耕作样、铃木三树三郎样

一、一番队 菅沼八郎

一、二番队 市川 某

一、三番队 “(缺)”

一、彦根队长 三浦东藏以下六十余人

一、新井队 岐阜赌徒水野弥太郎六十六人

一、小荷驮方二十五人

一、御马弁当五人

一、郡方大炮队十五人

一、竹中组五人

总计三百七人

此外加纳添六人，一说是五十人

文末还写着：“人数或将陆续增加亦未可知；新井队都是赌徒一伙，人品实在很坏。”

高松队与赤报队的消息，虽各自经由豪农的情报网传来，却一直相当不准；又因听说岐阜的赌徒也掺在里头，古桥家似乎连钱也没有出。另外，二月初六的日记里写着：“日前绫小路一行渡桑名，连小舟一并尽被生擒；据说全是假冒的。”至少那支从名古屋折回的赤报队，当时是被理解为“全是假冒的”，所以才被擒的。

新政的布告与应对

正月二十六日“御高札^①尽行撤下”——幕府的高札被拆掉了，新政终于布告到了地方；日记里岩村记在二十七日、冈崎记在二月初六条下。既然不得不对新政有所应对，晖儿父子便同周围的人议论时势，自己也出门走动，处处留心不要判断失误。

二月初三英四郎去伊势本宫参诣，想来也含着摸清形势的意思。二月十一日回家的英四郎，从吉田的羽田野那里借来“复古书”抄了回来。这大概就是所谓《复古记》（收于《明治文化全集》），即平田延胤编成的那部《复古记》^②。

二月初三，三河舞木的竹尾东一郎来信说：“东海道镇守将军（原文如此）下行，萨长土及其他各藩陪从；（正月）廿七、八日接收桑名城。”既是这般局面，他自己也发愤，“有心陪从锦旗^③”，就

① 高札：官府张挂法令、禁令的木牌，立于宿驿、村口等处。撤去幕府高札，等于宣告旧政令作废。——译注

② 《复古记》：记王政复古前后事迹的纂辑，幕末明治间有多种同名之作；此处指平田延胤（铁胤之子）所编者。——译注

③ 锦旗：绣有日月的锦御旗，官军的标识；“陪从锦旗”即追随官军。——译注

要离开舞木。这位素来交好的平田门同门竹尾，是要奔到新政府麾下去了。可晖儿仍旧持重，并没有就此响应竹尾离开乡里。

二月十一日英四郎带回来的消息，大概就是这些：吉田暂告平静，冈崎则把佐幕的人下了狱因而安定；吉田那边神职队已经动起来，要陪从锦旗上京；远州则有见付宿的大久保初太郎、浜松的池田庄三郎等人打算入京。

二月十三日，三河国宝饭郡东上村的弹右卫门来往；十四日，同国八名郡小川组的菅沼耕兵卫来往。他们商议幕府赤坂代官所交割一事，议定郡中公费暂不缴纳。同是十四日，伊那郡平谷村的卯八从名古屋回来路过，说名古屋因敕使与西国大名投宿而一片混杂。十七日，美浓国土岐郡大久手村的吉右卫门来信，讲大坂、桑名、骏府、笠松、飞驒的情形，以及东海道官军先锋任用了德川的旧手代^①等事。

一向持重的晖儿转而响应新政，直接的契机是：已归新政府管辖的旧幕府赤坂代官所在二月十九日发来书付，说因有栖川宫及其他公卿一行的供应事宜，要委他“手代下役”之职，命他备好羽织“速即前来”。旧代官所整个转到新政府名下，他也就顺势接了下来。

接到信的第二天二十三日，晖儿立刻动身去赤坂，到三月初一回过一次家。这段日子的事，晖儿另留下一册与日记不同的札记《吉田驿裁判所御建其节村村罢出之节日记》。下面就依着这册札记，追一追晖儿如何到三河的赤坂、又到吉田，为实现新政而奔走的足迹。

① 手代：代官所的属吏，办理年贡、诉讼等实务；“下役”是其下一级。晖儿受任的正是这一职。——译注

新政之下的地方

赤坂与吉田的足迹

二月二十三日，晖儿带着稻桥村的虎吉动身，半路遇上从丰川回来的设乐郡野入村的多吉、角次郎。他们说二十二日在三河御油宿拜见了东海道镇抚总督府的桥本实梁与柳原前光，实在“气派”。

东征总督有栖川宫当时驻扎在冈崎，晖儿便打消了二十三日当天赶到赤坂的念头，宿在九久平的大助家，半夜从那里出发，次日天亮时到舞木八幡宫参诣，又在当地拜访了竹尾东一郎。竹尾早已向东海道镇抚总督桥本递过建白；晖儿与他的交情，是能在建白书的草稿阶段动笔添改的那一种。

二十四日，奉命“御目见”^①的晖儿与竹尾一同前往赤坂。他们本已做好准备，要被派去筹办东军的“御贍”——即军资与兵粮米钱；不料军资金那边早已定下“大名贍”的方针，由诸藩承担，而役所与年贡征收在官军治下也一概照旧。随后受托催缴庆应二寅年欠缴的年贡，晖儿以“催征为难，恳请暂缓时日”回复，获准了。

这一天经过冈崎宿的是福冈黑田侯与津和野侯；日记记下他们的排场，也记了土佐、尾张、肥后等藩的动向。

① 御目见：获准当面谒见上位者。江户以来是身份上的资格，明治初年沿用其语，指被叫去官府当面听命。——译注

二十五日记着“竹尾大人到”，来的想必是东一郎的父亲。这一天还记下刈谷藩的“奸吏”津田新十郎被下了扬屋^①、家老上京的事。第二天二十六日，东一郎来信要他往吉田去，他随即动身，到吉田投羽田野家。竹尾同他弟弟三宅丰前正奉命滞留此地打探情形，晖儿在这里听说：“因英人被带进来，公卿也进了去，为此一片混乱；自幕府借领的，近年有十万两有余，连同此前共达二百万两之多。”

第二天他往新食宿的饭田武兵卫处去，商议与竹尾联名建白的事，就宿在那里。二十七、二十八两日都去拜观大总督官的出阵；到二十八日，终于向大总督有栖川宫呈上建白书。内容留待后文再说；接下去的记事写的是东海道上诸藩兵集结、各藩献金的情形。随着以东征大总督为中心的体制一步步搭起来，晖儿的同伴里草鹿砥、羽田野等人要上京去了；晖儿自己则打消了亲自上京的念头，取新城—泷川—田口一路，于三月初一回到家中。

向官军上缴款项

回家之后，晖儿在三月初二到初六之间，为同村田中屋整理家计而办“变卖”、办“田地投标”，替村里家计出了问题的人家伸手相助。到了初八，赤坂役所送来书付，命他筹措并垫付官军的用途金二百两。为军资匮乏发愁的总督府=官军，令豪农阶层先行垫付，说日后当以朝廷拨下的款子清偿。这一回晖儿备了金一百两，派同村的源左卫门、孙右卫门作代理送去赤坂；总督府却不准减额，催他把余下的一百两在四月缴上。

① 扬屋：牢狱中关押武士、僧侣等有身份者的房舍，与关押庶民的“大牢”相区别。——译注

另外，这一次缴上的一百两，另有一纸写明是“东海道府中至蒲原宿的兵食兵粮供给垫款”、“俟日后朝廷拨下，即行交付”的大竹库三郎手代松井谦一郎的文书交到了手里。

三月十三日，名古屋的玉之屋源兵卫自饭田回来路过。据他说，武州笹子岭有会津、庄内与萨长交战，萨长的官军一方败了；信州的高远、諏访各被摊派白米四十俵送往甲府——传来的都是官军不利的战况。晖儿却没有改变协助官军的姿态。十六日，三河国舞木有飞脚来，带来竹尾东一郎、三宅丰前兄弟十五日的信，说兄弟俩要在吉田投宿后前往骏府，想趁那个机会替晖儿转呈建言，请他十九日早晨以前赶到吉田。

晖儿依言于同月十八日动身，取田口—泷川—新城一路到吉田，又经大岩到新居宿，再往浜松宿，在那里递上了他的“手前建言”。日记里没有记这回建言的内容，但另有史料可知是下面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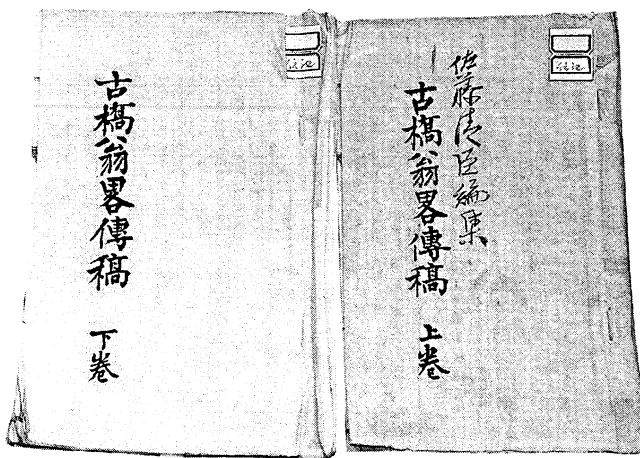
一、三河一国，藩与藩境界相接，其间又错杂着幕府旗本与社寺的领地；不但国政支离，且因是德川氏的旧封，人只知有幕府而不知有朝廷。伏请遴选贤明之人，任为国司。

一、本国境内楠公潜伏之地，以及儿岛高德、足助重范二君的故址，宜创建灵社，使忠臣芳名垂于数百年之后，以奋起全州人心。

一、常有人以国费浩繁为辞，屡屡呈请献金；然若一概滥予采纳，则生弊害者最多。（《古桥翁略传稿》）

这份建言并没有什么新内容，眼下也找不到总督府的答复。总督府元締头一件问的，仍是那笔御用金缴了没有。这一回御用金的摊派，是骏河金两千两、远州与三河金两千两，其中三河的份额是八百五十两。

图6 《古桥翁略传稿》



晖儿应下摊派之后，老毛病又犯了，三月二十四日回到家中。其实二月初八就已发病，三月里从初十到十二还得卧床，可见病得不轻。回家那天夜里，稻桥村的古桥宅遭了浪人二十七人的入室抢劫，抱病的晖儿也被捆住手脚，受了胁迫，被劫去银钱。结果贼是抓住了；可这件事一出，周边各村的慰问接踵而来，晖儿直到二十七日都没能安心躺下养病。

村方对新政的应对

回到稻桥村的晖儿，进了四月仍在每月初一、十五到伊势神的遥拜所作产神百度参拜，伊势信仰已经日常化了。他自己因出村活动的机会多起来，产神百度参拜便主要由儿子英四郎去做。

据中津川出身的马岛靖庵来信说：他把小木曾金六的事托给了松尾多势子，结果金六被尾张高须藩收留，作为当时担任大坂行幸先锋的高须藩兵的一员前往大坂。又，闰四月初四金六从中津川来

信说，经松尾多势子再次周旋，他被“拨入御亲兵”了。可见晖儿也借着国学者的交游为乡里的年轻人托请人事。

另一头，回村的晖儿又不得不应付：迎来新政，村里各种问题一齐冒了出来。尤其川手村与御所贝津村的山论^①，他作调停人分量很重；因病本已推迟往赤坂役所出差，这一回却不再推，四月二十六日去赤坂商谈两村山论和解一事，闰四月初四又亲往川手、御所贝津两村斡旋。同四月二十二日的记事写着“川手村一件谈崩，回村”，村落之间对立之深由此可见。

同月十五日，赤坂役所下达要缴清庆应三年欠缴年贡的告示，他为此赴赤坂，递上“不纳愿”，叹愿过往欠缴的部分可以免缴。做村里的当家人，要办的事委实不少。

闰四月二十七日，晖儿动身前往三河吉田——为的是到设在吉田的三河裁判所^②出仕。经田口、丰川抵吉田后，他随即由佐野蓬宇引路去见横山大人，在那里受托担任“国事方”：应付眼看要来的“变革”，也就是世直式的局面，四处奔走。人们期待他借在新政府初立时设置的三河裁判所任职，为地方行政的顺畅出力。而聚在这里的，正是幕府以来三河的一批有力豪农。

面对新政的困惑

五月初二，晖儿呈文“请裁判所更改管辖；又禀明御用金此番实难多出”——对再次摊派御用金一事，他请求：一是尽快把幕府代官所辖地划归新政的裁判所管辖，二是御用金已屡屡缴纳，实在

① 山论：村与村之间围绕山林、柴草场的界限与用益权而起的纠纷，山村最常见的诉讼。——译注

② 裁判所：明治元年新政府在各地所设的地方行政机关，与今日法院不同，兼管民政、赋税、治安等一切事务；不久即改为“县”。——译注

拿不出更多。这并不是拒绝向新政府出钱；所以三河的有力豪农们在五月初五“内议”，定下：晖儿一百两，东上村弹右卫门一百五十两，赤坂宿五郎左卫门一百两，乘本村的小川与菅沼各一百两，大野村七人合三百两，共八百五十两。

也就在这五月初五，旧幕府代官废止了；可旧代官们“奉命出勤于骏远三地方挂裁判所”，依旧是“近日即将附于吉田当值”的样子。这一带也有人心里想着“恳请赤坂役所一如既往留置”，可见在底层，向新政的转换未必办得干干净净。晖儿等郡中的豪农层则“无论如何都要申明难支”，联手活动，务使各村的负担不致过重。就这一点看，五月初七他被旧代官大井传去，得了“先纳可免”的谕示，多少是有效果的。

五月初九，到吉田来的三宅丰前，看着旧幕府的人物仍旧在裁判所当值，说是“总督的意思与御一新之处，实在难以分辨”，很觉困惑。这样的心情，在同时又是国学者的豪农们中间大概是普遍的。晖儿常与佐野蓬宇、菅沼耕兵卫、饭田武兵卫等郡中惣代层连日会面商议。五月十五日他写道“山本大人说大政一新之事殊无把握，遂改而回去”；十六日从赤坂的松井大人处听到“德川家督将领关八州及骏、远、三、信、甲、越之旨”；十八日又记“佐幕之徒、德川家督书付，一见”。这些都与这一带按新政府的方针将成为旧德川氏辖地一事相关。同蓬宇、武兵卫等人再三商议之后，五月二十二日晖儿离开吉田裁判所，暂且回了家。

以上便是晖儿参与明治新政的前半段原委。他回乡期间，六月初九这一带定下设置三河县；他再度接到新政府的传唤，已是八月下旬的事了。八月二十二日就任三河县捕亡方内御用挂的晖儿，此后三河县改为伊那县，他仍以足助局驻在官员的身份，继续在伊那县政里任职。

振兴物产的政策

出仕三河县

庆应四年(1868)五月二十二日离开赤坂的古桥源六郎晖儿，第二天回到家中，此后有一阵子一直待在稻桥村。他一面看着局势变化，一面参加村里的信仰与祭礼活动：六月初一、八月初一作百度参拜，六月十五、十六日办伊势见山御祭，八月初一办官社祭，等等。到八月十九日，赤坂役所来信，命他前去当差。为此赴赤坂的晖儿受命为三河县捕亡方^①御用挂，重又在赤坂供职。这次再出仕，对村里是件该道贺的事；八月二十五日回到家的晖儿，受到村人欢迎，还有人提着酒来贺。

九月初一，全村在产神处开寄合，为“为国家安静”祈祷，办了百度参拜与官社祭。九月初五，晖儿记下“十一村村役人小前来送行，送至伊势神峠”——稻桥村组合村是全体出动，庆贺并送他去三河县当差的。在村里看来，晖儿一旦成了新政府直辖县的官吏，就能最早摸清新时代的动向，替大家想出应对的快法子。

三河县捕亡方晖儿一上任，九月初七便赴吉田出差，担起“御东

① 捕亡方：明治初年府县所设、掌缉捕逃犯与治安的部门，相当于后来的警察系统。——译注

幸御先调”^①的差事。他把村里的事交给已满十九岁的长子英四郎，让他“名主见习”，自己则一心扑在公务上。此后晖儿与家人分开，只身驻在赤坂，作为三河县的下级官吏出力。这一段的情形，有史料可证：十一月初三送到稻桥村英四郎、浦四郎手上的一封信里写着——

近日一夜睡在被炉里，手脚冻裂，遂即作罢；并无甚不便，心境好比四十四五岁的人，万望不必挂念。

信里既报了新政下年贡的事、政局的事，也说自己顶着冻裂的手，又拿出年轻十岁以上的劲头在干——这份精神，从信里传了过来。

出仕三河县的晖儿，在明治元年（1868）十一月到十二月间，社会认识上有了一次大转折。给他指方向的，是以三河县判事身份到任的土肥大作。大约是明治元年十一月三十日或十二月初一，日记里有“夜与判事极密悬谈”一条：某夜与判事问答时，判事问三河将来该往哪里走、有什么复兴之策，晖儿答说除了俭省与积蓄别无他法；土肥则讲，应当积极去谋物产蕃殖。日记里没留下问答的原话，但晖儿自己后年回顾时是这样说的：

到亲幕府气氛甚浓的三河赴任的土肥大作，先让人知道有天朝政府在，再表明新政府的方向是推进殖产——国益。某日问起三河的振兴之策，晖儿以“俭勤二字”作答，土肥说这算不得回答，并指出三条：①德川氏的出身地三河，诸藩、旗本、寺社领犬牙交错，人心难以拢成一片；②没有殖产；③不懂经济之道，做事没有筹划。

① 御东幸御先调：天皇东幸（自京都赴东京）前，沿途预先调查、安排道路与供应的差事。——译注

因而说：“将此三条之弊一洗而空，进而繁殖与本地相宜的物产，或许还能胜过他国。”

土肥大作的物产繁殖策

这里要对土肥大作稍作介绍——明治年间晖儿的活法乃至精神，即以富国殖产为中心的那套想法，受他影响极大。土肥出身赞岐国丸龟藩，幕末以尊王攘夷的志士活跃一时，维新后参与直辖县政，明治五年（1872）一月任新治县参事。他是丸龟藩士的长子，安政年间受尊王攘夷论感染而成志士，与长州的久坂玄瑞、寺岛忠三郎以及土佐藩出身的志士们共谋大事。因这类志士活动，庆应二年被藩里幽禁；御一新的庆应四年（1868）一月解禁后，六月受新政府之命任三河县判事。次年三河县废置已定，他便回藩，任丸龟藩参政，进而升权大参事。他是在离开丸龟的那一段时间里来到三河，为新政定下方向的。

顺带说一句：此后土肥出仕民部省，又以这一身份重新过问丸龟藩政，同包括旧尊王攘夷派在内的守旧派对抗，断然推行了废藩置县。回到中央后他任职大藏省，明治五年一月出任新治县参事。可就在这里，土肥自尽了——剖腹而死，缘由不明。他自三河县时代起就为病所苦，身子垮下来之后，又接连调任，与旧尊王攘夷派积怨，再加上遇袭事件及其处置——这些叠在一起，大概就是主因。

晖儿的“富国攘夷”策

在这时体得了新方向的晖儿，就连对新设的伊那县足助局局长、到任的安井清彦，也在次年（明治三年）一月说过这样的话：“其慷慨非也。我等先前所倡攘夷之说，亦非也。细细想来，欧美各国正该推崇；反倒该憎恶的是土族……”（《古桥翁略传稿》）

这已越出所谓尊王攘夷的思路，讲的是：努力殖产使国家富起来，有了国力再行攘夷——也就是“富国攘夷”。伊那县足助局是新政府直辖县的分局，属新政府的政策执行机关；不过那还是在撤除幕藩体制下各种机构、按新时代重整架构的阶段，土地所有与产业、商业政策都还没有定型。这时的伊那县以及分局足助局，虽也接受中央的指示，却比较能对地方上的动静作出反应，行事贴着当地。在足助局里担实务的官员，如下面的表8所示。足助局的官员多半是从三河县时代一路留任的；支撑他们的，是有着在地根基的

表8 伊那县足助局官员表

姓名	出身	到任	职名（→变更后）
安井 清彦	名古屋藩	明二·七·二七	权判事格
富田德太郎 政明	大垣县	明四·二·七	小参事
林 小藤太 弘	名古屋藩	明二·七·一七	庶务方（→小属）
葛上 太郎 忠贞	高远藩	明二·八·一七	雇士（→小属）
古桥源六郎 晖儿	三河国设乐郡稻桥村	明二·九·二三	庶务方（→权小属）
香川 舟造 邦达	静岡藩 香川平作之子	明三·七·三〇	权小属
渡边丰喜知 钦	大垣藩	明三·一·一·二	权小属（→转大藏省）
森岛 真三 祐之	甲斐国都留郡下谷村	明三·一·一·二〇	史生（→权小属）
金泽 均 雅德	三河国宝饭郡赤坂社人	明三·一·一·七	使部
冢本善太郎 贵造	名古屋藩	明三·一·一·七	使部
渡边 要作 要	信浓国伊那郡饭岛	明三·九·一	使部
加藤 忠造 贵广	三河国贺茂郡足助村	明三·一·〇·一八	小使兼门房

国学者、神官与豪农。他们的处境，是夹在新政自上而下指令的实质——租税增征政策——与当地民众的生计问题之间，左右为难；而身为县吏，头一件要紧事，无论如何是尽快摸清当地实况。明治二年（1869）后半到明治三年、四年的古桥日记，以及足助局的各种日记里，多的是显示三河一带社会动向的记事。

伊那县足助局所见的地方动向

下面就从足助局的日记出发，把足助局所掌握的地方动向描个大概。站在这项摸底工作最前线的，正是一趟趟下乡出差的古桥晖儿；而在此之上形成的现状认识，使晖儿确信：要把混乱动摇的民众生计安顿下来，除殖产富国一途别无他法。

翻足助局的日记，头一个注意到的是村方纠纷的记事多。这类事以“村役人更替”“不归依”^①“村役退職愿”“继目愿”“役人”等名目出现，可见村役人这一层正在大规模换班。背后是小前层要求撤换旧村役人，以及不服村役人的动向。三河各村也一样：旧幕府的管辖撤走、转入明治维新政府地方权力之下的过程里，各村都以更换村役人的形式，在自己村里实现着“御一新”。这类事以加茂、宝饭、设乐三郡为多，集中在明治二年（1869）。而在三河，幡豆、碧海、额田三郡却几乎没有记事——地方差异就是这样。又，宝饭、设乐两郡的这些动静，后来连到了明治三年十二月爆发的所谓伊那县骚动上去。

与村方纠纷并列而多的记事，是“难支”“救济”一类。到明治四年为止，各村递上来的难支愿、拜借愿，尤其集中在明治二年。三河各郡按记事多少排下来是：加茂、设乐、幡豆、宝饭、额田；八名与碧海各两三件，渥美郡则一件也无。加茂郡尤其自明治二年起就多。

对这些叹愿，伊那县真正拨给救济或借出米谷的极少，几乎都是训谕了事。古桥晖儿等县吏亲往当地训谕，让人把愿书撤回。晖儿就是为“不予采用”“不予受理”“暂且搁置”“驳回”“申斥其误

① 不归依：村民对现任村役人不予信服、拒绝听命，是要求撤换的前一步。
——译注

解”这些事四处奔走的。训谕解决不了的场合，明治四年有过“难支仕法助成”的贷款；其内容是把商法金^①之类周转过来，让人造纸、栽茶树，好各村办起殖产。

另外，幡豆、碧海、额田三郡自改归伊那县足助局以后，“难支愿”“拜借愿”一件也没有。缘由不详；大约是从三河县转到伊那县以后，还款条件变严了，这是一个原因吧。

第三类醒目的记事，与助乡、驿递有关。三河各村进入明治后，新受了附属于东海道赤坂、藤川、吉田、二川、白须贺等宿的命令。这实际上就是把助乡的负担压过来，摊派驿递金、附属金，无非是增征。三河县境内，自明治二年四月起，幡豆郡大冢村、千间村、酒手岛村，额田郡毛吕村，加茂郡乙部村等相继以出钱“难支”为由叹愿。对此，县从一开始就用“训谕”“恳谕”让人把叹愿撤回。驿递这件事既是硬加的新负担，此后各村的叹愿就没断过；再与贋二分金^②流通引起的金札不通用局面纠缠在一起，遂演成严重的欠缴款问题。

与欠缴款并列的，是钱款拖欠的记事，也不算少。其中有的是炭钱未付，有的与买卖有关，但大部分与借款的偿还相干。此外加茂郡多的是质地赎回受阻一案。又有因贋二分金而起的币制混乱，以及伪造、行使假钞一案的审讯，都记得很详。由此可知：这些假钱是混在还债的钱和村里的公积金中花出去的，也有小商贩、农闲卖旧衣者、木匠、日工这些赤贫的人被塞了假钱而拿去使用的。

① 商法金：明治初年官府拨给、供振兴产业与流通周转之用的款项。——译注

② 贋二分金：幕末各藩私铸、成色不足的二分金。它的泛滥使新政府发行的“金札”（纸币）无人肯收，币制大乱。——译注

此外，古桥日记与足助局日记里还有“欠落”^①呈报的记事。幕末维新的动荡年月里，离乡出走的人一旦音信断绝，村里便办欠落的手续。明治三年以后，也有出外者的回籍申请，以及经府藩县递解、自远方押送回来者的记事。回村的有一百多件，驿递有六十多件。

① 欠落：私自离村出走、音信断绝。村里须向官府呈报，其年贡与户籍另作处置。——译注

活在村里

地方殖产的引入

从足助局回稻桥村

明治五年（1872）三月，古桥晖儿辞去伊那县权小属之职，回稻桥村去了。日记二月十六日一条写着“来了一同免职的通知”，用的是“免职”二字；其实是伊那县足助局撤销这一机构改革，把原属足助局的三河部分划归了新设的额田县。

进了明治五年，晖儿仍在卖力办县里交下来的差事：了结厩二分金案，租税方与纸会所的账目，商法金的清查与征收，辖内各村的穷民救济，等等——

桩桩都办得很尽力。他在伊那县任职期间，以下级官吏的身份把足助局辖下三河各地的动向与问题看了个透；所以足助局一撤，他就回自己村里，打算着手复兴村子。这次归村，不能解释成对县政心生隔阂或失望。

另一头，晖儿的长子义真在这期间，于明治五年二月做了额田县第八大区第三小区（即旧稻桥组合十二村）的户长^①；二月初八往额田县出差，顺道去足助看望了晖儿。

① 户长：明治初年“大区小区制”下的村级长官，由旧村役人层充任，掌户籍、赋税、布告传达等事，相当于旧时的名主。——译注

进入明治五年，稻桥村已经在按额田县辖下村庄的样子重整体制，于是父子二人合力为村政出力。

晖儿归村后头一件事，是照他在县里任职时体得的三河将来图景，把产业引进这座山间的贫村，做出殖产的实效来。为此他自掏腰包用于殖产与物产振兴：离开足助局时所领的、在职期间省下的二百三十圆，用于物产振兴与贫民救济；又以向爱知县借来的四百五十圆作本钱，买下茶籽分给村民，鼓励他们种茶。

站在“大攘夷”的立场上

晖儿之所以强烈意识到：回到三河山间就非得把地方上的殖产办起来不可——契机如前章所述，是明治元年（1868）十一月到十二月间，以判事身份到任三河县的土肥大作说服了他。至此晖儿不再照平田学的尊王攘夷论，对着外国压力赤裸裸地喊攘夷；而是主张开产、殖产，攒足国力之后再去攘夷——也就是所谓“大攘夷”（又称富国攘夷）的立场。他先从制茶下手。

制茶业

明治二年（1869）到伊那县足助局供职后，晖儿试种茶籽，确认哪一种适合本乡的土；明治三年读了岩山敬义的《牧羊建白书》，得知入超这一贸易失衡的实情，遂想到以制茶振兴出口。次年明治四年，他自费买进茶籽八石，分发给村人，又办起纸会社。这期间还有一段插曲：明治三年一月，足助局局长安井清彦到任后向他发问，他答说，要革除德川治下的弊政，就得否定攘夷论、实现殖产富国；而为此“反倒非崇信欧美人不可”——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古桥翁略传稿》）。

三河一国，没有像样的产业，诸藩、旗本、寺社的领地又错杂在一起，无论行政上还是民意上都拧不成一股；晖儿主张，唯有克服三河的这般现状、使国富起来，才谈得上攘夷。这想法在土肥大作离开三河之后，他仍旧抱着不放。就连本地闹起伊那县骚动的当口，他也确信唯有开产才有助于民生安定，并向村人这样讲。到明治七年，周边十二村已经种下茶籽二十五石。

明治九年，晖儿又把稻桥组合村之一大野濑村的小木曾利左卫门派到丰桥，学宇治茶的制法；明治十一年再把此人派往沼津学制茶法，还送去内务省劝农局的红茶传习所。

不料殖产刚上轨道，明治十一年茶价就大暴跌了。

据晖儿明治十六年所写的《北设乐殖产意见书——制茶意见书》，明治十一年茶价大跌，村里的茶树栽培迅速萎缩。他反省自己只顾一面倒地讲制茶的好处，没有顾及其中的风险；不过又说：“若循天理而导之以成国益，岂有中途而废之患哉。”由此可知，晖儿是把殖产看作合乎天理的事。正因如此，他才肯出大笔的钱，从豪农这一头主导，要把制茶在村里扎下根来。循着这个想法，同一时期他还着手引进植林、产马、养蚕与香菇栽培。

明治十二年茶价回升，稻桥村的制茶也略有恢复。此时稻桥村的制茶已经普及到全村七成人家在做，以上层农户为主。这一年横浜办共进会^①，古桥家送去了茶叶。从当时的文书可知：古桥家经营一町二反的茶园，采茶芽约一百二十贯，共制茶一百二十五斤，经村内茶商销往丰桥、信州、远州。次年十三年，北设乐郡五十三村中已有三十九村种茶，产茶约五万斤。

① 共进会：明治政府为奖励产业而办的产品评比展销会，比“博览会”规模小、门类专，得奖是产地扬名的捷径。——译注

然而三河（爱知县）的、也就是稻桥村的制茶，终究抵不过大批量生产的静冈茶，日渐衰退。当年为买茶籽借下的钱还不上，连村民那一份也由古桥家垫付；到明治三十三年，古桥家自己也不再制茶了。

养蚕业

说到养蚕：此前桑树不过种在田埂上，因而养蚕与收茧都很少。明治七年（1874），晖儿想重新把养蚕改良一番，请爱知县的劝业系派人到村里来讲桑苗栽种。村里听了讲解，也买了桑苗，可这一回种桑与养蚕仍旧没推开。次年明治八年，从美浓国惠那郡落合村贩来桑苗，劝村人养蚕，却没人应；只好由古桥家自费买下分给大家，桑园（桑田）这才算办了起来——实情就是如此。

再说养蚕：明治九年名古屋开设了养蚕传习所，组合村派一人去学技术；由晖儿主持，明治十一年在稻桥村与武节村办起养蚕场。稻桥村去学技术的，是做丝茧买卖的冈田平三郎。“蚕”字写作“神虫”，夏蚕传习所总算开了起来；这里头一再强调的，是“生丝是出口货，做这一行就是报国”的精神。把茧缫成生丝的制丝场在武节村办成，已是明治十二年的事：从名古屋买来座缫机十八台开设制丝场，而学缫丝技术的住宿生八人、走读生七人，每人得自负二圆八十五钱。

明治十二年名古屋办博览会，稻桥、武节两村所产的成茧与生丝送去参展，得了奖牌。次年十三年，为提高养蚕技术，又把冈田伊三郎派往福岛县磐城郡挂田村举办的火力养蚕法传习会。这笔费用由爱知县劝业课补助，不足的二十余圆由古桥家负担。冈田修完三个月的传习回来后，还专程去访伊势的养蚕制丝人家，一心要把

制丝法再提高；明治十四年，他在稻桥村开了一次火力养蚕法的传达讲习会。

养蚕业在爱知县劝业课等强有力的指导之下，以醒悟到殖产之要的古桥家等豪农为推手，在上层农户中推开，办得很起劲。结果明治十四年三重、爱知、静冈、山梨四县共进会上，爱知县在养蚕部门得了一等奖，此外在内国博览会与各种共进会上也屡屡获奖，技术上的长进确有可观。

明治十六年那一年，稻桥村出货的茧是一千贯、值二千五百圆，生丝九十一贯目、值三千五百圆，另有次丝十八贯目、值三百六十圆，都发往横浜（明治十七年《稻桥村商品输出入表》）。按金额算，制丝的产值已经超过养蚕收茧。稻桥村的商品生产就这样通过直接作为出口货的生丝生产，同横浜直接挂钩，迅速发展起来。

农谈会

所谓农谈会，辞书上是这样解释的：老农（笃农）为着“交换、汲取有助于农业改良的知识与经验，用以普及和奖励而开的会议”，“以劝业会、劝业演说会、农谈会、小集会、农事会、农会集谈会、种子交换会，养蚕、木棉、制茶等会话，讲习会话等种种名目召开”，而“农谈会中最早的一次，是明治十一年（1878）在爱知县设乐郡开的”（见《国史大辞典》第十一卷等）。

这里说的设乐郡，就是设乐郡稻桥村；全国最早的农谈会正是在这个村开的。追其原委：后来定居此村的佐藤清臣去越后，拜访蒲原郡新津村的国学者桂誉重时“闻有农谈会之举”，回来讲给古桥晖儿听；于是由古桥父子、尤其是晖儿主持，在稻桥村办了起来。

不过这农谈会也并非单单从豪农们的信息交换里长出来的。当时明治政府汲取西洋农法失败，正转回传统的在来农法，行政上大

力推行劝农之策，农谈会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开的；各村还设了“农事周旋人”^①。

稻桥村的第一次农谈会开于明治十一年五月初二。农谈会（农会）的规矩是：会员先一同到神社集合，祈祷之后再开会；会上讲的、交流的，都是贴着本地实情的农业具体做法与经验。它的意味在于：明治十一年茶价大跌，刚要扎根的茶业陷入困境，得了行政撑腰的豪农为打开局面，交流栽培经验、谋求技术改良与提高，这才办了起来。

第二次开于明治十二年三月，名目叫“部落农会”。议题是蝗虫等害虫的防治与驱除之法，可讲的只是些经验之谈；稻桥组合村十二村各出一名农会员到场，却还没能把这些经验谈变成全村共有的东西用起来。

为把农会的议决通知到全体农民，议定了这样一条路径：各村会→由十四人组成的部落会→郡会→县会，层层推开。可是在这条路径逐步整备的过程里，“交换农事经验之谈的会”这层色彩反倒淡了下去。由老农立场的晖儿、义真父子主持起来的农谈会，也因义真做了北设乐郡长、改从行政的立场来抓，又因在郡会、县会上讨论时须有共通的议题、议题遂由上头设定，就这样，老农立场能参与的范围一步步收窄，行政方面的主导性迅速加强。

明治十四年以后，松方紧缩政策^②使农村的萧条愈发严重，殖产兴业停滞受挫；农谈会里当初那份自主的成分也消失了，越来越带

① 农事周旋人：明治初年各村设置、居中传达劝农政令并组织农事改良的人，多由老农充任。——译注

② 松方紧缩政策：大藏卿松方正义自明治十四年（1881）起推行的通货紧缩，物价与农产品价格暴跌，大批自耕农破产，史称“松方デフレ”。——译注

上“把行政对农村的指导贯彻下去的手段”这层色彩，以及精神主义的成分。

烟草

明治三年（1870）的产物呈报里，烟草以五十两居第二位，仅次于菜籽的六十九两。明治十六年稻桥村销往村外的商品中，第一位就是烟草，一万一千余圆，约占商品生产收益的三成；第二位是木材与木制品，一万零五百圆；第三位是酿造品，九千三百圆；第四位是养蚕（茧、生丝、次丝），六千三百圆（明治十七年《稻桥村商品输出入表》）。

尽管在全村的现金收入里排第一，烟草的品质却没有改良过，三河产的价钱一直被压得很低。到明治十年，大野濑村的小木曾一家跑了一趟横浜，查了烟草买卖的行情，想改良选叶的法子；不过这一年没有见效。

明治十二年，熊本县阿苏郡高森町有传习烟草洋叶栽培制造法的机会，爱知县托晖儿推荐人选，他推了押山村的山田庄吉，山田便去熊本受了传习。为把所学用上，明治十四年山田庄吉在设乐郡搭起烟草烘干棚做试验，失败了；次年十五年，山田庄吉又被派往东京的烟草共进会，去查改良之法。

然而物价虽已上涨，三河一带的烟草价钱却在跌，产量一路减少。明治十九年留下一份以大野濑村小木曾一家为人民惣代、呈给爱知县知事的请愿书，说三河的设乐郡与东加茂郡叶烟草产量减少不止，已是束手无策。可见：靠殖产在地方上办起来的出口用商品生产，遇上海外行情变化、外交政策转向，加之奸猾中间商从中作梗，三河山间的农村已难以灵活应变；明治十年代后半，打击尤其沉重。

产马

在稻桥村，江户时代养马是为了耕作；到江户后期，作为运货的“中马”^①而养马之风更盛。到了这个殖产的时代，改良成军马就成了课题。

明治十一年(1878)，爱知县令安场保和向区长古桥义真谈起改良马匹的事，成了契机。同年四月初，义真在稻桥村提出产马的话题，四月十七日在组合集会上说明了办产马的宗旨，决定着手马的品种改良。县里派骑兵大尉奥田贤英做产马改良主任，从奥州买来种马。

明治十一年十一月，第十四大区改称北设乐郡，义真做了郡长，任郡书记佐藤启行为劝业主任主持产马改良，并在夏烧村开设饲养种马的产马讲习所。同是十一月，定下《产马社中改良》与《产马规则》；明治十三年，产马讲习所自夏烧村迁到段户山。

这是要把一向用于耕田、驮运的马改良成合乎军用——也就是合乎战争之用。呼应国家战时体制而推行的马匹品种改良，把稻桥村又往顺应国策的方向推了一程。

① 中马：信州、三河山间自江户中期兴起的农民驮运业，农户以自家马匹长途运货，与宿驿的传马制相对。——译注

地方政治与乡土教育

晖儿与户主义真

晖儿究竟是明治五年（1872）几月几日回的村，说不清楚。明治五年的晖儿日记，只有一月一日到二月二十三日、七月二十一日到十一月二十八日两段；义真日记本来就是晖儿不在稻桥村时才写的，明治五年只记了一月二日到一月二十日、三月十八日到五月一日。两份日记叠起来，二月下旬的二十三日到二十七日、五月二日到七月一日仍是空白。晖儿在足助局办公到二月二十三日，这一点是清楚的；而四月二十四日的义真

日记里写着“父（晖儿）中津川出发之前”，据此又可以认为他那时已经回到了稻桥村。晖儿回村的时间，看作义真以额田县第八大区第三小区（原稻桥组合二村）户长的身份动身赴冈崎的五月一日前后，大概最为妥当。回到稻桥村以后，晖儿在把殖产引入这一带、开办乡校与农谈会上很起了些带头作用；不过他是古桥家的代表，家里和公职上的事大半都由已经当了户主的义真承担。晖儿回村的明治五年正好花甲六十岁，加上单看日记就有明治五年十月十七日“晖儿病卧”、明治六年四月十九日“晖儿病卧”这样的记载，他为宿疾“疝痛”所苦，多半时候留在村里、待在家中。因此可以认为，晖儿这边贴着村落与家事，义真那边则历任公职、卷进政治，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行政去把事情办成。晖儿到明治十年代后半，也

不过是当上了由他牵头推动的报德会的会长；但在乡里的殖产、山林事务，以及家业经营与家事上，判断与拿主意的中心似乎始终还是他。他早在

明治五年二月就当上了额田县第八大区第三小区的户长；明治六年三月因这一带要办地租改正，奉命充地券挂^①附属，同年六月充养蚕世話挂，十二月充第九中学区取缔^②。次年明治七年八月升第十三大区副区长，赴新城任职；明治八年任第二十三大区区长，明治九年任第十四大区区长，到明治十一年当上北设乐郡长。

义真就这样一路走在地方行政的中心位置上，可是到三十二岁的明治十三年一月，他以父亲晖儿已六十九岁高龄为表面理由辞了职，回了村。同年二月改充北设乐郡御用挂，这一职也在明治十五年三月依本人请求免去；这年五月他并不情愿地当选爱知县会议员，也辞掉了。

明治十六年十月，他参与创办了为对抗自由民权运动高涨而办起来的《爱知日日新闻》，还出了资，可到次年明治十七年四月报纸就停刊了。

此后，明治十九年一月他当选爱知县会议员，同年四月任东加茂郡长，八月转任北设乐郡长，十月又兼东加茂郡长。次年明治二十年十二月，因与爱知县知事胜间田稔意见不合，依本人请求免职回村。随后明治二十二年十一月任稻桥

① 挂(掛)：明治初年官厅内按事务分设的职名后缀，意近“某某事务专员”。

本书一律照排（地券挂附属、养蚕世話挂、御用挂等）。——译注

② 取缔：此处是学制下“学区取缔”的省称，指在一个学区内督导学务的职员，与现代汉语“取缔”（查禁）无关。——译注

村名誉村长，明治二十四年五月任北设乐郡参事委员，明治二十六年十二月任稻桥村村长，又一次站到了出身村的中心；明治三十年五月因地方制度变更，任稻桥、武节组合村村长。

另一头，明治二十六年七月，他把爱知县内已达 158 处的农谈会统合起来，成立三河农会并出任会长。明治二十八年五月任爱知县农会评议员，八月任马匹调查会临时委员；明治三十年七月任爱知农工银行创立委员，明治三十三年创办稻桥银行，同时成立三河产马组合并出任组合长。义真就这样在稻桥村、北设乐郡以至三河一地的农业与金融上出了大力，于明治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虚岁六十辞世。稻桥、武节组合村以村葬报答了他的劳绩。

学校设立运动

豪农古桥晖儿与义真父子为了让稻桥组合村二十二村的子弟受到新时代的教育，发起了设立学校的运动。明治五年（1872）七月，他们以古桥源六郎的名义向额田县递上了设立乡学校（乡校）的呈请。呈文站在赞同新政府开化举措的立场上说：为使村中子弟开化，宜把废寺改充乡学校，雇一两

名教师施教，如此则“顽固无学之子弟等亦当渐次进于开化”；至于学校经费，因村贫，可由有财产者先办起一百两的无尽讲^①，反复开讲，到第十年便能积下一千两以上，学校自可长久维持；而学校费里的“教师薪给及其他与学校相关之诸开支”，则出于“自费”——也就是由古桥家一概捐纳，故请批准。

① 无尽讲：日本旧时的民间互助金融组织，成员定期凑份子成一笔款，以抽签或竞标决定由谁先取用，轮流周转，与中国的“摇会”“标会”相类。——译注

晖儿当时已经隐居，所以出面的是源六郎（义真）的名义；同年七月，国学同门佐藤清臣（岩井清臣）来访晖儿并从旁相助，事情在学制颁布之前就动起来了。这是晖儿受了当时以名主、户屋为中心推行的“义校”“乡学校”设立风气的影响，想着在自己的出身村里也办一所学校，遂着手推动的结果。这所乡学校取名明月清风校，于明治五年八月十五日中秋月圆之日开学。学制颁布之后，它也就这样被认可为学校。

乡校明月清风校的设立

出任首任校长的佐藤清臣，是一位以实现维新为志的草莽志士，元治元年（1864）九月奔走志士活动时曾来过稻桥村；到庆

应四年（1868）加入官军先锋的赤报队，伪官军事件时他正在北信活动，最早察觉危险而逃脱，此后辗转各地潜伏。他做过信州户隐神社的学师，致力于神社改革，后来把落脚处移到远州滨松，再迁三河。

这一回，他带着吉田（丰桥）的平田门国学者羽田野敬雄的介绍信，于明治五年（1872）七月三日来到了稻桥村，八月做了乡学校的校长。这所乡学校订的课程重实学，意在培养能担起地方开化与殖产的人。佐藤在志士生涯的尽头落脚稻桥村，他所设想的教育，是要把平田门国学、皇学与农学接到一处来办。这种以皇学为中心的教育，同一心要普及文明开化的学校教育，有其对不上的一面。

创办之初的教具、教师薪金、校舍维持费等等乡学校的开支，都由古桥源六郎父子捐资包了下来。此外，明治六、七年学校经费的

缺口一百五十圆^①、明治七年三月的一百圆，也都是他们捐的。为着这份贡献，同年三月甚至有人提议：把已改称爱知县第九中学区第四十三号小学校的明月清风校，改名叫“古桥学校”如何。在地方上还没人明白办学是一笔先行投资的时候，古桥家率先

掏钱出来，这一点值得注意。

公立小学校的开校

明治七年(1874)八月十六日，乡校明月清风校作为学制下的公立小学校开学。开学式在乡社八幡宫的神前举行——校长佐藤清臣正是该社的神官。这里头映着皇国意识与殖产报国意识：学校要办的，本就是把明月清风校的国学（皇学）、汉学同村人抱团兴产、殖产接起来的那种教育。教员三名，学校开支改由按户数摊派与按反别摊派两法并用的款项加上学生的学费来支撑，公立化就此推进。

可是，小学校制度在政府与文部省那套以近代化、西洋化为鹄的的教则之下日趋划一，地方自有的教学内容遭到否定，一点点消失了。稻桥村也一样，明月清风校时期所主张的“农学物产”科，以及其他科目里含着的皇汉学成分，都不见了。

佐藤清臣判定小学校教育正一步步走向自己教育理念的反面，明治八年八月向晖儿递上辞呈，辞去校长兼训导之职，在小学校之外另开了一所名叫真澄舍的私塾。清臣本想办的是依托村庄、以村为本的子弟教育，于是同小学校教育

分了道。这时晖儿想的，是如何更有弹性地应对这个时代。还要说明的是，两人在学校教育上立场虽异，却并没有就此各走各路；

① 圆：明治四年(1871)新币制下的货币单位，折算上大致承接旧制的一两。

本书自明治初年起的金额随原书由“两”改记为“圆”。——译注

到明治十年代后半，他们的位置又重合起来，佐藤此后通过神葬祭、改良风俗与农谈会活动等等，一直支撑着古桥家对村子的经营。

明治十年代后半的变动

急转直下的古桥家经营

天保年间以来力行家政改革的古桥家，到弘化四年（1847）已把债务还清——这在“走向幕末政局”一章里说过。此后到幕末，古桥家的经营总体上一路顺当，家产确实在增加；从盘存^①额一年年往上走也看得出来（参见表3）。

古桥家幕末经营的核心是酿酒（含烧酎、味噌、酒糟）与味噌（含溜酱油）。盘存帐上记作“贷·挂账金”的，主要是酒、味噌等酿造品的赊销货款。当时以赊销为主，赊款到期收不回来时，未收的余额便转记到“手形”^②一项下；而这一项的数目正在急剧膨胀。

赊款直接反映酒、味噌等酿造部门的经营状况；除典当之外，手形项下的钱款也几乎都与酿造相干。手形与放款增加固然是资产增加，却也带着变成呆账的风险；开港后物价上涨，帐面估值随之抬高的成分也有。不过还款在增加，资金转得动，所以在这个阶段，盘存总额的增长可以说正说明古桥家经营顺当。

① 盘存（店卸し）：年终清点库存与债权债务、结出总资产的做法，江户以来商家通行。其帐册即《店卸帐》，是复原经营实况最要紧的史料。——译注

② 手形：写明金额与期日的债权凭证，功能近于本票或借据。赊款到期未收，即改立手形续记。——译注

按项目细看，古桥家似乎并不把典当这类放贷经营看得很重：幕末的典当与手形利息都不大。那是对周边农民的小额放款，救急补贴生计的意味浓；加之村里的境况已在恢复，典当与手形的进出便都不大。

据明治元年的《金银通用控》，明治元年（1868）不论已还未还，放款总额达五百三十九件、七千二百四十四两，是很大的数目；其中拖过十年以上成了呆账的只占百分之三点六（四百三十三两），还款率很高，可见经营之顺。

酒、味噌等酿造部门也稳定下来：弘化以前不过一百石上下，嘉永以后长到三百石至四百石。到这个阶段，酿酒已脱开加茂郡足助，转而向周边村庄推销，开出了自己的市场；味噌的原料大豆，也改用比信州大豆省脚钱的近处便宜货，同样是在扩大市场。

土地经营方面，安政五年（1858）的持高是本村约四十石、他村约五十四石。这里头绝大部分是化政年间以前积下的，幕末土地所有并没有增加。进了明治，这个势头仍旧延续；古桥家再度积攒土地，要到明治十年代才有。古桥家土地的分布与放款对象地域是重合的：先是本村稻桥村与邻村武节町村，再就是组合村的范围，而且小额居多。土地虽不增，佃租收的是实物，米价一涨，折成钱的数目就变大，地主经营因此更稳。

晖儿还热心于地主自耕^①，以天保年间开垦的六郎木新田为中心，明治元年除家人的劳力外还雇了七个人，收米四十一石九斗。

如上所述，古桥家的经营到明治初年一直顺当地展开；可到明治十年代就急转直下了。先兆是明治十二至十三年物价飞涨。因

① 地主自耕（地主手作）：地主不把地全放出去收租，而留一部分雇人自己经营。——译注

此盘存的估值虽在增加，可到明治十四年，统计上虽只是停滞，经营的内里却在迅速恶化。松方紧缩带来的萧条压了过来，此后几年间盘存额减掉一半。手形与放款在明治十五年腰斩，内容上又都成了呆账，收不回来。收不回来就只好靠借款来补，借款自明治十五年起急剧增加，把经营压得喘不过气（明治前半期古桥家经营状况的《店卸》帐统计，据乾宏巳先生的成果——参见其《豪农经营的史的展开》第七章）。

下面看一看明治十七年（1884）古桥家的财产状况。此时古桥家的头衔是“专业酿酒 兼业味噌溜”，其“财产”一项分作十条写着：

明治十七年的财产状况

- 公债证书 金 500 圆
- 酿酒用房屋买卖价 金 500 圆
- 酿酒用以外房屋买卖价 金 1000 圆
- 酿酒用各种器械买卖价 金 300 圆
- 山地反别 52 町 2 反 6 亩 27 步 此地价 128 圆 24 钱 8 厘
- 竹林反别 2 反 9 亩 14 步 此地价 6 圆 99 钱 8 厘
- 水田反别 15 町 1 反 5 亩 27 步 此地价 589 圆 85 钱 6 厘
- 旱田反别 6 町 28 步 此地价 495 圆 61 钱
- 宅地 3 反 9 亩 11 步 此地价 164 圆 46 钱
- 总计反别 73 町 7 反 3 亩 6 步 此地价 6693 圆 86 钱 9 厘
- 立木估价 金 6500 圆

此外还写着“储蓄金五千五百圆”，以及“资金（所有、储蓄金）”名下“放款五千五百圆，以资本五千圆运用”（《第一号杂志目录 明

治十七年》)。明治十年代的古桥家，以酿酒为家业，味噌与溜酱油定位为兼业，是拥有田地二十一町步余、山林五十二町步余的地主。

松方财政下的金融状况

接下来，看一看受松方紧缩政策冲击那一阶段古桥家的金融状况，取明治二十年（1887）六月末的时点（《金银通用控》）。

古桥家自明治十九年七月至二十年六月这一年间放款总计超过两万

表9 明治二十年六月现在古桥家放款表（单位：圆）

地名	明治10以 前的放款	明治10～ 明治17.6	明治17.7 ～明治 18.6	明治18.7 ～明治 19.6	明治19.7 ～明治 20.6	计
稻桥村5 村（旧稻 桥村）	755 (430)	3508 (2776)	490 (410)	1146 (737)	1387 (938)	7286 (5290)
武节村7 村	745	1498	370	900	1248	4761
设乐郡	54	680	518	296	291	1840
加茂郡	199	984	867	323	411	2785
信浓伊那 郡	81	42	0	63	138	324
美浓惠那 郡	1486	2195	120	10	100	3911
计	3319	8909	2365	2739	3575	20907

圆。放款对象里，本村稻桥村与邻村武节村占了五分之三以上，压倒性地多；其次是设乐郡各村、周边的东加茂郡、信州下伊那郡、美浓惠那郡等。比起幕末，地域反倒收缩到了周围，当年靠领主主交易联着的远方不见了。豪农式的地域集中倾向在加强，放款也越发零碎，图的不是利息收入，而是补贴生计、加固地缘关系。

作为家业的酿酒，明治初年在一百石级，明治十年代长到四百石级；明治十五年受紧缩影响跌回三百石上下，明治十七年又到六百石级。味噌酿造从大豆进货额看，到明治十四年为止都顺当，明治十五年以后跌到五百石上下。明治十八年以后，酒、味噌、溜酱油的酿造业全都大受不振与萧条的冲击。

地主经营方面，前面说过的古桥家所有的水田十五町步余、旱田六町步余，大半是放出去做佃地的。幕末到明治初年土地所有高变化不大，可明治十二年增到一百六十五石余，明治十七年增到二百一十一石余，长得很快。此前积攒的多是稻桥村与较近村庄的地；明治十七年这一批，大概是美浓中津川、加茂郡川口村等较远处作抵押、担保的田地断当而收进来的。此后到二十年代，田地也几乎没有再增（据乾宏巳先生历年《田畑作上米金控》的统计——参见其《前掲书》第七章）。

这个时点上的放款，是同土地兼并不挂钩的那一种；也就是说，为防止农民卖地没落、为使村共同体安定而放的、补贴生计的款子。至少到晖儿去世的明治二十五年为止，这个势头一直延续。即便在明治十七、十八年的萧条之下，古桥家也没有过靠增地而寄生地主化的举动，始终是贴着村落的豪农式应对。

向山林经营倾斜

松方正义推行的紧缩财政，加上天候不顺造成的歉收，使明治十七、十八年的萧条把民众生计打到了谷底。松方财政以及随后的萧条，不但把在乡里推进劝业殖产、有志做自立产业担纲者的豪农经营逼到破产，还破坏了村落共同体内部的联结，使荒废的局面愈发严重。正是在这样的局面里，古桥晖儿越来越倚重山林。

山上种了树，山林的恩惠也不会立刻润泽一方——没有那样的速效。晖儿自天保五年（1834）着手井山植林，前面已经说过。那一回是古桥家买下杉苗，说服并不情愿的村人，每户分给五十株杉苗，催他们种下。就那个时点说，晖儿感到荒村之危日深，想借植林谋求村人的共同体式团结——这一层不能否认。此后弘化年间古桥家还清了债，村里安定下来，就不再见植林运动；再往后，不过是从代官所领到木材时被令补种苗木而已。真正把眼光投向山林，是进了明治，井山的御林^①被编进明治政府官林之后的事。

进了明治，村里头一件动起来的事，是叹愿把山林发还。井山的御林长年种苗、原是共有山林，明治五年（1872）三月被编入官林之后，为着村的发展、农民对薪炭资源的需要，村里于明治七年五月二十三日递上了《官林发还愿》。这样的叹愿，明治七年六月、七月，以至明治十年三月、七月，接连不断地递。

明治十一年制茶因价格暴跌而走不下去，养蚕也让人觉得悬；在这种情形下，村里越发把宝押在还剩下的山林振兴上。次年明治十二年二月、又加上十四年九月，井山官林发还的请愿一直没停；明治十五年一月、明治十六年一月还执着地一再递上。

看明治十六年一月的《井山官林御下渡愿》：井山“据宽延年中裁许图背面所载，确系将民有地上缴充作官林”，故请照旧发还为民有地。稻桥村又陈述：自古为保水田用水而支出的人夫工钱与水路修缮费，为免村里陷入困窘，遂植树造林、伐木以筹此项费用。在此

① 御林：幕府或藩直辖的山林，禁止民间自由采伐。明治维新后多被划归国有，称“官林”，村落遂失去薪炭与用材之源，各地因此叹愿发还者甚多。
——译注

之上又说：幕政时期的官林制度既已废止，理当发还为民有地。终于在明治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井山山林的有偿发还争到手了。

发还到手的山林要靠自己的手怎样维持下去？晖儿与稻桥村定下方针，已是明治十八年的事。这一年晖儿写了《植林意见书补遗》，又真写了《山林维持案》。《植林意见书补遗》里说：自伊势见（神）峠遥拜伊势大庙（伊势神宫）之际，得“天神之诱导教示”，谓“人民而智识开，山林而蕃殖，则其利或胜于都会海边”，遂至订下向山林植树的计划。《山林维持案》则说“明治十一年草拟植林之法”，早已想过山林“百年间维持之法”，并称“百年之计虽云久远，岂可不期”。

自明治初年一路做下来的地方殖产，也就是通往民富的路，眼看要断在明治十七、十八年。以这一时点为界，晖儿为中心的古桥家迅速倒向土地与山林的经营——这一段思路，下面接着来谈。那是被逼到危机里的豪农经营，一面与地方共生、一面设法重建的过程；同时也表明：那种想靠地方殖产求得生计安定与提高的豪农志向，依然还活着。

晖儿的晚年——终章

晖儿的著作

古桥晖儿自明治十年代后半起，留下了几种著述。

贯穿其中的，是他作为豪农投向明治维新的那点精神——与地方民众一同活下去。进了明治，他的地主经营照旧维持，加上幕末以来一点点扩大的山林经营，以这两样为底子的将来构想，是同国学式的尊王精神、报德^①与勤俭三主义搭在一起展开的。下面就把晖儿的著作逐一看过来。

明治十四年（1881）前后农村的负债显著增加，人们日见疲敝。稻桥村也是这样，茶、养蚕、烟草几项生产一齐走不通了。晖儿等人一面借农谈会想办法，一面受爱知县令指点去了东京，看第二届内国博览会，想找出能带动地方的产业，却没有一样立竿见影。于是势必把指望压到山林——山里的出产上去，想借山林的恩泽找一条自力更生的路。明治初年那番努力殖产、图谋振兴地方的尝试，在地方上是挫折了、失败了；村子和豪农要重新起来，就得有新的构

① 报德：二宫尊德（1787—1856）倡导的农村振兴思想与实践，主张以勤劳、分度、推让报答天地与君亲之德；其组织形式称报德社，明治年间在各地农村影响甚广。——译注

想。而这构想，等于是把明治维新时想要实现的那点精神，照着现实重新拼装一遍。

明治十一年办起来的农谈会，内容不出经验性农事知识的交流；后来老农式经验交流的成分越来越淡，渐渐落进郡县（尤其是郡）的行政轨道里去——这些前面已经说过。地方殖产走不通的当口，豪农古桥晖儿接连拿出意见书和议论地方出路的著述。

北设乐郡殖产意见书

明治十六年（1883）的《北设乐郡殖产意见书》，开篇便说：三河县判事土肥大作曾问他维新改革——克服贫困该走哪条路，他答以“俭勤”，反被规劝了一番，这才醒悟到“殖产”——繁殖物产才是正题。回乡以后，他向村人讲维新开化的时代靠的是殖产，先引进茶树着手栽培，不料明治十一年茶价暴跌，被逼到几乎全废的地步。于是他转而主张，今后当“基于道义”兴办养蚕。这里头仍见得出“富国攘夷”的想头——兴办诸般事业以富国力、以抗外国；而殖产开化并没有让地方和百姓富起来这件事，他并不当作中央政治的失政来看。

殖产一事，到明治十八年他又写了《殖产意见书补遗》。文中说：为殖产富国而开办的农谈会，直接是受了越后豪农桂家的启发；在这之前，他早已因土肥大作的一番话而对殖产开了窍；近来则是三河国吉田的羽田野荣木（敬雄）在《养蚕由来记》里，为复兴养蚕而把向伊势神宫献丝与敬神爱国连着讲，他从中得了力，才把养蚕业推了起来。

一向被人当作山间僻地而“鄙视”，是因为没有把殖产做起来。他说，只要“人民而知识开，山林而蕃殖”，好林子自有“收利”（利润）；把山林蕃殖推到全国去，国力就能强，“商业工业之利益亦将

由此增加”。到这时，为山林蕃殖而拟的百年植树计划，总算得到了村民的赞同。这正是井山官林决定发卖的时候，殖产的议论迅速集中到山林蕃殖——植林上头。山林由此被认作地方再生、自力更生的着眼处。

《报国捷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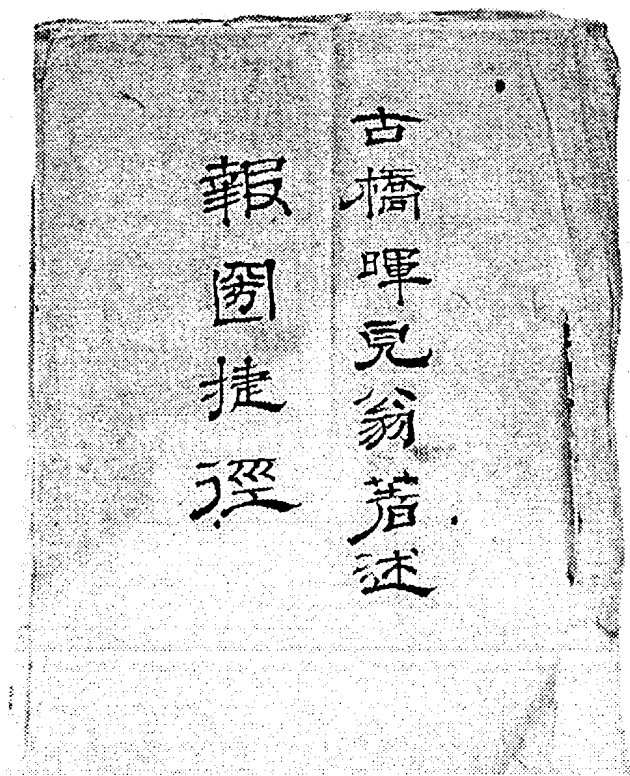
明治十七年（1884）七月写成的《报国捷径》，是以报德社富田高庆的《富国捷径》为底子，立足三河与北设乐郡一地，把敬神爱国摆到台面上来论的。书里透着一种精神主义的调子：世上的事，只要发自敬神爱国、发自爱国心，就没有办不成的；同时，即便在三河这样最穷的地方，也一直在琢磨什么事业配得上这片国土，其中养蚕自明治七年起就已栽下桑苗。古书里记得明白，三河的养蚕与生丝原本先于别处、品质上乘，却在武家的时代被废了。羽田野荣木（敬雄）等人推进古典解释，县里到明治十一年派下养蚕指导的“教士”，养蚕业于是兴旺；明治二十三年，伊势神宫司厅批准恢复献丝。如今把养蚕制丝办旺，把神事的旧例“御衣祭”^①复起来，才算报得神恩。靠生丝出口挣回正金白银，“也就算是爱国、也就算是尽忠了”。

《富国能种播》

明治十八年（1885）的《富国能种播》里写道：明治十二年他为瞻仰东海道御巡幸而动身，途中在伊势贺见岭遥拜伊势神宫，拜着拜着忽然想到，该用的正是神所赐这片土地上相宜的出产——山

① 御衣祭：伊势神宫每年向神供奉新织衣料的祭仪（神御衣祭）。三河旧为向神宫献纳生丝之地，故文中把养蚕复兴同献丝、敬神连在一处讲。——译注

图7 《报国捷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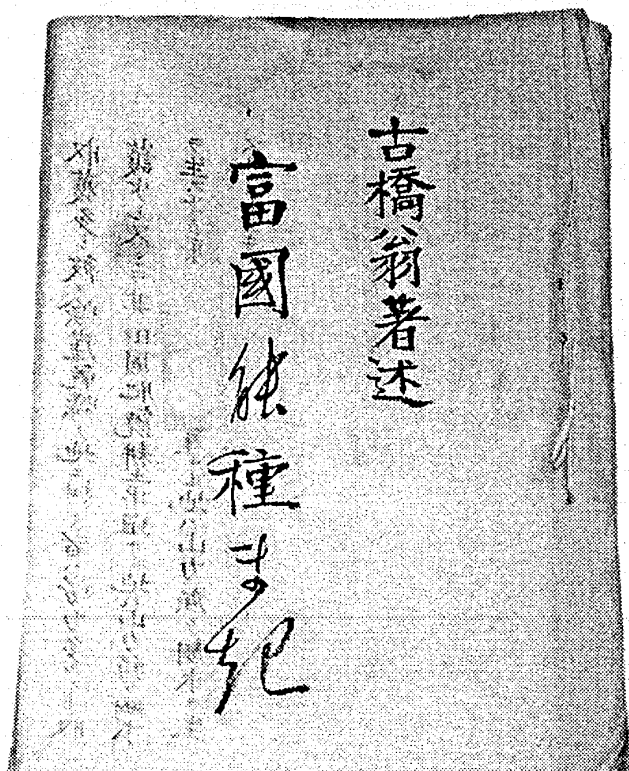


之幸与海之幸^①；北设乐郡“山林原野无从施耕耘”的土地多，想靠田畑“为郡内人民谋活路”难上加难，所以“唯一可倚、可称有力者，独山林而已”。

明治初年的殖产政策底下，他们受行政指点，一直在引进新物产，结果却不称心；到明治十二年主力经营的茶业垮掉的时候，天

① 山幸、海幸：日语成语，指山里出产与海里出产的物产之利，语出记纪神话中的山幸彦、海幸彦兄弟。——译注

图8 《富国能种播》



保年间为着村子拧成一股绳而反复倡说的植林，作为合乎这片地方的山幸，重新进入了视野。国家的政治上，这时也正强调以勤俭储蓄为核心的“敬神爱国”，晖儿接下这一套，把它同东海道巡幸缠在一处，再一次回到了山林之策上。这部著述正面谈百年植树，连第一百零一年起怎样伐木取利也论到了。

明治十八年还有一部《躬行实践》，是五月八日到二十四日参拜伊势神宫御衣祭的日记。他说记下旅中的感想，是想留作日后的参

考；不过从文中“晖儿之心事耄矣”“晖儿老耄矣”这类记述看，那时常被宿疾缠住的晖儿，恐怕已在担心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远行。

次年明治十九年，他留下这样一首咏歌。

山即山幸 海即海幸

陈述心绪

都鄙色香 一如梅花 花绽幽香 神之所赐

玉幸兮 但能一循神意而事之 则贫人之世 其可有乎 （《官余集》）

从这里也看得出，晖儿心心念念的始终是怎样让人从贫困里脱出来。

《子孙遗训补遗》与《经济之百年》

明治二十四年（1891）二月，晖儿起草了《子孙遗训补遗》。明治二十三年（1890）三月，父亲义教把古桥家的家政改革托付给他；次年七月二十四日，趁着祖先的祭日，把家财牛马以至一切日常看来用不着的东西尽数卖了。这一回，他念着祖先的心意，单单刀剑没有卖。文中还记着：这场变卖的二十三年前、文久三年（1863）的同一天，他曾把分家、别家等召齐设宴，训示众人——不背祖先遗训、把祖先的教诲守住传下去，才合乎自然之道，也才是我家兴旺的所在，如此等等。这里，他一面回顾自己为古桥家出过的力，一面讲自文久三年起年年举行的祖先祭的意义，主张以祖先祭礼为轴把一族拢在一起。

明治二十五年九月的《经济之百年》，开篇是“治不忘乱，丰当思凶”，是晖儿最后一部著述。他把明治十八年的大歉收算作距天明八年（1788）一百年、距天保八年五十年，忧心麦子结得不好，以七十三岁之身亲自巡看田水、给乡人打气，终因熬不住宿疾“疝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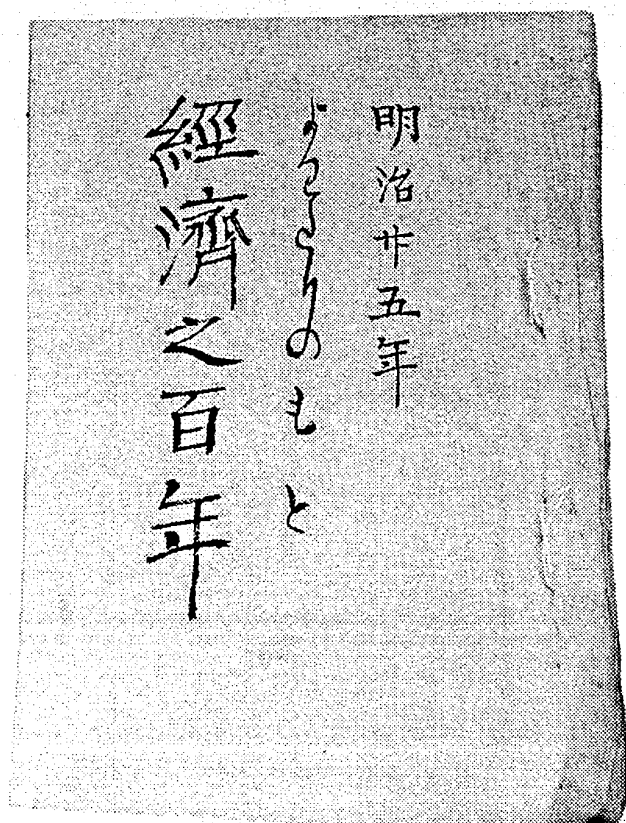
而卧床不出。次年十九年，他率村人在月之平栽下树苗数百株；明治二十年又率村人登井山栽了些树，可这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起他就病倒了，此后病一直未见好，叫人放心不下。晖儿八十岁（明治二十五年）的九月十九日，为祈愿事成，他约上佐藤清臣、领着村人，自己带着病一路坐在轿里上了井山。搭起祭场行祭，安镇山祇神灵，随后仍坐在轿里到烧畑^①农人那边去，看见大豆、小豆、粟、稗、玉蜀黍长得都好，很是欢喜。就在这时他咏道：“为世尽力之心未尝稍懈，只是老来的坡道走得慢了。”

晖儿在离世前三个月，撑着病体乘轿登井山，搭祭场，为农事的收成祈祷、为收成欢喜，还咏了歌。他把这篇文章题作《经济之百年》，读法定为“世渡之本”，而不读作“世渡之道”。这里显出的不是处世之道，而是他自己的一套哲学——活在生产的现场，一路这样活过来。

明治维新之后四分之一世纪，农业与酿造业双双陷入不振，地方殖产受挫；对明治政府一直以在野协力派自处的晖儿，仍旧咬住这个地方，梦想着地方再生，把指望押在山林上。那并不只是育材、伐木、卖钱得利那么一件事，而是连烧畑也算在内，要让这片地方的生产重新活过来，要把住在这里的人们的生活与民俗当回事。晖儿同一轮接一轮扑上来的危机苦斗着，直到死的那一天，都把豪农这条路走到了尽头。

① 烧畑：在山地放火烧去草木、就地播种、地力耗尽即另辟一处的轮耕方式，与中国西南山地旧称的“刀耕火种”相类。——译注

图9 《经济之百年》



后记

本书对我多年来的古桥家调查，算是一个自己的总结。古桥家的共同调查本身，今年正好满五十年。我从学生时代起就获准参加，此后几乎年年都在调查队伍里。调查能这样长久地做下去，全靠财团法人古桥会与古桥家对学术调查有深切的体谅与照拂。这里首先要致以由衷的谢意。

古桥家文书的调查，是以芳贺登先生为中心、由同门研究者共同研究的方式展开的。这批浩繁的史料如何利用、如何研究，除了大致划分一下题目，其余完全听凭各人自便。各自照着自己想做的题目去找史料，一味地抄，抄完再互相复印共享——这个办法在研究上，在芳贺先生强有力的带领下，结出了不少成果。

不过，这种松散的约束，或许也是文书群的整理与文书目录的完成一再拖延的原因之一。再加上种种条件所限，调查一直只能放在每年八月中旬的十天里做，而编目与目录编排偏偏最费人力，于是越拖越后，以至于到今天文书群的全貌仍不易把握——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调查拖得久了，成员的老去就无从避免，其中已经有不少人到了参加不了调查的地步。我自己也开始不安：还能参加这项调查到几时呢。

这几年我一直把力气放在近代部分的编目上，但通过古桥家文书群的整体结构与晖儿一生的行迹，我越来越切实地感到：有必要把维新时期一个称得上良善的豪农的面貌交代清楚。

恰好吉川弘文馆的大岩由明先生又一次约我为“历史文化文库”撰稿，我便以豪农为题写了这本书。

我在古桥家调查里认领的题目是“古桥家日记的研究”，这项研究也还在半途；本书是把日记研究已得的成果收进来，做了这样一番梳理。

当然，以芳贺登先生为首的共同调查诸位成员的研究成果，我从中获益极多。在这个基础上，一面举出具体史实，一面探讨一个住在地方、也为地方尽力的豪农其存在的意义——我以为这对近世、近代的地域社会论也是不可缺的。

最后，谨向芳贺登先生以及木槻哲夫、已故的乾宏巳先生和共同调查的诸位研究者，还有担任本书编辑的板桥奈绪子致谢；而最要紧的，是想把这本书作为古桥家文书调查五十年的纪念，谨呈给古桥家。

2011年5月

高木俊辅

参考文献

- 乾宏巳“质地地主与天明凶作”，《史潮》107，1969年
- 乾宏巳“三河山间地带商品流通的展开”，《地方史研究》103，1970年
- 乾宏巳“化政期豪农经营的展开与村方骚动”，《历史学研究》369，1971年
- 乾宏巳“天保期豪农经营的挫折与转换”，《地方史研究》121，1973年
- 乾宏巳“幕末期豪农经营与荒村复兴”，《大阪教育大学·历史研究》14，1977年
- 乾宏巳《豪农经营的史的展开》，雄山阁出版，1984年
- 大滨彻也“明治十年代的农村与自力更生运动”上·下，《日本历史》246·247，1968年
- 大滨彻也“佐藤清臣小传”，《中京法学》211，1976年
- 木槻哲夫“笃农与小学校”，《地方史研究》71·73，1965年
- 高木俊辅“立宪帝政党关系札记”，《历史学研究》344，1969年
- 高木俊辅“幕末政情与豪农”，《德川林政史研究所·研究纪要》，1977年
- 高木俊辅“幕末维新时期豪农日记的研究——三河国设乐郡稻桥村古桥家的个案——”，《立正大学大学院纪要》2

所理喜夫“爱知县北设乐郡稻武町稻桥区的共有林制度”，《德川林政史研究所·研究纪要》，1970 年

沼田哲“变革期一豪农的思想形成”，《青山史学》3，1973 年

芳贺登“明治维新的精神构造”，雄山阁出版，1971 年

芳贺登“地方史的思想”，NHK BOOKS，1972 年

芳贺登编《豪农古桥家的研究》，雄山阁出版，1979 年

芳贺登《维新的精神·豪农古桥晖儿的生涯》，雄山阁出版，1992 年

长谷川伸三“三河山间地带村落的天明凶作与农民”，《近世封建统治与民众》，1975 年

长谷川伸三“三河山间地带村落的天明凶作与农民”，《幕藩制国家解体过程的研究》，1998 年

古桥茂人“古桥家的历史”，古桥会，1977 年

稻武町教育委员会编《稻武町史·史料编 近世 II》，1997 年

稻武町教育委员会编《稻武町史·史料编 近现代》，1999 年

古桥家年表

* 号表示当主以外的记事；义真一代的 * 号即与晖儿有关的记事^①

公元	和历	年龄	摘要
〈初代 义次〉			1644（正保四）—1738（元文三）
1717	享保二		源太郎买下稻桥村的土地、酒造株、宅第等。约在此时古桥家迁入稻桥村，源太郎称初代源六郎
〈二代 经仲〉			1698（元禄十一）—1766（明和三）
1742	宽保二		任百姓代 〈村方骚动〉
〈三代 义伯〉			1732（享保十七）—1777（安永六）
1760	宝历十		任名主（至 1769 〈明和七〉）
〈四代 义陈〉			1755（宝历五）—1827（文政十）
1786	天明六		任名主。开设铁店。歉收、饥荒
1794	宽政六		开始酿造味噌
1808	文化五		制瓦。次年 1809 开设油店，开始经营白木曲轮
1810	文化七		古桥家遭御所贝津村佃户的骚动
1813	文化十		古桥唯四郎（即后来的晖儿）出生。这一年获准石代纳
1818	文政元		村方骚动（至文政二年，因村有惣山井山风倒木的处置问题）。铁店停业
〈五代 义教〉			1779（安永八）—1848（嘉永元）
1820	文政三		义陈卸任名主。义教继承家督
公元	和历	年龄	摘要
1824	文政七		义教任名主。文政九年，马厩与仓库失火

① 本表公元与和历两栏偶有不合（如“1840／天保九”，天保九年当公元 1838，而年龄栏作二十六亦指 1838）；今悉照原书。年龄用虚岁。——译注

古桥家年表

(续表)

公元	和历	年龄	摘要
1827	文政十		四代义陈去世。重建烧毁的仓库支出九十二两。 古桥家债务积重
1828	文政十一		依别家美浓屋源次郎之议着手家政改革，尚未见效
〈六代 晖儿〉			1813（文化十年三月二十三日）—1892（明治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1831	天保二	19	晖儿继承家督。变卖家什与铁店存货，往川口村等处催收欠款
1833	天保四	21	家中欠债减到一百五十两
1834	天保五	22	着手井山植林
1836	天保七	24	加茂一揆之际说服村中小前，为急夫食、破免、安石代之愿四处奔走（至天保十年）
1840	天保九	26	晖儿任名主
1841	天保十二	29	为三州中马营生，与信州伊那郡六十二村在江户涉讼（天保十二至十四年）
1847	弘化四	35	这一年古桥家债务还清，受命充任辖地最寄村取缔
1848	嘉永元	36	五代义教去世。古桥家酒、味噌的酿造量超过三百石
1850	嘉永三	38	古桥英四郎（晖儿长子）出生
1854	安政元	42	以国恩冥加金名目上缴金三十两
1855	安政二	43	因大地震向赤坂代官所无息贷出金五十两，分五年偿还
1856	安政三	44	读德川齐昭《明君一斑抄》
1859	安政六	47	读本居宣长《直毘灵》
1860	万延元	48	受命办理加茂郡闲罗瀬村的村方仕法
1861	文久元	49	谋办农兵
公元	和历	年龄	摘要
1862	文久二	50	为安石代之愿赴骏府呈诉
1863	文久三	51	七月，办祭祖。为免除助乡之愿赴江户呈诉。九月入平田没后门
1864	元治元	52	参拜亩傍山神武天皇陵。设立遥拜所。乡土防卫农兵计划。长州征伐献金一百两
1865	庆应元	53	苗字御免披露

古桥家年表

(续表)

公元	和历	年龄	摘要
1867	庆应三	55	国学者之间消息往还频繁。十月起稻桥村降札
1868	明治元	56	三河县捕亡方用挂。三河县笔生(书役)。同县下调役兼笔生。*长子英四郎名主见习
1869	明治二	57	伊那县准少属、权少属。创办纸会社。将茶籽分给村人。伊那县骚动起
1870	明治三	58	*十月,英四郎建议《时势三条》
1871	明治四	59	伊那县骚动(续) *一月,英四郎任重原藩第二十七区副户长
1872	明治五	60	辞去伊那县职务归村。种桑、种茶以振兴物产。八月,兴办明月清风校
〈七代 义真〉			1850(嘉永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909(明治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1872	明治五	23	十一月,义真(英四郎改名)与间(中津川)家的都留成婚,继承家督
1873	明治六	24	三月,地券挂附属。六月,养蚕世话挂。十二月,第九中学区取缔
1874	明治七	25	八月,第十三大区副区长(赴新城任职)
1875	明治八	26	十一月,第十三大区长。*十一月,晖儿捐补学校经费缺口一百五十圆。*十一月,捐赠学校经费一千圆
公元	和历	年龄	摘要
1876	明治九	27	八月,第十四大区长(赴清崎村任职)。*明月清风校改称稻桥小学校
1877	明治十	28	十月,参观第一届内国博览会
1878	明治十一	29	四月,开设农谈会。十一月,任北设乐郡长(第十四大区改称);在夏烧设立县立产马讲习所
1880	明治十三	31	一月,辞去北设乐郡长。十一月,任北设乐郡御用系;同月自费把产马讲习所迁至段户山
1881	明治十四	32	*六月,晖儿上京观第二届内国博览会。*六月,长子唯四郎(即后来的道纪)出生
1882	明治十五	33	三月,依愿免去北设乐郡御用系。五月,当选爱知县会议员而力辞

古桥家年表

(续表)

公元	和历	年龄	摘要
1883	明治十六	34	五月，就马政上建议。十月，创办《爱知日日新闻》（至明治十七年四月停刊） * 晖儿（七十一岁）大病，病中著《北设乐郡殖产意见书 制茶意见书》
1884	明治十七	35	* 七月，晖儿著《报国捷径》。十月，创设北设乐郡报德会（会长为古桥晖儿）
1885	明治十八	36	制定《五人组再兴书》《稻桥村勤俭储蓄申合规约》。 * 晖儿著《殖产意见书补遗》《富国能种播》
1886	明治十九	37	一月，当选爱知县会议员。四月，任东加茂郡长。八月，转任北设乐郡长。十月，兼东加茂郡长
1887	明治二十	38	十二月，与知事胜间田稔意见不合，依愿免职
1888	明治二十一	39	七月， * 晖儿（七十六岁）大病
1889	明治二十二	40	二月，向有栖川宫建白。十一月，任稻桥村名誉村长
公元	和历	年龄	摘要
1891	明治二十四	42	* 二月，晖儿著《子孙训诫补遗》。五月，任北设乐郡参事委员
1892	明治二十五	43	* 初秋晖儿登井山，著《经济之百年》。 * 晖儿十二月二十四日去世（八十岁）。这一年，中山道铁路定走中津川线，三河线之议落败
1893	明治二十六	44	七月，统合农谈会组成三河国农会。十一月，任稻桥村村长
1894	明治二十七	45	三月，任全国农事大会委员，此外历任各种委员。十二月，获大日本农会红白绶有功章
1895	明治二十八	46	五月，任爱知县农会评议员。八月，任马匹调查会临时委员
1897	明治三十	48	五月，任稻桥、武节组合村村长。七月，任爱知（浓尾）农工银行创立委员
1898	明治三十一	49	这一年进军山林经营。在长野县下伊那郡平冈村、南和田村购入山林
1900	明治三十三	51	设立井山制板合资会社。创立稻桥银行。设立三河产马组合并就任组合长
1901	明治三十四	52	农商务省在段户山设立爱知县种马所
1902	明治三十五	53	获大日本山林会有功奖
1909	明治四十二	60	六月获三河产马组合功劳奖，七月获稻桥、武节组合各村功劳奖。十一月十三日去世（六十岁）

版本说明

高木俊辅（高木俊輔，Takagi Shunsuke），1939 年生于长野县。1962 年毕业于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70 年于东京教育大学大学院博士课程修满学分退学，1976 年获文学博士学位（东京教育大学）。现为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名誉教授、立正大学兼任讲师。主要编著有《明治维新草莽运动史》（劲草书房，1974 年）、《此后的“志士”》（有斐阁，1985 年）、《〈黎明之前〉的世界》（平凡社，1998 年）、《伊那、木曾谷与盐之道》（编著，街道的日本史二六，吉川弘文馆，2003 年）、《信浓国麻绩宿名主日记》（编著，岩田书院，2009 年）。

本书原题《明治維新と豪農——古橋暉兒の生涯》，历史文化文库（歴史文化ライブラリー）第 326 种，吉川弘文馆刊行：2011 年（平成二十三年）8 月 1 日第一刷发行，发行者前田求恭，装帧清水良洋。ISBN 978-4-642-05726-4。本译底本即该版。

书中脚注均系译者所加，注末署“——译注”；原书正文无脚注。正文用规范白话；原书低格排印或成段引录的古文书、日记、书简、建白等史料，中译作浅近文言并以仿宋体缩排，以别于正文。日本年号纪年照排汉字（天保二年二月），原书括注的公元纪年一律改用阿拉伯数字（一八三一→1831），原书未括注公元处不代为补出。江户时代的度量衡与货币单位（石、斗、升、合，町、反、亩、步，两、分、朱、文等）照排原字，首见处出译注说明。幕藩制的职役与制度专名（庄屋、名主、组头、惣代、小前、助乡、夫食、内济、石

代纳、冥加金、御一新等）一概照排原书用字，不改写为中国式官名；史料引文与表格内的数字、写法一律照排原书，不作换算。



高木俊輔

明治維新と豪農——古橋暉兒の生涯

